



李珣研究的“现实主义”——读刘文传新书《李珣研究》

叶眺新（四川绵阳）

Recommended: 王德奎 (Wang Dekui), 绵阳日报社, 绵阳, 四川 621000, 中国, y-tx@163.com

摘要: 李珣在五代十国时期就写出《海药本草》，可以说李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改变古代传统儒家教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反过来为“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的人——古代外国人出生在中国内地的后代，传代几辈后已经融入中国社会，还算不算中国人？以及如何看待这类古代中国人取得的科技成就：是把它看成“抑里扬外”之作，还是助科技振兴中华与海外的双赢？如果说“海药”不是仅指“海外”来药，还指中国本土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时期，“盆塞海山寨”内就发现的“中药材”，那么“海药”说《海药本草》不更“名副其实”！

[叶眺新. 李珣研究的“现实主义”——读刘文传新书《李珣研究》. *Academ Arena* 2021;13(8):19-66]. ISSN 1553-992X (print); ISSN 2158-771X (online).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doi: [10.7537/marsaa.j130821.02](https://doi.org/10.7537/marsaa.j130821.02).

关键词: 海药本草、盆塞海、回族、三星堆、现实主义

【0、引言】

2021年5月27日绵阳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的刘文传主任，送给笔者一本他刚出版的《李珣研究》新书，他说：“李珣是我们绵阳市三台县唐朝末年五代十国时期人，著名药物学家，他写的《海药本草》一书，明代李时珍写《本草纲目》一书都参阅摘录了《海药本草》。我写本书是想帮助促进振兴我们绵阳市和三台县的中医药交易市场，扩大扶贫产业”。刘文传主任是笔者多年的学术朋友，看书提到“李珣”的名字还是第一次，把传说和“海药”联系引起笔者极大兴趣。

因为数十年来笔者研究“盆塞海和盆塞海文明”与“湖广填四川”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联系上了近数十年“三星堆遗址”古青铜器等文物来历的考古，对绵阳市盐亭县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末期的丝绸始祖嫫祖和医药始祖岐伯文史关注很多。如果说“海药”不是仅指“海外”来药，还指中国本土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时期，“盆塞海山寨”内就发现的“中药材”，以后又被在唐朝和五代十国时期来华的外国人，以及岭南等地外商瞧上，那么“中药材”种类这种“海药”说，《海药本草》不是更“名副其实”！

这种想法，使笔者对“李珣”的中国人身份如何认可？也产生了兴趣——因为从近代“湖广填四川”到今天，接触到家乡盐亭县本土出生的一些很聪明的爱钻研的年轻人，对“问君根从何处来？湖广麻城孝感乡”的寻根热度很高——有位创业成功的医院院长说：一直以来川人溯源十之八九的“湖广麻城孝感

乡”的传言，对他而言，已是铁定的事实。寻根、溯源家族史、民族迁徙史，是对人体、人生、人群、人类的价值、意义的思考与探索，也是中国人尊祖敬宗的历来传统与普世价值观。麻城移民，也把“打麻将”带到了四川，并广为流传。所以四川人无论男女老少，咸爱“国粹”——麻将，也是有血缘因子的。笔者没有否定这种“对人体、人生、人群、人类的价值、意义的思考与探索”，恰恰相反——“湖广填四川”是一种“回流”吗？

即如果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人类全球化来历的“寻根”，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如果是徐道一教授、李后强教授等说的——“珠峰辐射原理”产生的——青藏高原是全球最高的一个巨型构造地貌单元，被称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中国未来的出路，世界未来的出路，也许都寄托在青藏高原对人类/文明起源三大孵抱期的大历史统一认识上——黄河文明近五千年是先进的，但它之先的文明源头在哪里？把希望寄托在北方——类似支持“多地区起源说”的“西方优秀论”——近十多年来，德国马普所创新出顶尖的人类分子考古学方法，搞古尼人、丹人的“杂交”能力超过“非洲人”说，培养了大批新秀，使“黄河文明优秀论”跟跑“西方优秀论”成为潮流，甚至不敢把毛主席、小平、周总理等开辟的“资阳人”道路走下去，甚至把“资阳人”开辟的道路看成骗局。

众所周知的三星堆考古近百年，今年更倾四川及全国之全力，得出结论仍然是：青铜面罩等文明要不是来源中原，要不来源中东埃及，要不来自外

星人等猜想，不敢承认三星堆考古的文明起源于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的人类/文明起源的第二孵抱期。

其实依据常炳功教授的“时空阶梯理论”，四千多年的三星堆考古的文明，起源于五千多年前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的人类/文明起源的第二孵抱期，和之后近五千多年黄河文明是先进的，并不矛盾，而且是真正在挺黄河文明的先进。但“时空阶梯”发展的先后顺序，被短视的某些“现实主义”遮盖了---以为存在“珠峰辐射原理”产生过的文明，会影响后来北方“黄河文明优秀论”的根基；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失落后出现的“贫瘠”，是一直就存在。

据常炳功教授的“时空阶梯论”，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失落，其实有它的必然性和自然性---即它本身内部存在的自然和社会的遏止力量，例如远古巴蜀盆塞海的逐渐干涸；顶尖优势的智力、技术、资源等，不断地分流、扩散、迁徙；周边崛起民族的成功入侵。这种周而复始的“以弱胜强”的历史进程，是从无阶级社会进入有阶级社会，而保存下来的挥之不去的“突出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原因。

例如，汉代生活在成都的扬雄，也同司马迁一样言先进其文不雅驯，他称上古之纪，蜀地尚处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蒙昧时期。然而在他家乡目前，就发掘出著名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以及宝墩等五座古城遗址。在他北上京都途经绵阳，逗留住宿之地的永兴普明，目前也发掘出大型豪华的汉墓。但扬雄也像懂新闻报道有强烈的意识形态选择规则一样，他只认京都、府地的繁华，其他偏远之地或过时的先进东西，推荐报道都难言之。这种“突出政治”的意识形态延续到近代，中华五千年前的早王朝文明，几乎被旧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母系氏社会或父系氏社会、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等史观否定掉。

徐道一教授等科学家，创建的青藏高原对人类/文明起源三大孵抱期的大历史统一认识，成为难题。

【1、刘文传主任简介】

刘文传，汉族，1958年生，四川省射洪市人。1976年12月参军，198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保送进大学，198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1985年底，转业到绵阳市劳动局（今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工作到2018年2月退休（调研员）；期间曾担任职业指导师、SYB及SIYB创业指导师、社科咨询师等。

刘文传主任涉猎广泛，喜爱读书和写作，先后出版有《社会的太阳---中外劳动名言录》、《历史

文化名城---绵阳风景名胜诗文选注》、《北宋绵阳盐泉苏氏传》、《欧阳修大传》、《欧阳修研究概览》、《欧阳修情传》、《绵州盐泉苏氏研究概览》、《涪翁---李柱国研究》、《李珣研究》等多部个人专编著；参与编著有《绵阳市劳动志》（1988年版）、《涪城区档案志》、《绵阳市民航志》等地方志书，以及参与编辑《中国少儿科学小说选》（系列丛书）、《农村青年创业致富丛书》、《绵阳地方文化简读读本》、《绵阳论坛》（特约编辑）、《天下一刘》（副主编）等。曾在国内及省市报、刊发表有诗歌、散文、小说、社科论文、科普文章及新闻通讯类作品愈千篇。并有多篇社科研究、史学论文及科普文章获省、市优秀成果奖。

刘文传主任早在绵阳市劳动局工作期间，经相关社团选举和组织批准，就业余兼任绵阳市欧阳修文化研究会理事长，以及市社科联、市三国演义学会、市科学小说研究会、市史志学会等多家学会副秘书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等职；亦是涪城、游仙区及市政协文史委特约研究员；还是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理事；四川省大禹研究会会员、常务理事；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欧阳修研究会常务理事、世界华人科普作家协会会员、理事等。

在反复数遍研读《李珣研究》一书后，笔者用电话把自己的想法，与刘文传主任作过交流---刘文传主任在写作《李珣研究》一书上，下过很大的功夫，克服了很多困难。他提供的材料丰富，分析细致，保持了与当今学术界主流研究李珣认识的一致。他对笔者持存在过“远古巴蜀盆塞海”之说有顾虑，认为只存在过几亿年前的印欧板块碰撞造成过包括巴蜀之地时的海洋，但他对《海药本草》中“海”也持“开放”态度---只要是为了振兴我们绵阳市和三台县的中医药交易市场，外商看重的“海外”和“海内”的药材，都可以是“海药”。

【2、现实主义的生命力与接地气】

读刘文传主任送来的《海药本草》一书时，正是笔者刚读过2021年5月17日上海“观察者”网，发表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石之瑜教授的《“天下”与“现实主义”，谁才是霸道？》一文之后不久。

石之瑜教授对“现实主义”说得很露骨---石之瑜教授用“自我中心主义”解读实际的“现实主义能教导世界臣服于美国霸权，还心甘情愿把臣服看成是自己理性智慧的发扬。天下思想为什么就这么冤枉？在天下思想里，关键是让会务农的好好务农，让会种菜的好好种菜，让上位者能安心。换言之，如果天下思想让自己感到兴奋的话，那自己可能是假的天下主义；而让自己感到辛苦的话，那就比较可能是真心诚意的。既然人人信仰权力，权力大的

当然宰制，权力小的必须臣”。“尽管当前的天下思想家看似百花齐放，但几乎是想用天下思想来匡正，反而是在实务界，会出现像暴发户一样的人物，失去节制。天下思想若是以现实主义为鉴，就不会浪漫地以为，只要把自己做好，就不怕别人来犯。没有什么天下体系是永远和谐的，也别想人家把自己当模范。所有的关系都需要经营，不强加于人。这不仅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而已，更是历史上千锤百炼的实证教训”。

而我们过去看书、读报，知道的“现实主义”的主流说法是：“现实主义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包含了各种现实主义者和观点借以产生、发展的一套假定的研究范式。现实主义首先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哲学传统和世界观。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是建立在它对道德进步和人类能力的悲观主义认识基础上的。现实主义者把历史看作是循环的而不是进步的，他们对于人类是否有能力克服反复出现的冲突，建立持久的合作与和平深表怀疑。现实主义世界观更多看到的是人类本性中的恶，以及人类经验中周而复始的悲剧”。

以及“现实主义的生命力，还在于它具有的动态性和开放性特征。现实主义的要义是关注现实，这个现实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发展变化中的现实。现实主义作家在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中，谛听着时代前进的脚步声，揭示新矛盾、新问题，塑造带着泥土气息的鲜活的人物形象，常常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现实主义的动态性，决定了它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包容的而不是排他的。因为，现实主义文学所描写的新现实新生活，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这就需要借鉴，需要创新，而不是墨守成规”，等等宣教。

但“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接地气，在我们绵阳来说，是从上世纪 60 年代初的“三线建设”，到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军改民”首批试生产后后来闻名全国的“长虹彩电”。当时笔者还在重庆第 18 冶大公司机关机动处工作，看到 18 冶宣传处放着的那台全公司仅有 3 台之一的“长虹彩电”，兴奋极了，真想回到绵阳市里工作。到 90 年代初实现了，绵阳已成为全国的“科技城”，但到今天的 21 世纪 20 年代，造“彩电”已经是一件普遍的事情；在绵阳市十多个县市区的广大偏僻农村，年青农民出外打工，也仍然是一件普遍的事情。

如何走出一条发展创意产业，并实现国家、集体、企业、农民“共生共进共舞共富”的新路子，在完成扶贫攻坚的大背景下，更具有现实意义和代表性。刘文传主任挖掘出绵阳三台县五代十国时期回族药物学家、花间词人、波斯后裔、一带一路先行

者李珣，写就出版《李珣研究》，现实主义的重点，突出的是“重新审视中医药”。例如，绵阳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四川省委传统医学专委会主任沈其霖教授，省中医药发展促进会会长杨军教授等专家学者、领导，从 2017 年以来，就一直不间断地带队在绵阳市县市区，调研中药材综合利用。

他们强调要科学综合利用中药材资源优势，突出中药材产业特色、挖掘中药材深层价值，抓好中药材的物尽其用、加工炮制过程的充分利用、中成药生产过程药材的综合利用，中药材传统非药用部位、药渣及中药材在保健食品、化妆品、保健服饰、保健日用品、饲料添加剂、香精香料、色素、新型农药等其他方面的开发利用，将中药材产业与旅游、食品加工等充分结合，是当地中药材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农户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潜力很大——随着中药、中成药世界性需求量的日益增加，药材资源不足问题也更加突出；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国内外医药事业发展的需要，中草药资源的综合开发研究，已成为当今世界的热门。

例如这类调研组，就实地察看过江油市大康镇吴家后山辛夷花资源综合利用——辛夷花别名木兰，处方名为辛夷、辛夷花，适用于治疗治鼻塞，头痛；吴家后山有野生生长了上千年的近 6 万株辛夷花树，是我国现存最多最古老的辛夷花原始生态林，也是极为难得和宝贵的中药材资源。这里还是鼻渊舒和鼻窦炎口服液的主要药源供应地，以及江油附子种植基地、四川江油中坝附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和北川县药王谷中药植物园、杜仲及厚朴等种植基地。

【3、盆塞海与《海药草本》之谜】

907--960 年五代十国时前蜀梓州郪江镇回族学者李珣，写的《海药草本》一书，是我国最早透露远古巴蜀存在“盆塞海”和盆塞海洋文明的第一人。为啥这样说？因为一般说的“海”，是指大洋大海这种“原生海”，但李珣的《海药草本》一书本意的“海”，还特指包含“盆塞海”的“海”。《海药草本》一书后来的失落，也与这个扩大的“海”含义——透露远古巴蜀存在“盆塞海”和盆塞海洋文明有关？

因要保住从远古巴蜀存在的“盆塞海”和盆塞海洋文明由于灾害搬迁出来的政体的稳固，古代一直存在类似“扬雄、司马迁一样言先进其文不雅驯”的意识形态。而李珣受此影响有限，更爱学问价值。

1、什么是“盆塞海”？

如果把“人类起源及文明的第二个孵抱期”类比多体一元类似的霍金黑洞辐射现象：例如，约 20 万前从非洲走出的还分散在巴蜀远古盆塞海文明外的

现代人，也会不断地被吸引进入这个多体一元“黑洞”，加入到文扬教授说的“天下人”队伍的“远古联合国”。但最早逃离开这里的智人，也许就类似2019年5月我们在北欧六国旅游，听北京国际旅行社领队李志杰等导游一路说的早期“维京人”的祖先。

注意到这个问题，还因为2019年上海复旦大学文扬教授写的“70年对话5000年”系列文章和《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一书，提出中华文明诞生历史，是一个“天下”型国家的概念。因为文扬教授把这个“天下”型国家起源的历史，限定在中国东部、中原和夏商周时代，这就有个缺陷——类似“维京人”的“西方优秀论”，是一个中华文明一直是“中原优秀论”。这无形与如今“80后”的古DNA学界，有人认为是汉藏语系起源于中国北方，以及古丝绸文明起源于东北亚等研究，是一同提供了误导。

1993年第3期《四川丝绸》杂志发表的《嫫祖年谱初探》，和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嫫祖研究》一书发表的《嫫祖年谱初编》，都提到现代人类在第四纪大冰期后期，约20万年从非洲走出存在文明起源的第二个孵抱期问题，实际就暗指是“远古联合国”。

这是把早期人类社会组织形态发展序列，分为“远古联合国时期”、“部落游团酋邦时期”、“王国国家时期”等三种分类。以四川盐亭县流传的天垣《盘古王表年表》设为上古编年史，从盘古到嫫祖的人类进化的第二个孵抱期巴蜀盆塞海文明，可以追溯到非洲人类进化的第一个孵抱期，但只有第二个孵抱期才可划为“远古联合国”时期。

夏朝以前到嫫祖可划为“部落游团酋邦时期”。从夏商周春秋战国到秦汉等可划为“王国国家时期”。正是有远古联合国第二个孵抱期巴蜀盆塞海文明，也才有产生后来出现的《易经》、《山海经》、《道德经》、《黄帝内经》以及墨子、庄子、惠子、孔子、老子等古代著名经典和文化名人的基础。“嫫祖研究”分子人类古基因检测硬度有：

1999年10月7日《绵阳日报》第3版发表的《绵阳丝绸话沧桑》一文，说的是嫫祖发明养蚕缫丝，把“科商”提升到了高科技竞争的层次——从“桑林生臂手”意指“货币”，意指龙凤经济贸易——八千多年前至五千多年前，巴蜀盆地由于女娲突变纪等地质灾变形成过盆塞海；灾难把盘古文明推进到了远古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阶段，由此绵阳城邦贸易与商业活跃，那时绵阳梓潼山成了一处“香格里拉”。

这里山上产有多种名贵木材、香料，特别是梓树是海上贸易可造容数十人大舟的好材料。再说林间飞翔的朱雀之毛也为最高珍宝，由它而产生的羽

毛镶嵌、羽绣工艺闻名四海。因为梓潼城邦人用类似鹦鹉、野雉、火鸡等朱雀的五彩羽毛制成各种衣饰、摆设，可以作城邦国家盛典中的高级礼品和做旗帜。梓潼七曲山周围半山腰上的大围坪城邦，其作坊店铺和居民住宅栉比鳞次。梓潼先民靠着海上的航行与外界发生广泛的联系，同时也造成了工商业与航海业的发达。海，造就了他们的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海，使他们去超越陆上那有限的生存空间；海，诱惑他们去从事正当的海上贸易和海外探险。

据传说，此时梓潼城邦的国王、城主和邦君，已被称为“文昌大帝”或“文昌帝君”——“盘古王表年表”把中华海洋文明起源提前到了约公元前5070—4170年到约公元前4170—3150年的立足山海时期和城邦之美时期。配合这个时期的龙凤经济，从“凤”联系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用五彩羽毛制成的各种衣饰，广而推之是商品生产，以及商品经济需要的是多样性，体现的是原始海洋文明的工业化。而“龙”则联系长蛇、联系独木舟，再联系巴蜀盆塞海的海洋文明用樟梓树造船，推动海洋文明的对外开放与交流贸易，广而推之是市场经济，体现的原始海洋文明追求的科学和民主化。

如果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8000多年前的巴蜀盆塞海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中国和世界后来的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的渊源问题。因为在这些顶尖优势文明产生之前，嫫祖、夸父、盘古、女娲、伏羲、蚕丛等先王，已经在巴蜀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远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即龙凤经济或龙凤文化多时了。因为“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还有一个类似的“暴涨宇宙”期——从西南少数民族传说盘古王南迁，和夸父追日等神话故事，暗示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中原、古希腊等世界上的五大文明发源地，就是此“暴涨”扩散到古印度、中东、埃及和古地中海克里特岛、西西里岛等地领头的人文始祖及群体造就的。

最好的说明是，这五大文明发源地，都在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狭长地带内：古黄河中原是东面一端，西面另一端是古西西里岛、克里特岛、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且以青藏高原成大致对称。也许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盘古王传说”和《盘古王表》传说，就是亚历山大国王和帝国传说的母本。再据保存盘古王表地方的天垣传说：盘古王在盐亭县祠安坝领导爆动建国后，并没有实行终生制，而是以“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作为立国之纲，率先垂范。因为“盘古王”卸

位后，他带领部分人马行舟渡海到南边云南，进入缅甸，沿印度的恒河水，横穿印度出海，乘阿拉伯海的季风，进入波斯湾，再沿海峡到达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是第一代苏美尔蜀人的来源。以后又从埃及和两河流域渡过地中海，先后在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等复制“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山寨立足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因此中国南方多盘古王的传说。

所以我们说，“一带一路”是指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不是从零开始，它远不止继承古丝绸之路的开放传统——黑人、白人和黄种人的基因，在迁徙后的非洲聚集统一，又在迁徙后分布全球。多地区说正是这种统一时空阶梯之后，地区地段不同产生的如黑人、白人、黄种人等区别的实际表现。因为20世纪初留学日本归乡的盐亭学人何拔儒，通过长期考察和研究从盐亭辐射嘉陵江流域两岸的大围坪和古山寨地质地貌，得出从1.2万年至8千年前的大冰川末期起，四川曾发生和存在过多次盆塞湖和盆塞海现象，从而为5000年前中国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提供了地质地理条件，而被人称为中国上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古环境研究的第四部书。

虽然现今路经盐亭的人，见不到那里有海洋风光，整个四川盆地也没有海洋风光，只有举世无双的干涸的盆塞海风貌。而盐亭县里也只留下众多的嫫祖、夸父、盘古、女娲、伏羲、蚕丛等先王的传说，以及那众多的海啸地质地貌和山寨城邦遗迹结合的远古文明景观。

那么现在能把中华传统文化的很多高深智慧的发源，和远古联合国巴蜀盆地的多次盆塞湖及盆塞海现象的海洋文明及山寨城邦文明联系起来的，是如何解释史前有过的那一场毁灭性的大水？如从我们中华各民族到世界各民族中，都有“洪水朝天”说法的困惑——即“洪水朝天”的远古传说，正是远古存在过盆塞湖或盆塞海的映射。

如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徐道一教授说：“我国西部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在几百万年青藏高原不断地隆起，形成的特殊地质、地理、气象条件，对全球，尤其对中国大陆的地貌、气候、生物等变化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这对近万年来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也发生了重要影响——青藏高原剧烈抬升和特殊的地质构造条件，使其内部和周边地理环境具有独特性质：地形高差大，气候复杂多变，生物多样性显著，地震、火山、泥石流等灾害频繁发生，冰期、间冰期的温度反差大等。冰期这些都有利于原始人类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知识产权局高工王文光教授赞同徐教授的看法，

他说：“地球上的生命物质，第一时间产生在海洋，第一时间把生命物质带到陆地的，若珠峰地区在约四千多万年和约两千多万年有两次先后的隆起，是地球上第一块产生耐寒、耐氧基因的陆地，那么许多生命物质包括人，应首出现在珠峰地区。珠峰地区的考古应加强。说不定，三星堆也许与珠峰、古藏人有关”。

但2021年6月6日西南石油大学常健民教授却给我们来信说：“徐道一老师是我的师哥，在都江堰的第二次民科会议上我见过他。不是我对于自己的学长不尊重，他竟然没有发现也没有认可地球翻转运动，沉溺在传统的渐变论控制的思维中。他们的文章无论怎么样反复说教，也无法破解天倾西北运动等等大自然的天象剧变。但是他们又盘踞在中国的地质学权威的位置上，恰好成为了中国地质学发展的挡路石。创新难啊！”为啥？常健民教授从1999年开始，就对地球周期灾变现象，把人造地球卫星的周期性非稳态翻转现象，引入到地球周期性非稳态翻转，首次发表崭新的地球翻转假说。

常健民教授曾认为，世界诸民族中洪水朝天的远古传说，反映的是他提出的地球翻转观念——洪水朝天的传说中的那只船，能被冲上了欧亚大陆交界的阿尔卑斯的山顶，只有地球翻转才有这样大的力量。当然常健民教授的地球翻转说，即使对“洪水朝天”的远古传说不成立，也反映了远古存在局部地质大灾变的事实。但他说的“创新难啊！”这正是很多人不理解产生巴蜀盆地远古盆塞湖或盆塞海的原因。

“创新难！”反过来很多人却喜欢用“神话”包装的历史——如果说李珣的《海药草本》书名的“海”，还包含“盆塞海”的“海”，那么刘文传主任2019年在《巴蜀史志》第3期发表的《绵阳西山公园内的“蜀八仙”文化符号》一文中，讲“金元时期全真道兴起之后的事”说的“后世流传的‘八仙’，则把钟离权、吕洞宾、李铁拐、张果老、曹国舅、韩湘子、蓝采和、何仙姑凑在一起称作‘海八仙’”的“海”，也许就包含曾经传说过有“盆塞海”的“海”。

如今搞旅游，遂宁市说“南海观音菩萨”出生在遂宁市的“海”、江油市说“哪吒闹海”是在江油市的“海”，等等，也许也包含曾经传说过有“盆塞海”的“海”。石云龙、石小玉出书写嫫祖，以及绝大多数嫫祖促进会的会员，讲嫫祖出生，都用“神话”，可见类似“扬雄、司马迁一样言先进其文不雅驯”的意识形态，影响之深。当然，也有很多追求言科学解密的人。

2021年6月10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工程研究所高也陶教授，给我们来信说：“涪水之滨绵阳市，是黄帝故里及黄帝医术最早整理的地方。第一次，

在黄帝、嫫祖（雷祖-雷公）、岐伯故里，岐黄论医。第二次，李柱国携未整理修订完成的九卷，避难黄帝故里，就是寻本追源，前来完善。在《华阳国志》中，载为李助，助为名，柱国为字。汉人只取一姓一名为姓名，两字者为字。第三次，张陵入蜀，追寻黄帝经书，结识郭玉，得到黄帝真传，遂于今苍溪云台山升天（去世）……第三次整理的说法，是我2019年到宝地盐亭实地考察时，发现的；来不及做进一步仔细考察，去年起疫情，耽误了——张陵需要更快更准确的查实。后续我有推论，郭玉在汉宫的斗争中，张陵带他出宫，到其祖上所在地，鲁西南一带避难。郭玉在当地传黄帝医术，脉诊、针经，遂使鲁西南成为传统中医又一个中心。华佗、张仲景、王叔和……均出自那一带。我五月份去实地考察，文章还在整理之中。有机会，争取再到宝地学习”。

张陵入蜀，有传说他曾落足过绵阳梓潼县的大庙山，具体材料难寻；刘文传主任回复说：“我们绵阳西山公园仙云观里的‘蜀八仙’殿里面，有蜀八仙之一‘张陵’，又称‘张道陵’的名字。张陵，亦称张道陵，在西蜀鹤鸣山学道和创立道教，在青城山布道和建立‘二十四治’（教区），主要就是利用古蜀仙道及仙学”。

2、联系远古巴蜀盆塞海的最新科学资料

2021年6月2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崔雪，发表的《云南曲靖首次发现4.1亿年前长吻三歧鱼》文章报道：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此次长吻三歧鱼在云南曲靖‘古鱼王国’的首次发现，不仅扩大了三歧鱼在华南板块的分布范围，而且曲靖地区恰好处在江油地区和越南北部地区之间的位置上，填补了三歧鱼南北分布的地理空白”——三歧鱼是盔甲鱼类中唯一一个同时出现在云南曲靖徐家冲组、云南文山、昭通的坡松冲组、四川江油关山坡组、越南Si Ka组和广西南宁那高岭组的盔甲鱼类，从而为它们之间的对比，提供了具有非常重要的古地理意最直接的证据。长吻三歧鱼最初由刘玉海1975年发现于四川江油龙门山雁门坝的泥盆纪地层。

同期刘玉海也报了发现于云南北部昭通地区同时期的昭通三歧鱼。云南昭通和四川江油在地理位置上离得很近，都属于华南板块北部。到2002年赵文金等人在滇东南文山发现了长吻三歧鱼和2009年法国古生物学家菲利普·让维埃在越南北部发现了越南三歧鱼，人们才意识到在三歧鱼的南北地理分布上，存在上千公里的地理间隔，对于游泳能力较弱，营底栖生活的三歧鱼是怎样完成了长距离的迁徙，一直是困扰古生物学界的未解之谜。

三歧鱼分布的五个化石地点都属于华南板块，由扬子古陆和华夏古陆组成。早泥盆世期间，华南板块位于低纬度古赤道地区，并被古特提斯洋与古太平洋从劳亚古大陆和冈瓦纳大陆隔离开来。在扬子古陆和华夏古陆之间存在一个陆表海湾，即华南海。大约4.2亿年前（洛赫考夫期），中国南部发生海侵，海侵从西南向广西中部和西部延伸。

大约4.1亿年前开始（布拉格期），在广西造山运动之后，华南海覆盖了华南板块南缘的大部分地区，这使得华南板块广泛发育了近岸含化石的硅质碎屑岩和石灰岩，比如广西六景的那高岭组、曲靖的徐家冲组、昭通的坡松冲组、文山的坡松冲组、江油的关山坡组、梧州的苍梧组、越南北部Khao Loc组和Si Ka组均为华南海附近的近岸至三角洲相沉积。综合证据显示，今天的云贵高原和广西地区在4.1亿年前的早泥盆世是一片近于封闭的陆表海湾，即华南海，有一个间歇性向南的开口，形成了类似现代红海的那种封闭的环境。

由于封闭海效应，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生物演化区域，被称为生物多样性热点，生物在这个封闭的环境中独立演化，表现出很高的多样性和很强的土著性——江油是绵阳的一个县级市，靠近四川盆地的北部边缘。如今五个地点“长吻三歧鱼化石”的考古，证明即使远古巴蜀盆塞海的存在，四川盆地及其附近西南面的部分青藏高原，在更古的早泥盆世时候，是属于华南海板块北缘的陆表沉积地区。

青藏高原的地貌原来到底像啥？2021年6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科考《古生物学家发现临夏巨犀——揭示巨犀如何穿越青藏高原》文章报道：最近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邓涛研究员，领导的中美合作团队在青藏高原东北缘甘肃临夏盆地渐新世晚期2650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了一具长度超过1米，并带有下颌骨的完整头骨——这头在2100万年前灭绝的巨犀是地球历史上生存过的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它的重量是4头成年非洲象的体重总和，头部伸长能高达7米。这个像长颈鹿一样取食树冠叶片的庞然大物，主要生活在亚洲，特别是今天的中国、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一带。

但这次也在青藏高原的西南缘发现的属种“布格蒂巨犀”，是如何穿越青藏高原的？邓涛教授的解释是：在始新世，亚洲与欧洲是分隔的，因为中东和西伯利亚西部仍然被海水占据。塔里木盆地的西南凹陷向东延伸到阿尔金山脉，分布有从始新世到中中新世早期的海相沉积，指示这个地区存在东西向延伸的海域。因此，南亚与哈萨克斯坦被海域分隔，阻挡了巨犀在这个方向上的迁徙和演化。

邓涛教授说：在渐新世，巨犀从蒙古高原到南亚的扩散，沿着特提斯洋的东岸，通过西藏腹地的一些低海拔谷地进行——这一路线得到其他证据支持的是：在青藏高原中部渐新世地层中，发现的鱼类和植物化石都显现出热带的特点，指示不超过2000米的海拔高度。巨犀在渐新世早期，从今天青藏高原北侧的蒙古高原，经中国西北地区扩散到南亚，巴基斯坦巨犀的后代又在渐新世晚期，返回甘肃和新疆，由此证明青藏地区尚未上升成今天的高原，没有足够的高度阻碍像巨犀这样的大型哺乳动物的扩散。

3、远古盆塞海冰川与海啸地貌地质学之争

何拔儒探讨盘古文明大爆炸类似的“远古联合国及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地理形成”的话题，虽在民间流传，但知道他使用的“硬证据”主要多在地质学方面的人并不多。这不能苛求何拔儒，我们来看2013年9月国外《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报导，英国赫尔大学水文学者 Tom Coulthard 等，利用撒哈拉沙漠地区的详细地形数据，了解水流如何从山地向北方流动形成湖泊和内陆三角洲，并在一些情况下到达地中海而创建的计算机模型的最新研究，才发现大约在距今13万年至10万年前的间冰期，与现在相比非洲季风能够到达更北部1000公里之外的地方，季风所带来的暴雨可以滋润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山脉。

该地区在最大季节性暴雨时节，每一条主要的河流都能够带走大概相当于尼罗河四分之一的流量。这些河流可以在沙漠中创造植被繁茂的“绿色走廊”和大片水域。这样一来，季风暴雨滋润了穿过撒哈拉沙漠的河流，撒哈拉沙漠曾经处于向北流动的三大水系的纵横交错之中，这为人类向欧洲和亚洲的第一次迁徙创造了可能，即早期现代人类就可以经此迁移到北部地区和其他大陆。

何拔儒没有计算机模型，但与此相似的被遗忘的是大约在距今两万年至五千年前的中国西南古盆塞海时期，开创的人类远古联合国和盘古-嫫祖文明，何拔儒还是破解了。

(1) 如果说远古人类的文明有中东-非洲杂期和东方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期之间的交流与迁徙，这就要考量远古早期人类在非洲等海边的活动，如何克服缘于广阔的海洋长期是人类迁徙与交通的障碍的？全球化人种之复式结构与多元文化的结合，是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期区域的特点漫长的历史，形成了世界远古中华文明的分化明显的区域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的特征。

20000--8000年前的第四纪大冰川末期气候变暖，使得全世界的冰川绝大多数都出现融化现象，

其面积和厚度都在缩小，这不仅改变了当时青藏高原地区的地貌，而且加上8级以上的一些不同时期的大地震，极有可能诱发长江和黄河上游西北、西南高山及丘陵地区的洪水和滑坡，形成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间断变化的景观。仅仅从大冰川末期的迅速融化来说，一方面，冰川的融化会在青藏高原和接近地区形成一些高山湖，这些高山湖如果泛滥，就有可能形成巨大山洪，大量洪水将会冲毁途经的一切。

另一方面，冰川后退也会造成当地地质情况不稳定，诱发山体滑坡甚至地震。这些地质灾害都将直接威胁到当时当地的上古人类居民的生命安全，以至影响到国家的起源。但是目前的地质学家和历史学家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远古国家的起源也许首先从远古联合国起源开始的——远古大自然的危险严重程度，抗灾自救的联合、维和需要，远远大于部落之间及个体之间的竞争、争夺以至战争。

远古联合国不是联邦、邦联，也不是联盟，而类似今天的联合国，且是强化了类似维和、维稳机构。至于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机制，类似霍伊斯勒介绍的模型：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天山地区的伊塞克冰川，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高原冰川，有80公里长；这个巨大冰川也存在融化问题，这里会定期出现一个高山湖，且这个湖几乎每年都会造成洪水泛滥。

1) 这是否可联系存在类似大禹治水 and 女娲补天的传说吗？类似榉溪河龙潭“龙脚印”，盐亭境内的现在的举溪河及梓江河，其河床石底还留有冰川冰臼遗迹之处，这不是张文敬教授说的距今约1万年后的现代冰川冰臼遗迹，而是韩同林教授说的这之前的冰川冰臼遗迹。韩同林教授的《发现冰臼》一书中，已提及榉溪河境内的冰川冰臼遗迹情况。这还是“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才保护了这些遗迹的，而河床能保护干涸的盆塞海沉积物遗迹，只因在河中才无人去破坏。

例如，解放后的修小水库、围河造地、养鱼等社会造势，这类沉积物遗迹很多已在遭到破坏。2001年笔者曾带四川科普协会主席董仁威高工组织的科考队，到盐亭县榉溪河龙潭村河段的河床察看冰臼遗迹；因为上世纪50年代，笔者亲自看过那里有约一里路长、半里路宽的石板河滩大面积，全是像砂锅大小不等的壶穴状凹坑，但此间看到的，已在围河滩造地、造养鱼池下，面目全非。

何拔儒比钟毓龙大22岁，就生长在盐亭。他从自然大地震、山崩地裂、堰塞湖、溃坝等联系黄河与长江，推测两大河的水有可能同时形成大堰塞湖，

淹没四川盆地。所以，也许不存在海水浅，不能引发海啸的水源问题。至于大面积的沉积物，何拔儒先生考察到盐亭特殊的丹霞地貌“洋港子土”。按地质教科书解释，丹霞地貌是造山运动之前海洋地貌留下的沉积物，那么上古四川堰塞湖变盆塞海，只需考察丹霞地貌以上的沉积物了。在盐亭，从北面柏梓地区到南面玉龙地区，沿梓江河流域，有既连续，又间断的高山鹅卵石延伸带，说明在丹霞地貌造山运动之后，还有过特大地震，使盆塞海之前的地貌变成了高山。其次说明在盆塞海之前的地貌，有过大河，是黄河还是嘉陵江最早的古河床？只能存而待论。

2) 1970 年大学毕业，笔者被分配在綦江铁矿地区参加大打矿山之仗，綦江铁矿在土台乡。从綦江铁矿矿部到土台乡政府要上一座大山，土台乡政府就在大山顶上的“小平原”上。盐亭玉龙镇是笔者的家乡，又曾工作在重庆綦江铁矿，有近五年间多数是沿嘉陵江、涪江和梓江流域，从重庆经遂宁坐长途客车探亲回家。从綦江小渔沱土台山到盐亭玉龙镇西仔山相距千里，以两地的山顶“平原”作标杆，从长途客车外似乎可以望见沿嘉陵江、涪江和梓江流域两岸，有连成一线的大围坪台地时隐时现。因为在榉溪河畔玉龙镇政府旁的西仔山，山顶上也类似有一个“小平原”。据原玉龙区粮站站长石云龙老先生介绍，西仔山后面的红石坝，他找到过大量的古桑化石。还有家在西仔山的网友介绍，西仔山烧砖和修公路，发现有大量的干涸沉积层。对澳大利亚海啸地貌学，那近五年间也就在脑海中时隐时现，到此时笔者才算“读懂”了少年时在家乡听大人传说何拔儒先生关于盆塞海的推证。

2011 年中秋节前后，中央电视台大讲钱塘江潮汐。有一位访谈学者在回答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中说，钱塘江潮汐现象规模之大和奇特，在全世界并不多见，只有几处可比。这奇怪吗？潮汐在全世界到处都有，为什么只有钱塘江潮汐现象有此规模和奇特，访谈学者说是由一些特定的条件形成的。同理，盆塞海波及整个巴蜀，为什么只在从榉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的数百里留下鲜明的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也许也是由一些特定的条件形成的；但也有如中国地质科学院有学者说的“远离海沟和俯冲带，根本不具有发生海啸的地质条件”。

即如果四川在洪荒的历史时期存在盆塞海，那么从榉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的数百里，有没有形成类似海沟和俯冲带的地质条件呢？实际 如果还原盆塞海，就像钱塘江潮汐从长江口上溯到越来越窄的钱塘江面一样，沿嘉陵江、涪江和梓江流域到榉溪河畔，几千年中多次发生的海啸，形成类似

近海沟和俯冲带的一种巨大的海浪，当其接近榉溪河畔丘陵山地的浅水区时，波速变小，振幅陡涨，骤然形成“水墙”，瞬时入侵沿岸山地；那一次次冲刷掉山腰表面的岩石和泥土，才刻蚀出现在还可考的台地大围坪海啸地貌，如何呢？

(2) 也许对何拔儒的质疑，就集中在地质学的涸海冰川冰白地貌与海啸地貌之争上。“5·12”大地震后，2010 年在《第四纪研究》杂志第 4 期上，李海龙和张岳桥、李建华等科学家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向河流系统及其伴生古堰塞湖研究》。李海龙等人提出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向河流系统的概念，定位该系统包括岷江、青衣江、大渡河、鲜水河、雅砻江等总体呈现南北走向的河段。这些南北向河流系统的形成演化，具有构造和气候双重意义。

因为晚更新世以来，南北向河流系统发生多次堵江事件，形成数套堰塞湖沉积。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是如何形成的？有环境地理学家认为，远古长江和黄河上游四川、云贵、青藏、陕甘等地区高山冰川，在 20000--8000 年前的第四纪大冰川末期的迅速融化，不仅会改变当地的地质情况，也会引发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及其溃坝等灾难性后果。

1) 与李海龙教授想法能够对应的是，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张文敬教授，对第四纪大冰期末期以后四川的冰川研究。张文敬教授说，中国是一个山地冰川特别发育的国度，也是世界上中低纬度山岳冰川数量分布最多的国家。

据中国冰川之父施雅风院士领导的中国冰川编目组的精准统计，截止新千年伊始，中国还拥有现代冰川 46377 条，总面积为 59425 平方千米；它们分别发育分布在中国西部的新疆，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和四川等六个省区。把李海龙先生说的约 1 万年前，全部溃坝的古堰塞湖涉及的岷江、青衣江、大渡河、白龙江等长江上游水系，与张文敬先生说的中低纬度山岳冰川山系的划分对照，在四川境内五处现代冰川作用区分别是：雀儿山冰川区，沙鲁里山冰川区，大雪山冰川区，邛崃山冰川区和雪宝顶（属岷山山系）。

张文敬教授说，最早西方冰川学家，在研究北极、南极和阿拉斯加等地末端伸入海洋的冰川时，发现这些冰川活动层以下的冰川温度，都接近于零度：这对于冰川而言，就是比较高的温度了。因此他将其命名为海洋性冰川，也就是冰温比较高的冰川；这包括四川冰川在内的横断山和藏东南冰川，冰川末端下伸得比较低，冰川温度都接近于零度。张文敬先生说，四川的这些冰川，是川西高原的固

体水库，是四川许多江河湖泊水流之源。现在根据张文敬教授的介绍设想，这些山系冰川，都参与了距今2--3万年至5000年左右西南地区8级以上的大地震，它们也许涵盖了李海龙教授说的，大约1万年前左右全部溃坝的古堰塞湖景观。这难道不是更能增加造成远古四川盆塞海，以及盐亭等嘉陵江的中下游的大围坪地貌形成的可信度吗？

但张文敬、李海龙等教授与何拔儒先生想的是两码事，专业科学家要吃饭，要养家糊口，何拔儒先生的“远古联合国及四川盆塞海地理形成”的探索，是冲着要搞清远古人类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事实来的；他追求的仅是个人的学术愿望，没有人买单，成败自相知。

2)再说韩同林教授2004年出版的《发现冰臼》一书中说，在距今约2--3百万年的第四纪早期，全球气候曾发生过一次人类尚未认识到的惊人的降温事件：全球大约有3/4的陆地被冰雪覆盖，而且那时冰臼的发育遍及地球3/4的陆地，可谓“冰臼时代”。与韩同林的冰臼时代观点类似的创新，有刘东生院士的黄土研究被誉为认识自然历史、气候变迁的第三本书。我国的历史学家群体或地质学家群体，有一种说法，黄河流域这片中华民族的伟大发祥地之一的地方黄土多，是因为人类在这一带开发时间跨度得过早、过久的缘故，体现了黄土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发展的密切关系。1955年刘东生院士由于参加多学科专家组成的考察队，对晋、陕、甘等地区进行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考察，才慢慢认识到，日常概念里的黄土与地质学上的黄土有相连又有区别，中国黄土高原的这种黄土，是几百万年的“沙尘暴”的结果，它的形成是十几万年来的事。

还有陈国达院士的地洼学说，在这之前关于地壳演化及运动的大地构造学，地质学家群体仅停留在“非槽即台、非台即槽”的“地槽--地台学说”局限上。陈国达院士在1959年开始认识到，继地槽--地台阶段之后，还有造山型的强烈地壳运动，它不是地槽历史的重演。其标志是它里面没有海槽而具有特殊的以陆相为主的盆地，叫做“地洼”，故又叫它为“地洼型造山运动”。从地质学探讨盘古文明大爆炸有类似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地理，这在我国用海啸地貌学最容易引起的争论，是现在这个盆塞海，早已经不存在。

(3)海啸的定义是指一种巨大的海浪，主要是由海底地震、火山喷发、海岸崩塌、滑坡等海底地形大规模突变所引发的具有超长波长和周期的一种重力长波。这是与潮汐靠星球引力营造地貌力完全不同的地方。那么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是如何形成的呢？有环境地理学家也从现在的地貌内蕴

来引导，如内蕴几何学的科学智慧的火花，启示了海啸地貌学。如在内蕴几何学建立之前，平面一直被作为三维欧几里德空间中的图形来研究。但高斯和黎曼等数学家受平面几何能通过专注于平面本身得以研究，建立具有点、线、面的一些定理和用参数来表示的表达式的引导，为曲线、曲面一类更为宽泛的空间发展了一种内蕴几何学；这一几何学是内蕴于平面的，并且与周围的空间没有关系。例如把三维欧几里德空间发展到n维空间并当作一个流形来讨论，可用流形自身可确定的量来定义。类此，海啸地貌学中的地貌，不就类似记录、档案吗？反之这些记录、档案内蕴于地貌，盆塞海不存在了，但仍可以用它的“流形”自身可确定的量来定义。

1)其实海啸的老定义在我国的旧教学中是有遗漏的，如说主要是由海底地震、火山喷发、海岸崩塌、滑坡等海底地形大规模突变所引发的，其遗漏的是，还有神秘的古陨石引发古代海啸之说。这与老定义着眼于潮汐靠星球引力营造地貌力完全不同。那么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是如何形成的呢？有环境地理学家也从现在的地貌内蕴来引导，如目前在国外，计量历史学已有数十年的实践，但在我国出现的速度却异常缓慢。海啸地貌学，在我国没有，不等于在澳大利亚没有。因为海啸地貌学，是由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地理系的布赖特教授等科学家建立的。他们经计算发现，海啸袭击海岸的大滑坡，可导致对邻近岛屿产生高出海面达约375米的巨浪。于是他们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岸，寻找海啸的遗迹，发现有力的证据来自岩石台地：

这些台地通常盖有年龄达约10万年以上的沙堆层，然而高度不到40米的山岩都已经变得光秃，处于未经风化的原始状态，有一处地方显示曾有许多布满棱角且重量约20吨的岩块从岩石表面被冲刷掉。这种清晰刻蚀的形状，只有在岩石被至少每秒10米的急流冲刷才会产生，并让岩石改变面貌。以新南威尔士洲为例，那里许多海岬的北面是悬崖，没有零散岩石块，而南面则缓慢倾斜入海。在过去，有人把沙丘的消失归因于暴风雨或者河水的冲刷，但布赖特等科学家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即使是带有7米高巨浪的大风暴，也无法强制把岩石台地磨光。那里作为海啸地貌学的研究平台，不会是伍伦贡大学等科学家的臆造。

2)我国对海啸地貌学容易引起争论，也许是因为我国虽是一个地震灾害大国，但却不是一个海啸灾害大国，无澳大利亚类似活的海啸地貌学研究平台。然而在远古我国西南的盆塞海，既是一个地震灾害多，海啸灾害也多的地方。但后来这个盆塞海干涸了，中华文明转移到中原地区。事情也许就完

结了。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却困扰着数代中国人。2011年8月笔者在“科学网”的“个人学术展示”专栏发表了一篇短文《螺祖与内蕴海啸地貌学》，其中说：“海啸问题，我们是把海啸学当作一种地貌来讨论的。这只是原有的海啸地貌学”。

“关于螺祖，地质学家从不关心螺祖存不存在？是不是盐亭人？地质学家不关心无所谓，但螺祖存在和出生在盐亭，却引起求学国内外的学子们的关心。他们把地貌的很多特定参数和能构成海啸的所有可能的地方的特定参数结合，用来讨论巴蜀远古盆塞海及其后来干涸了的四川盆地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创建了内蕴海啸地貌学。同原有的海啸地貌学，内蕴地貌求证方法是一样：地貌类似记录、档案，内蕴海啸地貌学是用干涸了的盆塞海自身可确定的特定参数量定义的，并且没有必要把海洋海啸地貌原有的海水、力源看作是位于某种远古特定条件形成内陆盆塞海，干涸后还要照旧有的必需因素”。

文章发出后，常健民教授提了一个建议：“四川在洪荒的历史时期是否存在盆塞海，只是一个学术认识问题。即使是存在被学者们忽视或者未能够被研究的地貌现象，作为新的见解提出来是可以的，不必马上就上升到XX地貌学那样的高度和范畴。那样容易让其他人认为这是一门新学科，其实充其量只能算是一项新见解、新认知。所以建议采用去掉最后那个学字的说法，比较利于讨论和交流”。

由于笔者曾亲自带常健民教授到盐亭盘古故里天垣盘垭村袖头山、五面山以及螺祖故里的云毓山、炎鼎山、螺村山等地实地考察过，对从梓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的数百座密集寨子山的古生态景观与寨子山下半坡的大围坪台地，在山头与山头之间即使有河流、山沟相隔，水平线延伸数十百公里如此一致所有实际了解，不至于像成都理工大学刘兴诗教授参加1993年绵阳市科学小说研讨会期间，有人提出盐亭存在近万年前海啸遗迹地貌的问题请教他，得到的回答是：“我是教地质的，不用看也是错的”。所以常健民教授的建议比较温和。

3) 比常健民教授更为激烈反对的，是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的研究员李德文博士，他先说：“A、从来就没有过海啸地貌学，更不会有内蕴海啸地貌学。B、四川盆地如果有过海啸留下的证据，那也只能是沉积证据而不大可能是地貌证据。C、讨论问题最重要的是证据以及证据和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新观点的支撑，对论据的科学表达是很重要的。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去亲自查看吧？D、海啸是专指由津波-tsunami引发的自然过程，是一种与潮汐完全不同的地貌营造力。也就是说，海啸证据

这种说法本身就包含了它的成因意义，用潮汐理论来解释海啸证据是自相矛盾的”。

但后来李德文教授却改口了，他说，海啸的成因有多种，常见的是地震断层引起的，另外还有海底滑坡、海底火山塌陷和外星撞击洋面等类型。李德文教授是在得知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地理系布赖特教授等科学家的资料提示下改口的，这丰富了他爱的地貌学教程和最新的地貌学百科全书的定义。他说：“布赖特教授是研究海啸的，并在剑桥和伦敦地质学会出版过这方面的经典文献”----他主要的工作，是致力于外星撞击地球引起的海啸。这里涉及形成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间断变化的景观，是类似外星陨石撞击地球引起的海啸，和地震断层引起的海啸以及海底滑坡、塌陷等因素的概率组合都有。

李德文教授说，“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去亲自查看”。这话不错，但不等于像刘兴诗教授回答的“我是教地质的，不用看也是错的”，是对的。也不等于像中国地质科学院李海龙教授，开车专门到盐亭考察海啸遗迹地貌，但不到已指明的如梓溪河畔延伸数十数百公里大围坪景观去亲自查看，而只是在盐亭县城里游转一下，和只是他到盐亭县城时的公路沿线看过，就说对当地的地貌特点，已进行了总体性的考察，还有照片；盐亭处于内陆，远离海沟和俯冲带，根本不具有发生海啸的地质条件，所谓的海啸遗迹，竟是子虚乌有之事，也是对的吗？

而李德文教授感到的困惑：国内民间学者，关于此研究如果在构造地震成因与地外成因之间游离，将无助于问题的深化和解决。他要求国内民间学者，提供有关布赖特建立海啸地貌学的支持性文献。其实李德文教授可以自己亲自到澳洲去一趟，不是更可信。至于李德文教授说：“地貌学研究无外乎两个主要的方面：历史地貌学和过程地貌学。海啸地貌学无疑是面向过程的，应属于过程地貌学。在讨论学之前，应该优先解决史的问题。在史料悬而未决的情况下讨论建立史学，很容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问题。但他可亲自与布赖特教授讨论，不至于在国内难找齐国际上无论是最新的地貌学教程还是最新的地貌学百科全书等可信之东西。李德文教授似乎不爱找国内民间学者在国家出版社，出版的有关对巴蜀盆地地貌演化历史的著述。

【4、和平与发展的智慧从哪里来？】

2021年3月三台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印出版、由绵阳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的刘文传主任编著的《李珣研究》一书，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古代外国人出生在中国内地的后代，传代几辈后已经融入中国社会，还算不算中国人？以及如何看待这类古

代中国人取得的科技成就：是把它看成“抑里扬外”之作，还是助科技振兴中华与海外的双赢？绵阳市政协副主席沈其霖教授，2020年8月1日在为《李珣研究》一书作《序》中说：“从中医全程参与新冠肺炎的防治来看，其理论的系统性、辨证选方用药的精准性、实践的有效性，都充分体现了中医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所发挥出的应有作用”。

在他的《序》文“重新审视中医药”一节，沈其霖主席说：“1992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破天荒地设立了补充与替代医学中心，专门负责研究评估包括中医药在内的各国传统医学。1996年4月美国正式批准承认针灸合法化那年，仅在美国登记注册的职业针灸师就达11290人，中医诊所7000多家，经中药和针灸治疗的美国患者占病人总数的70%，每年使用中药材达35000多吨。在德国，因偏重用自然药物治疗疾病，中医特别是针灸对那些早已对西药毒副作用恐惧的病人很有吸引力。在英国，通过对《草药与针灸立法管理议案》的听证。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大约有近70%左右的国家和地区，正在使用中医技术和中药进行临床治疗和科学研究”。

沈其霖主席坦言：“《药物学家、花间词人、波斯后裔、一带一路先行者——李珣研究》一书，对于提高我市文化品位和在中国乃至世界医药史上的地位，都大有裨益。这不但说明了绵阳地区（包括梓州）的古代先贤名人、名医辈出，还表明了我们对历史名人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真有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所言：‘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之感。中医的疗效从古至今一直呈现在世人面前，只是此次疫情，更加凸显了它的作用。如此科学有效的学科之所以今天仍然不能被一部分人所理解，是因为目前的实验研究手段，不能直观有效地解释其内在机制，更加催生了社会对中医的误解，激化了是否将中医作为科学看待的矛盾”。

而刘文传主任为自己的书写的《前言》中，他是把李珣定位为“一带一路上的先行者之一”的。他说：“本书即通过介绍在唐末五代时期，来西蜀梓州（今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经商、定居、求学并深度融合当地社会且有不朽著作和光辉诗篇的波斯人后裔——李珣、李珣等人的事迹和相关文献资料等，以期纪念‘一带一路’上的先行者”。

刘文传主任的“现实主义”溢于言表，他说：“2013年9月和10月，习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李克强总理参加201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早在我

国的汉唐时期，中国就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国家建立了互联互通，实现了人员和经贸往来，许多中国商品被销往国外，许多外国人来中国经商，并在中国学习生活，只不过由于古代交通的不发达和战争频发等因素，贸易规模较小且时断时续。但是，在这历史长河中却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人和事。21世纪从海上联通欧亚非三个大陆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形成一个海上、陆地的闭环”。

沈其霖主席的《序》和刘文传主任的《前言》启示，编定《李珣年谱》时，使我们对众多突出“波斯商人后裔”的模糊说法感觉不妥，逐渐搞清李珣应算中国人——李珣（公元896—960），回族先民。五代十国时前蜀梓州郪江镇（今四川三台郪江镇）人。为啥说是“郪江镇”？

三台县，是以县西三台山得名。三台历史悠久，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郪王国，国都在今三台县郪江镇。到汉高祖公元前201年，才在此置郪县。南朝“萧梁”时，置涪城县；元朝至1283年，涪城县还并入过郪县。此后历代在此设县、州、府等，名称各异，主要用名有郪县、梓州、潼川府；治所也在今郪江镇与今三台县城（潼川镇）之间反复变化。为啥说李珣是“回族”，是中国人，不是波斯人？

因为即使李珣的先祖李苏沙是波斯人——但李苏沙早在公元821—824年的唐朝时来华，在唐把姓改姓李。李苏沙死后，他的后代留在唐朝；安史之乱时他的后人中，就有李珣的前辈及父辈入蜀定居梓州郪江镇。到李珣896年出生，已是李苏沙来唐71年后，李珣已是融入中华第四代回族人。称李珣为波斯人或波斯后裔，是不准的。

1、李珣是中国人找“回族”定位依据

2013年10月25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给《〈海药本草〉梳理》一书写的《序言》中说：“在丛书出版之际，我谨代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参与《海药本草》梳理项目的各位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衷心希望丛书的出版能够为促进民族医药学术进步、推动民族医药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而《〈海药本草〉梳理》一书的作者高如宏教授，在2013年11月3日写的《〈海药本草〉梳理》一书的《前言》中说：“《海药本草》是回医药重要典籍之一，为全面抢救与系统传承回医药文化，2010年7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立项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设立‘民族医药文献梳理’研究项目，对回医药文献开展抢救性传承研究，由此直接发挥文献抢救与传承作用，并以此指导临床工作。《海药本草》成书于五代时期，作者李珣，原书于南宋末年已亡佚。但据《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对其内容记

《海药本草》梳理载，尚志钧（1918--2008）先生整理了《海药本草》辑本”。

高如宏教授还说：“《〈海药本草〉梳理》以《海药本草》辑本为底本，然后对个别药物出现在《回回药方》中，有回药名称者，赋以回药名。《海药本草》成书之时，正值战争纷乱，书中个别内容受当时政治、经济影响，而与回族生活习俗尚有一点偏离，故经宁夏回族自治区民委相关专家建议，予以梳理。充分反映了回医药历史文化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特点，展现了唐末五代时期回医药发展、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外医药贸易的繁荣景象。为深入研究回药学、本草学、回医药发展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提供了重要借鉴，也为推动回医药加快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海药本草〉梳理》在研究整理过程中，得到各位回医药专家、学者的鼎力相助，方得以顺利出版”。

2、《李珣研究》类似挖出个“三星堆”

读刘文传主任写的《李珣研究》一书，感觉好像挖出了个“三星堆”——他在书中多处点明：“关于李珣生平资料，正史和野史笔记涉及较少”。“《海药本草》在战乱中散失”。《海药本草》“原书于南宋末年已亡佚”。“李珣身上的文化特质是中外文化的融合与冲突”。“李珣生活的唐末五代是一个乱世”。李珣“是一位在中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双重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优秀词人”。“一部介绍和总结外来药物的专著——《海药本草》在李珣的手中诞生”。“《海药本草》是回族医药重要典籍之一”，等等，说明如今“李珣研究”更有探讨和挖掘的价值。

李珣写《海药本草》一书之前，已经有《回回药方》、《胡本草》等书名的药书，李珣不用《新修胡本草》、《回回药方拾遗》等书名，而用“海药”，《海药本草》仅“是我国介绍和研究外来药物的第一本专著”？或者如2018年4月25日《广州日报》发表的文章所说“李珣所著《海药本草》载了唐五代时期传入中国的131种药物，绝大多数来自海外，仅一小部分产于今天我国西北、西南地区，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介绍和总结经海外贸易传入中国的外来药物的专属本草著作”吗？《海药本草》不仅是回药、胡药，更是寻根求发展之书。

正如广汉挖出“三星堆”，仅是搞个旅游，创点收吗？“三星堆”显示远古巴蜀盆塞海干涸后，四川盆地仍然保持过“远古联合国”的繁荣先进。为啥这种繁荣先进在约三千多年会消失得荡然无存？后来之人又如何能在遵纪守法之下，振兴西部、振兴西南，强国富民，为“湖广填四川”的兴衰轮回的悲剧不再多次历史重演？因离唐末五代时的李珣最近的一次波澜壮阔的著名探索，是《三国演义》书中介绍的“张

松献地图”。1956年笔者十岁在盐亭县玉龙罐子沟完小上高小时，读到一本带插图的儿童读物《张松献地图》的字书，写得道德震荡，通俗动人；张松、刘璋、刘备是好是坏？使很多少年百思不得其解。

(1) 李珣献海药与张松献地图的不同

1992年笔者调到绵阳市里工作，36年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使之前的原是荒山的绵阳富乐山，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仙山：山顶富乐阁拔地而起，直入云天，蔚为壮观；山上山下，金壁辉煌，游人如织。可见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把国家建设好。而从目前绵阳发掘的东汉大量文物，如铜马、摇钱树、铜佛像、说唱俑等来看，刘备之前四川的经济文化是较繁荣的。把“张松献地图”看成是西部人开发西部，是不是把张松拔得太高了？因为张松即使有这类底线，那他又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不能不联系到魏晋当时波澜壮阔的玄学思潮。

2017年7月10日《华西都市报》发表的《蜀中名士张松：一张地图促成三国鼎立》一文中说：“东汉末包括后来的三国蜀汉政权中，有一批像张松这样的本土名士，无形中形成一个本土利益集团，与来自外地的其他利益集团既合作又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保护自身利益和百姓不受侵害——三国鼎立在三国历史上，张松的形象并不好：内奸叛徒、卖主求荣、自负狂妄、卑劣无耻、人品低劣等标签。张松真的就那么不堪吗？一说张松是绵阳人，家在富乐山下，他在那里修建了一所张氏庄园。刘备入川后，与刘璋在绵阳相会，地点就在张松的张氏庄园里。另一说是，张松不是四川人，是外地人。从《三国演义》中，张松在与杨修的交谈时，对益州风土人情的熟悉，以及其中流露出的热爱来看，结合《三国志》的记载，张松应该是四川人”。

2001年8月20日至9月24日《绵阳日报·科技城导刊》，连续六期发表《张松与绵阳》的探索文章。此文的“现实主义”，笔者结合多年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智慧是从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中来”的探索，去跟进当时全国各地兴起的“旅游开发热”来解读，看其中在9月3日发表的《张松与绵阳·3》篇上说：玄学的问世，不仅仅停留在抽象思维的层面上，更表现于士人的“异行”与“疾言”间。张松是刘璋手下的别驾从事，官做得够大。他哥哥张肃又是四川广汉郡太守，可见他和他的家族够荣华富贵。

据来敏《本蜀论》载：公元前316年，“秦使张仪、司马错循路灭蜀”，绵阳入秦版图。相传张松正是张仪之后，支庶因居于此。绵阳也成为掌掴军工、军马、贸易的贵族挥毫之地。张家以后相继又效忠两汉和王莽政权，被人称为极具转型的豪门。今天

在绵阳多处出土的西汉大墓、漆马阵、漆器、人体经络漆雕、瓷壶、陶俑等文物，都能印证上述的许多传说。高也陶教授说：“涪水之滨绵阳市，是黄帝故里及黄帝医术最早整理的地方。第一次，在黄帝、嫫祖、岐伯故里，岐黄论医。第二次，李柱国携未整理修订完成的九卷，避难岐伯故里，就是寻本追源，前来完善”。1993年2月至4月间，绵阳县永兴镇发现汉代古墓被定名为的永兴镇双包山2号汉墓，发掘此墓葬的后室时，得到的一些漆俑中间，有一具头、胸、背、手部等周身表面上，有用红色漆线描绘的遍布全身路线的人体经脉十余条的、髹有黑漆的木制人形---被考古定名为的“人体经脉模型人体经络穴位的木质漆人---经脉漆雕彩绘经络漆人”，当为后世的针灸铜人之先声。

有人说“李柱国就是涪翁”，这只能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涪翁”是古代长期在绵阳的涪江和安昌江交汇口形成的天然三江半岛小平原，被作为国家秘密的军马养殖场，为其服务的一批老军马军医；他们把从岐伯时代就流传下来针灸治病之术，从人体结合到马、牛、羊等动物的针刺治病上，大大丰富了人体针灸循经的穴位路线而声名远播。作汉朝太医的李柱国当然是知道的，也许他就是从这个群体家庭中走出当上医官的；退下来回到绵阳继续帮助整理针灸循经理论也很自然---而且李柱国没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和丰富经验积累，也不行。

相传绵阳早在秦至西汉到唐朝，就曾是个繁荣的军工重镇，当时隐蔽在涪江和安昌江之间的百里平川，是国家军马血汗马良驹养育场---涪江和安昌江交汇百里平川之外的沿江山麓，到处是国家建的兵器生产作坊，和向西北供应物资的集散地。工商业的发达孕育出高超的科技文化，如传说涪翁们的祖祖辈辈是育良驹、医战马的行家，积累了丰富的医术，传至李柱国时的涪翁结合人医才造出了经络漆人。

接着在9月17日发表的《张松与绵阳·5》“战争和旅游”多极性等讨论篇中说：“张松引进刘备，也引进了一部战争史、英雄史，为后人留下一笔意想不到的财富。因为这是四川近1790年历史上，从未有超过《三国演义》宣传影响的大规模的战争诗篇、英雄诗篇。开发‘三国文化’旅游，也可以说是化战争为旅游的一种包装”。“也许旅游是上天和社会发展，最后赏给人类生存的一种最奇妙出路的模式”；是“因战争对交流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弱者因怕这种交流会更加封闭。而旅游对弱者和强者都具有极大的建设性---因为旅游的多元特色，能以国际准则、依法治国，以及市场经济、品牌促销来挣钱。由此看来，所谓的‘道德’，也应为是‘亮实’竞争：外保主

权，内促交流。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多极化与全球化的统一”。

2001年我们读《张松与绵阳》这篇探索性文章时，还没有发生2020年至今仍然在全世界流行的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封城锁国，对旅游的破坏性，一点也不比战争对旅游的破坏性弱。虽然在该篇中，也提到：“战争就类似众多的黑客和病毒的联合，攻陷网站的事件”，但还没有单独把类似“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列出，或许是一种遗憾。

(2) 用与回族同志亲身交往经历研究李珣

读刘文传主任的《李珣研究》一书，也勾起笔者曾经有约20年在三段时间与三位回族同志交往的经历，觉得用来研究李珣有启发---笔者出生盐亭的那个山区农村没有回族同胞，上大学前也没有接触过回族同志。但1965年考上大学，9月1日进大学的第一天，就有回族同学把笔者接到大学专为回族同学，办的回族食堂里吃饭---那是在汉口下了火车，被校车接到送去武汉钢铁学院后，已近中午。

此时，老同学们纷纷拿着饭碗进食堂吃饭。随校车接待笔者的那位高年级同学，是重庆人，他突然向拿着饭碗的人群喊：“穆成安，你们盐亭来了一位老乡，快来看认不认识？”从人群中走出一个壮实但个子不高的同学，他一手把笔者拉住，一手接过送笔者那位重庆同学手里的行李箱说：“走，跟我到回族食堂里去吃饭”。这时笔者才知道，整个武汉钢铁学院才七八个回族同学，也专门办了回族食堂。

1964年刘少奇主席参观武钢后，提议把靠近武钢的武汉钢铁学院办成全国第一个半工半读大学的试点---一半时间在大学里上课，一半时间在武钢结合专业劳动。武钢付给工钱，在校学生读大学不用交伙食费，学校全包。每餐吃饭，是印上时间的用餐券。笔者听了真高兴极了---在农村的父母年迈，两个姐姐已出嫁，弟弟身体不好，家里太穷，好不容易才筹够一点钱送上火车。

穆成安是盐亭中学1964年考进武汉钢铁学院化工系的学生，在盐亭中学读书我们都见过面认识，但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所以并不了解。武汉钢铁学院从1964年起从四年制改为五年制，全校三个系总共才约1500人，高年级的四川学生也才10多人，那时老乡关系很重，又在一个食堂吃饭，所以相互都认识。想不到第二年的1966年发生文化大革命，先后院党委、省委工作组都不存在了，到1967年初上海成立“人民公社”，武汉也发生造反派夺权，武汉钢院是红卫兵组织掌权，分裂为“红二司”、“钢铁兵团”、“红三司”三派，发生派性武斗，印刷厂、学生食堂被砸，分成两派各管各。以后学院也没有再恢复回民学生食堂，穆成安和我们一起在大食堂里

吃饭。

那时笔者所在的机 21 班，是“钢铁兵团”和“红三司”的主力，冶金系和化工系是“红二司”的主力。由于进校就跟穆成安走得很近，穆成安在化工系虽然参加的是“红二司”，但思想并不前卫。笔者在班里对“钢铁兵团”和“红三司”都没有参加，除跟机 64 级的成都人李友荣同学，一起组织留校同学“复课闹革命”，帮助请老师上课，帮助同学们买课本外，所以大部分时间都跟穆成安在一起聊天玩耍、拉家常，一直到 1970 年 64 级的同学先分配离开钢院。

正是在近五年的时间里，笔者开始了解到回族同胞的一些生活习惯和优良品质。如穆成安说他农村父母家，每天早上喜欢用铜壶烧水泡茶喝，但笔者家没有这个习惯。穆成安曾秘密地告诉笔者，他父母对他非常好。但他读大学后，才从两个姐姐口中得知他是从汉人家出生后，被现在的父母领养长大送大学的。因为在大学的化工系班上，有一位叫“梁可儿”的广州女同学一直追求他。如果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结婚，“梁可儿”希望他能一起分配到广州。她家经济不错，她叫“可儿”，是她家只有一个女儿，父母把她看成“可以是儿子”。

1967 年 6 月间钢院两派武斗，把图书馆大楼也被烧了。到 7 月底学院里都还很乱，穆成安有一天找到笔者，说家里有事，希望陪他一起回老家盐亭看望父母。我们约好回家半个月，到时间我们一起再回学院。但返回时间笔者到盐亭县城等他，好一起买车票返校。可等到晚上，他都有来。那时无法与他通电话，也不知他家在盐亭大兴回族自治县的具体地址，第二天笔者只好一人买车票返校。9 月初穆成安返校了，他悄悄告诉笔者，他没有按约定，是被父母要求他结婚了——对象是一位初中毕业回乡劳动有几年的汉族姑娘，很能干，娘家也没有儿子。当了解到他的大姐已结婚留在父母家时，笔者问他为啥还答应父母的要求，他说还是把父母情看得比“梁可儿”对他好重一些。1970 年钢院 64 级的同学毕业，穆成安表现好、家庭成分好，被分配到四川自贡一个保密的化工厂好单位，笔者也为他高兴。

1981 年 4 月笔者也因照顾家庭，调回盐亭县科协工作后，才打听到穆成安在盐亭县林业局工作，就到他家拜访，才知道他在那家保密厂工作不到三年后，因爱人在农村，又有孩子要照顾，他毅然申请调回盐亭不搞学的专业。开初他被安排在盐亭县林业局搞木材采购，也经常在外县大山里跑。改革开放后大学生落实政策，他被安排在林业局机关当会计，爱人和三个男孩已农转非，进城在一起生活。

笔者告诉他 1970 年 9 月底，我们在武钢参加完 4 号高炉建设的 65 级同学，才搞的毕业分配。自己

被分配到重庆第 18 冶金建设公司下面的一个土建公司，不久就到綦江铁矿小鱼沱麻柳滩参加大打矿山之仗。在重庆 10 年，笔者幸运的是，一到 18 冶不久也认识了一位回族大哥，而且还是穆成安盐亭大兴回族自治县的人，叫“金继平”。据继平哥介绍，他还是笔者姐姐在盐亭中学初中的同班同学。1958 年初中毕业他考上重庆钢铁学校。中专毕业分配到重钢工作，后来 18 冶成立和重钢分开，他调到 18 冶材料当干部；他爱人是 18 冶职工医院的护士，是重庆人。他们一家对人非常热情，笔者每次从小鱼沱麻柳滩回重庆市里 18 冶公司办事，去看望“金继平”大哥，他都要请到他家去吃饭，拉家常。笔者一想起，很感谢。

事情还巧的是，1981 年笔者调回盐亭县科协，很快科协又调来一位回族干部，叫“姜明道”，是与大兴回族自治县相邻的七宝乡人。他是南充师范学院留校的工农兵大学生，学生物的。据他介绍，南充师范学院当时有一位全国著名的开拓研究大熊猫的专家胡锦矗教授。由于他身体好，能吃苦耐劳；母亲去世后他有跟父亲养、宰牛羊等经验，读大学时爱钻研，就成了胡教授带到野外考察大熊猫跟随的助手。毕业留学更是常年被胡教授指派去卧龙、青川、平武等地，从事收集观察大熊猫生活习性资料的科考工作。但他的父亲和爱人及两个孩子在农村，他也只得忍爱调回盐亭。确实他来后，县上落实大学生政策，他的爱人及两个孩子都农转非，也都搬到科协家属楼里来居住。

笔者和姜明道共事四年多，当时科协领导分配给他的任务是组建乡镇农村科普协会，帮助农民创收。他单独下区乡时间多，他没有怨言；爱人只能在家开了个缝纫铺，边帮人打衣服边照顾两个孩子的生活。笔者当时除负责科协办公室工作外，还负责科协主办的铅印科普小报《科学知识》。1982 年 1 月 20 日出版的《科学知识》第 1 期，发表笔者写的《生物全息律和自然全息律》短文；小报有少部分是在全国科协系统范围内作资料交换送的，想不到北京市科协主办的公开双月刊《潜科学杂志》，1982 年 8 月 20 日出版的第 3 期改题为《自然全息律》转载发表了。记得姜明道向笔者表示祝贺时，他拿出一本动物学杂志，说他在杂志上也发表有论文，表示要相互支持鼓励。

笔者细看他的文章，是下乡期间，他对盐亭某处山区地点定时间的老鹰、野兔、山鸡等野生动物出没情况的观察统计分析，写得非常生动。有一次晚饭后，到他家去拜访，他正在锅里用盐水煮沸做动物标本。他告诉笔者，这是一件难度很大的科学工作，没有专业训练是不能操作。他拿出各做好的

一个类似鱼类和鼠类的动物标本给笔者看，做的非常漂亮。姜明道同志团结同志，尊重领导。1984年盐亭县要做换界选举，有推荐他作非党副县长人选的。不知怎么他1985年调到青川县去了，后来听说他当了青川县黄金局局长，负责金属开采。

总之，这近20年与三位回族同志亲身交往的经历，增进了笔者对回族同志生活能力的顽强，对人处事的豁达的敬意。笔者在大学时读过一本1963年出版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卡斯特罗写的书，还记得其中他说的一段话的大概：“我在过去奋斗的年月里，曾经得到过很多人帮助，当时无法回报，现在想起来，只能把这些人记在心里表示感谢”。笔者对这段话的记住，也因曾经得到过像穆成安、金继平、姜明道等回族弟兄的帮助，当时无法回报，现在想起来，只能把他们记在心里表示感谢。因为在那些非常时期回族同胞的故事，非常令人难忘——1975年笔者还重庆綦江铁矿麻柳滩工地劳动时，听家乡一位干部说，他当时参加县上派到冯河乡的“无产阶级理论教育运动”工作组，负责冯河乡五大队村的工作。虽然说是整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尾巴”，当然主要工作还是带领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修水库。五大队村的回族农户较集中，有一个“案子”反映叫“达鹏怀”的回族农民，是“牛贩子”，时常到达县等大山收购老牛和残疾牛回冯河乡，分散到一些回族农户家请帮忙饲养，然后慢慢屠宰到盐亭城关自由市场悄悄出售赚钱。这个涉及民族习惯政策的问题，当时只是批判，要找一些较困难的回族农户，起来揭发做生意的达鹏怀。

但工作组感到工作难做，一是他们不愿意站出来揭发，原因是这些做“牛贩子”生意的回族农户，常是把卖完牛肉剩下的牛骨头，分给这些经济较困难的回族农户，因此他们觉得比经济较困难的汉族农户还要好些。此外回族农户家的大院都养有狗，如果去作家访知道是搞运动，连狗叫，也不拉住。这些现象反映到县上。据说县人大中有一位叫“达鹏富”的回族领导，也帮助回族农户说好话。1985年开始，笔者被选为两届县人大代表，第二届还被选为县人大常委会委员。认识了当时这位叫“达鹏富”的县人大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他确实掌握政策准，对人对事感到实事求是。

在这期间，笔者还看到“县民宗委”一位很有才华的叫“达鹏轩”的年青回族干部，在县志办出版的铅印小报《盐亭春秋》1988年10月1日，发表的《回汉自古是亲戚》文章中讲的“回族的民族起源”。

循着这个信息了解，知道在我国回族是形成较晚的一个民族。但回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一个，目前已超过1000万，仅次于壮族，成为我

国第二大少数民族，全国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分布。宁夏回族自治区是其主要聚居区，全区拥有回族人口186.25万，占全国回族总人口的18.9%。“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回回”最初为他称，后来才演变为自称。“回回”一词，最早见于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指唐代以来安西（今新疆南部及葱岭以西部分地区）一带的“回纥”人（“回鹘”人）。“回回”可能是“回纥”、“回鹘”的音转或俗写。但回族的族源可以追溯到唐代。根据现有史料，在唐高宗的公元651年，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陆续由海路来华，在广州、泉州、杭州、扬州及长安等城市定居。学术界一般认为回族，大致形成于明代，而元代是回族形成的准备时期。

但有《回汉自古是亲戚》的文章说，“老回回”叫法最早发生在公元628年的唐太宗李世民时期——传说阿拉伯的麦加国主海力帅，派徒弟阮朮斯等带年轻力壮的三五百人，前往大唐辅佐。李世民一看阮朮斯带来的穆罕默德的画像，他说“此人正是我梦中所见，当受我君臣一拜才是”。结果这一拜，拜掉了画像上的人影儿，只剩下一张白纸。唐太宗却立即发出圣旨，命护国公尉迟敬德修建陕西大寺，为阮朮斯等人作礼拜和讲经之用。阮朮斯等人来到长安后，从此唐朝也接二连三地扫平藩王、乱军。但这些西方请来的三五百贤客，虽月月都拿双粮双烟，可语言不通，穿戴不同，生活不习惯，时间长了都闹着要回哩。回来回去，李世民就是不放客人走。就这样，回回回地便有了“回回人”的称号。为把回回人留在中原，唐太宗和军师徐茂公等想办法给这些客人成家。回人本来都没有姓氏，后来子女都跟着女方姓，话也和汉人一样。由于回人的习俗和宗教与汉人不同，所以慢慢地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据传，李珣家族就是此时阮朮斯的后人。

【5、李珣研究揭秘“三星堆”】

我国民族共有56个。由于汉族以外的55个民族相对汉族人口较少，习惯上被称为“少数民族”，这55个少数民族中，在绵阳、在四川我们比较熟悉是，回族、藏族、彝族、羌族、苗族。我们研究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以《盘古王表年表》记事纪实，认为“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从西南少数民族传说盘古王南迁和夸父追日等神话故事，暗示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中原、古希腊等世界上的五大文明发源地，都是此“第二孵抱期”扩散到古印度、中东、埃及和古地中海克里特岛、西西里岛等地，被领头的人文始祖及群体造就的。

为啥藏族、彝族、羌族、苗族等先祖遗传下来习俗，喜欢住山寨，而且他们传统的手工艺制品

水平，为啥那么高？就与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有关——在此“第二孵抱期”，也许 55 个等少数民族的先祖，还是属于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掌握实权圈子的铁杆人物，他们后代类似“官二代、富二代……官 n 代、富 n 代”，住山寨也“铁”。

反之何拔儒先生对“汉族”的“汉”字来源的解释：“汉”字包含从“汗”音以及“汗牛充栋、大汗长流”意思的劳苦、劳累、勤劳、下层大众等延伸：两者都宝藏“多数原则”、“大汉、汉族”等引申；更是“第二孵抱期说”讲的：在围绕青藏高原和远古巴蜀盆塞海经历的海洋文明自然灾害，如超强大地震、大火山、陨石、海啸、台风、龙卷风、暴雨、泥石流等造成地质的山崩地裂、天翻地覆的磨练，在团结抗灾中，才奠定了以团结抗灾中心活动地区的“远古联合国”，和形成了以“多数原则”结成的“汗牛充栋”族群中华的“汗族”，是其来历。

再说为啥要讲“张松献地图”，和与回族同志交往等经历？是觉得生活在西部的人，历史上不管父母的家庭，是富裕还是贫穷，要做出对国家、对人民、对当地有益的事业，和东部沿海能见更多世面的人相比，都要承受更多的生活压力：“张松献地图”——张松是个悲剧人物，对已经融入中华民族而生活在五代十国仍然再遇“乱世”时期的李珣，因是个回族不是汉族，没有“回民”亲身体验生活过的“汉族”学者，不研究对比怎知李珣如何走出张松的阴影？多遗憾。

李珣面对的，不仅有自 5000 年前西南盆塞海逐渐干涸，嫫祖丝绸文明转移到中原而黄帝崛起，到“张松献地图”时期的中国内乱和外患不断；还有“第二孵抱期说”时期移居阿拉伯麦加地区“回民”的先祖们，经历“伊斯兰教”的崛起，到“穆罕默德”病逝后麦加的内乱和外患不断。这里要问：为啥唐太宗李世民还要引进西方国主海力帅派的阮玘斯等三五百人年轻人？其实他们辅佐，并没有上战场。

1、为啥唐太宗引进伊斯兰教能称“威”？

几千年间留下的中外文古籍，有不少是关于崛起、内乱和外患轮回生活和生产的总结。《2014 世界科技排名》第 13 名无出海口的内陆国瑞士，至今顶级奢华的瑞士名表仍不衰。人们会想到瑞士是永久中立国，想到它的银行，想到瑞士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这座学院，在历史上培养了数不清的大科学家。从瑞士名贵手表销量经久不衰，如享誉全球的劳力士、欧米茄等手表超霸系列，就会联想到瑞士的中小机床可以独步全球，加工精度甚至可以令其它发达国家望尘莫及。

瑞士是处于内地的小国，类此处于中国内地的西部地区，如何崛起？还要从本地生产出经久不衰

的商品等才行——李珣选择写《海药本草》，也是有意让他的家乡远古郡国迁出或留下的三台人，实现从本地生产出经久不衰的商品等愿望。有学者作三国魏、蜀、吴整个历史时期的人口资料研究，发现吴国孙权所属地区的人口，是三国中增加最大，而且对后来对中国北方及巴蜀人口的恢复才有贡献的。吴国还是魏国和蜀国灭亡后才被晋国统一；相反魏国和蜀国因战乱、瘟疫等自然灾害频繁，人口减少，生产破坏——李珣也许想到类似今天希盼的“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李珣抒发在《花间集》等书中的词作，继而奋发写完《海药本草》，就有这类体现。总之如果西部人有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这一智慧，都应该说是从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中来。但和平与发展有何方法？

软硬，远看伊斯兰教——唐太宗引进阮玘斯等几百人年轻人辅佐，并没有上战场，是搞“软的”——按回民习俗在城边修教堂，看阮玘斯等人带回民作礼拜和讲经，其意义在与隋唐先引进的佛教“软的”高高在上不同——佛教寺庙多建在远离人市的山寨，讲经和伊斯兰教联系本土所属听众切身的的生活、违规，关注不大——反之，对唐太宗要的“硬的”，即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显然佛教要比回教差得多。

那伊斯兰教起源于何时呢？为啥与“硬的”动武有关——伊斯兰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之一，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系阿拉伯语音译，为“顺从”“和平”原意。信奉的人，统称为“穆斯林”。但在《盘古王表年表》上，伊斯兰教其实起源很迟——成功就相当于唐朝初年，与唐太宗登基同时——7 世纪初伊斯兰教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由麦加人穆罕默德（约 570--632）创传。唐太宗要学穆斯林部分手腕。

6 世纪末至 7 世纪初，阿拉伯半岛正处在原始氏族部落解体、阶级社会形成的大变革时期。伊斯兰教的兴起，是阿拉伯半岛各部落要求改变社会经济状况和实现政治统一的反映。穆罕默德创传伊斯兰教，在宗教革命的旗帜下，领导了阿拉伯的社会变革运动，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就生于麦加城古莱什部落哈希姆家族。

622 年 9 月穆罕默德同麦加穆斯林迁徙麦地那，标志着伊斯兰教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630 年穆罕默德以麦加贵族违背协议为由，率领穆斯林军队，进逼麦加城下，以艾布·苏富扬为首的麦加贵族被迫请降，接受伊斯兰教，承认穆罕默德的先知地位，麦加全城居民宣布归信伊斯兰教。631 年末，半岛各部落相继归信伊斯兰教，承认穆罕默德的领袖地位，基本上实现了半岛的政治统一。

632 年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病逝。至此，伊斯兰教成为阿拉伯半岛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穆罕默德逝

世后，伊斯兰教进入“四大哈里发时期”，随着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对外征服，伊斯兰教向半岛以外地区广泛传播，史称“伊斯兰教的开拓时期”。661年起，伊斯兰教进入阿拉伯帝国时期，历经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地跨亚、非、欧三大洲，伊斯兰教成为帝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传闻628年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不久就梦见“穆罕默德”，也是因为传闻“穆罕默德”征服对立派了不得。消息传到唐朝，正合唐太宗统一中国学习的口味。

2、为啥回族称“回”有多说？

在当今中国的土地上，无论是什么民族，不管怎么说，都不可能是“化外民族”，脱离中华民族群体——经过世代的生息繁衍，大家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不管信仰何种宗教，共同热爱我们的祖国才是硬道理——今天的回族与历史上的回纥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维吾尔族，但为什么不叫维吾尔族“回”，而叫“回族”人“回”呢？

这个问题实际上有些复杂。首先是因为宗教的关系——历史上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是唐初，陆上与海上基本都可同步进行，但海上似乎要比陆上早一些，即一般认为是在公元651年（唐朝永徽二年），从阿拉伯传入中国的泉州、广州等地。那时是伊斯兰更称“威”的时期，距离“穆罕默德”很近称“威”传过来的正教，当时主要是一些阿拉伯商人，士兵和阿訇——据《闽书》记载，唐武德中来朝，“穆罕默德”徒弟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而陆上的传入，似乎是在安史之乱，阿拉伯帝国帮唐朝平乱。之后，其军队中有一些人不想回去了，唐朝的皇帝便将他们安置在了中原，其宗教也便被由陆上带入中原。但这并未形成规模和什么气候。

回顾有说回族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有着悠久历史的回鹘人，唐代迁往葱岭以西，和中亚、西南亚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伊朗人、伊拉克人、阿富汗人以及中亚其他各族人，在融合过程中，回族中的“回”来源于“回回”，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隋唐时期的胡人、蕃客、胡商，实际主要是指来自波斯和中亚地区的人群。这些胡人有侨居也有定居，定居所住的地方叫“蕃坊”，这就是回族习惯把聚居地称为“回坊”的由来。侨居的则来往于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从事商业活动，从事经商的胡人蕃客，会选择寒冷季节到来前赶回去，气候转暖时再回来。回族民间有说法认为，这是被汉语人群称做“回”或“回回”的原因。国内史学界则多认为“回回”是“回纥”、“回鹘”的异写或音转。唐代的在华胡人中，还有波斯和中亚小国的一些王族和平民，他们是为躲避阿拉伯人的侵略，逃亡而来。

在宋朝，才是真正传入伊斯兰教——这是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大致是公元九世纪中叶前后，由漠北回鹘西迁到葱岭以西的一支，再联合当时在这一带地区活动的其他民族和部落联盟，如样磨、葛逻禄等创建的一个地方政权。这个地方政权是中国古代最西边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是向宋朝中央政府朝贡的。但王朝建立之初，也并非伊斯兰国家，而与突厥汗国、回鹘汗国等游牧汗国类似，他们最初是萨满教教徒与拜火教教徒，也有一些摩尼教徒与佛教徒。第一位改宗伊斯兰教的大汗，是第三任大汗萨图克·博格拉汗。萨图克去世后，其子穆萨继位，称阿尔斯兰汗，驻喀什噶尔，继续大力推行伊斯兰教法统治，在王朝各地普遍设立宗教法庭，建立清真寺、经文学校和麻扎，使今天新疆地区的不少民众改宗了伊斯兰教。但是这只关乎今天新疆地区的维吾尔等民族，与回族人关联不大。

总之，元代之前，“回纥”、“回鹘”和“回回”，这三个词在的汉语文献中没有明确的界限，几乎是同义词，在不同作者的汉文史籍中通常是交替混用，所指囊括了西域、漠北胡人直至中亚和波斯一带人群，用回回一词称呼，来自回鹘地带还往西的人则显得更多一些。

到十三世纪初叶，蒙古军队西征期间，一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以及波斯人、阿拉伯人，不断地被签发或自动迁徙到我国来。他们被称作“回回人”，是当时“色目人”的主要部分，后来他们也就以“回回”自称了。即有说回族人的先民，源自介入蒙古军队的西征，共有三次，将蒙古帝国的铁蹄遍及欧亚广大地区：蒙古第一次西征，1219--1224年元太祖成吉思汗，率军与花刺子模国进行的一场战争。蒙古第二次西征，即蒙古汗国的第二次西征，1236--1241年元太宗窝阔台汗遣拔都等诸王，率军征服伏尔加河以西诸国的战争。蒙古第三次西征，1252年--1260年元宪宗至世祖蒙哥汗，派其弟旭烈兀率领10万大军攻波斯的战争。在蒙古人的所到之处，大量的当地居民被征发并随蒙古军队东来，这就有历史上“回回人”的一说。

而且元时，“回回已经遍天下”了。因为是从西域而来，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又与西域的一些民众一样信仰伊斯兰教，所以中国古籍，便借用历史上西迁至西域的回鹘人的“回”，为其命名，时间一久便以“回回人”自居了。元代“回回”在官方或汉语史籍中，除了指已经定居在中国境内的回回人外，通常也指的是比“畏吾儿”更西的人群，也就是“葱岭以西、黑海以东”——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阿塞拜疆以及哈萨克斯坦、伊拉克、土耳其和高加索部分地区。

南宋时，“回回”，除包括唐代的“回纥”、“回鹘”外，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一些民族。

总之，宋元时期，分布在中东部的回回（粟特、犹太、波斯等胡商成分较多）以及部分回纥、回鹘被称为回回人；而分布在漠北一带的部分回鹘、回纥或回回，则联合当地一些民族西迁后形成畏兀儿，还有的发展成为塔吉克、乌兹别克等西域民族。此际，胡人、回鹘、回纥这类称谓，在史书记载中基本消失。“回回”一词明朗起来，在官方的诏谕和汉文记载中凡涉及到民族的一般为“蒙古、畏兀儿、回回、也里可温、河西、契丹、女真、汉人”这类字样。

明代，“回回”和“色目人”在汉文记载中并用。但也有使用“回辉”的现象，如呼和浩特清真寺内，存有“洪武皇帝御制回辉教百字”碑。“杭郡重修礼拜寺记”也有“回辉氏”一语。回族一词做为民族称谓，目前有据可查的是出现在清乾隆时代。乾隆《重修肃州新志》叙述哈密人口向肃州地方迁徙的三族者：曰维吾尔族，其人与汉俗微同；曰哈喇布族，其人与夷同；曰白面回回，则回族也。再往后的年代，“回族”做为民族称谓使用越来越普遍，仅在官方记载中的例子就不胜枚举。总之，从宋元至明清期间，除了明代的撒拉等族外，凡是从这一地区入华的商人、工匠、军士、学者等，几乎都自然的归入回回人里。历史长河中这一地带分分合合，时而统一为一个国家，时而分裂为诸多小国，虽然不同国家不同族群在语言和文化的细部上存有差异，但整个文化面貌和人种上则大体一致，也都有禁食猪肉等古老的西域民族传统。

到了民国，“回”的概念似乎更大了。甚至一些学者，将其解释为“信仰回教（伊斯兰教）的中国人或中国人民”。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为今天所说的“民族”这一概念，是在民国时才传入中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伊斯兰教在中国叫回教。把信仰回教的人称为“回民”或者“回族”是不科学的，如维吾尔族与回族之间，除了宗教的相同，在民族的起源上的差异没有什么认同感的。如果把信仰回教的人称为“回民”或者“回族”，那么是否信佛就可称“佛民”或佛族呢？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回族才被确定为中国独有的一个民族，与维吾尔族彻底区分开来。维吾尔族亦是。但李珣研究联系“回族”，五代十国以后的变迁，都与李珣的认知无关。而发现“回民”远古先祖源于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时的古鄯国人有关，正是李珣。

3、《山海经》中鄯国与回族新说

徐道一教授说：“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争议较多”。例如，四川文史馆员何拔儒先生曾认为：中华

文明是“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何拔儒曾把《山海经》看成是《涸海古卷》---“山海”就是“盆塞海”，《山海经》就是以“盆塞海”文明为中心的古联合国史地志书。他并以盐亭县榉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犹存的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山寨聚落遗址，以及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的地貌作为具体考古平台，提出西部远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大围坪--海啸有关联的假说。理解让这种文明失落证据的是，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四周河流，江水入川，围绕古四川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的。此期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徙也有区别。

《李珣年谱》可循，回族先民李珣（公元896--960），不是唐朝宗室大臣，唐睿宗李旦之孙，宋王李宪之子的李珣（？~737年）。唐睿宗之孙的李珣，出生在长安，民族族群是汉族。公元896出生的李珣，出生地是在今四川三台的鄯江镇---五代十国时前蜀的鄯江镇，是回族先民较集中，繁华程度仅次于成都的一个大县大集镇。

查看地图，鄯江镇在三台县与中江县交界处的鄯江河边，河虽不大，但长且支流多；上游有“鲁班水库”、“继光水库”和“响滩子水库”，下游有“四五水库”、“寸口塘水库”、“星花水库”和“元兴水库”。如果以鄯江镇为中心，到广汉三星堆的距离为半径画圆，那么圆弧西边圈线外靠近成都金沙遗址；圆弧东边圈线内靠近盐亭金孔区的螺祖故里和临近的盘古故里---三星堆的文物与此地转移有关吗？

传闻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时，鄯国都城鄯江镇主要从事远古联合国的青铜器等生产制造、发放销售、回收。这部分先民早来往于鄯国和阿拉伯地区---来来往往，“鄯”同音于“妻”，与妻子回娘家的习俗相似，也许“鄯国”得名，就源于鄯王城住着的是大多数家庭是远古联合国上层的内亲，掌握着贵重交易品的制造、发放和远洋贸易。但在盆塞海遇自然灾害不断，并干涸后随着权力中心的转移，和在人类第二次分散向世界各地的迁徙转移时期，鄯王城的大部分能工巧匠和生意人，成为指导指引一批一批的蜀人，并跟随进入缅甸，沿印度的恒河水，横穿印度出海进入波斯湾，再沿海峡到达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又从埃及和两河流域渡过地中海，先后在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等，去复制“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山寨立足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向导。

直到《汉书·西域传》记载，汉武帝时期希望联合月氏夹击匈奴，派遣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的拓

展成为之一的十分重要的客观后果。公元前 140 年汉武帝刘彻即位，张骞任皇宫中的郎官。公元前 139 年张骞奉命率领一百多人，一个归顺的“胡人”、堂邑氏的家奴堂邑父，自愿充当张骞的向导和翻译。正当张骞一行穿过河西走廊时，不幸全部被抓获。匈奴单于为软化、拉拢张骞，还给张骞娶了匈奴的女子为妻，生了孩子。张骞等人在匈奴一直留居了十年之久。

公元前 129 年，张骞趁匈奴人的不备果断地离开妻儿，带领其随从，逃出了匈奴王庭。在匈奴的十年留居，使张骞等人详细了解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并学会了匈奴人的语言，他们穿上胡服，很难被匈奴人查获。张骞到大宛后，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大宛王本来早想与汉朝通使往来，汉使的意外到来使他非常高兴。张骞由大宛送至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得不到结果，只好在公元前 128 年动身返国。但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骑兵所俘，又扣留了一年多。公元前 126 年张骞趁匈奴内乱之机，带着自己的匈奴族妻子和堂邑父，逃回长安。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共历 13 年，带着 100 多人只剩下他和堂邑父，还有他的匈奴妻子三个人回来，但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被武帝封为“博望侯”。公元前 119 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率领 300 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了乌孙，游说乌孙王东返没有成功。

公元前 115 年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回到汉朝后。第二年张骞死去，但此后汉同西域的关系仍进一步发展，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中国使者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二万人的盛大欢迎。安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从此，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例如大宛的汗血马，在汉代非常著名，“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绵阳“涪翁”们在涪江和安昌江交汇口的天然三江半岛小平原，授命建立国家秘密的军马养殖场，就是那时开始的。

这与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时，郑王国都城迁徙转移到安息国等西方的回族先民的帮助也有关。他们也知道郑国临近盐亭的西陵国，是嫫祖改良女媧时被当为货币生产的丝绸，转型开发普及为高价值的丝绸商品的。因大宛以西到安息国等西方，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铜、铸铁。是汉朝的使臣、散兵和郑国来回的“回回”人，把这些技术传过去的。中国蚕丝和冶铁术的西进，对促进文明的贡献甚大。这有书为证，据《山海经》卷第十六记载：“有赤国

郑氏，有双山”。

《华阳国志·郫县》载：“郫县有山原田，富国盐井，濮出好枣，特好入贡”。郫江古镇，也是春秋时郫国都城。据《太平寰宇记》载：“汉旧郫县城在今县(指今三台县城)南九十里，临江，郫王城基址现存，以郫江为县名”。郫江崖墓群系中国四大汉墓群之一，1996 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著名的郫江汉墓，散落在以郫江镇为中心的河湾山峦间，主要分布在金钟山、泉水坝、松林嘴、天平土、银杏沟等处，经普查有上万座。墓中石雕刻形态丰富，有日月星辰，有石头水缸和石灶，也有存放粮食的石壁厨，有造型奇特石横梁和拱顶，还有石猴的浮雕，两室之间的过道门楣上刻了一些牛头面朝洞口。崖墓室洞，互为相通。崖墓的时代早晚不一，多以东汉墓为主，规模大小不一。结构上，多室墓均在中轴线上，一般可分墓道、墓门、前室、中室、后室、侧室和耳室，墓内利用山岩凿有台阶、水沟、壁龛，灶案、柜、棺台、床等附属设施。很多墓有圆雕、浮雕、线刻等建筑装饰雕刻和画像装饰雕刻，还有一些墓内有红色涂料彩绘。

《山海经》卷第十六书中，也有写成“有赤国妻氏，有双山”经文的，即“妻”也作“郫”。有注释说：“赤国妻氏：游牧国犬戎氏族。双山：指双山部落。译文：有一个西周之国，是姬姓的古老国家。有一个叫府谷的集镇，那里是叔均的部落。北方地区有一个海则部落，海则部落是姜嫫地区的部落国。海则的北面是台玺部落，酋长是叔均。叔均创立了台玺并兼并了海则部落国，开始建立国家。包括有游牧国的犬戎氏族，有双山氏族”。“赤国”指远古回族先民会“红铜”生产、制造。“犬戎氏族”——这也是指最早从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郑国，转移搬迁出去部分走得不很远，又回迁的回族先民，他们已经成为类似的放牧民族，但没有忘记“用铜壶烧水泡茶喝”的习惯。

“双山氏族”——这是指三台县临近盐亭的“西陵国”——在盐亭嫫祖故里和盘古故里的玉龙镇境内，有著名的“衣落山”，因分有“大衣落”山和“小衣落”山，而称为“双山”——它之所以著名，是从古至今在盐亭，家喻户晓衣落山《金二伯射黄帝》的传说，还有传闻汉代天文学家落下闳，是盐亭地区西陵氏金二伯的后代——传说金二伯就叫“金落下”，不但会冶金制造青铜像，而且会观天象。

公元前 3148 年，金二伯反对嫫祖与黄帝轩辕完婚，反对嫫祖改变“远古联合国”领袖人选方法，把政权交给轩辕氏，把“远古联合国”总部迁移到中原，企图射杀黄帝。因实践证明金落下是错误的，所以传说后来金二伯自觉找到嫫祖和黄帝，跪在他

们面前“负荆请罪”。

令人震惊的是，1995年3月18日盐亭县金鸡镇农民岳大登、杨华茂、岳树伦等人，在金鸡镇烟台山顺天寨挖出一尊十分古朴的高约60厘米的青铜跪俑，初定为“金二伯铜像”。原绵阳市团委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颜晓亚摄影师，认为很有价值。后四川省博物馆雕塑院名誉院长叶毓山教授，已鉴定是比三星堆更远古的青铜像。

郫国史论在古代川中这块土地上，有没有郫王国？这个问题，在部份人心目中，至今还是一个疑问？有学者研究查考，答复是有的。郫王国的郫，首先见于《汉书·地理志》：广汉郡汉高帝置，有郫县。《汉书·地理志》说：“昔在黄帝……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是故《易》称‘协和万国’，此之谓也”。《晋书·地理志》说：“晋黄帝行天下，方制万里，得百里之国万区，则《周易》所谓‘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者也”。由此观之，在战国以前，中国国内的国家，其变化规律是由多而少，由万国而千国，由千国而七国。由小国而大国，由几十里之国而兼并成数千里之国。

郫王国在上古时代，当是万国中的一个。在商周时，当是千国中的一个。从郫王国这块土地最早的人类活动说起——在郫王国这块土地上，多处发现古生物化石，如在郫王城东2公里的鼓楼山上，有古代杉木化石，化石直径约半米。在郫王城东20公里的干坝王，1958年也曾发现恐龙骨化石，直径约二十公分。在郫王城西北七十公里的中江县城东，唐代人曾在玄武山，发现恐龙化石群。在郫王城北五十公里的印盒山挖绵纺厂基脚，在十多米深的羊肝石岩层中发现猛象齿化石。在郫王城东北50公里的双乐乡因修人民渠渡槽，在挖基脚时，在三米深处发现犀牛齿、骨化石。这些都说明在郫王国这片土地上，在远古时代，林木茂密，恐龙爬行，巨兽成群。

在郫王国这片土地上，除古代动物外，还有古人类活动的遗迹。在郫王国西南边境约五十公里的资阳县黄鳊溪，1951年曾发现“中国新人化石”，考古学家命名为“资阳人”。人要是活动的，在距郫王城50公里的射洪柳树镇，也曾发现过古人类头骨化石。在郫王城北50公里的县城牛头山下，1971年修人民旅社曾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经过人工打磨过的石斧。在郫王国城北五十公里的火烧沟，曾发现战国时的铜戈。从古人类化石和古人类遗迹遗物看，郫王国是古人类活动的地方。再从古蜀国疆土看，《华阳国志》说：“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

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由此可见蜀国领土，东南以江、潜、绵、洛为界。

刘琳教授注云：“江，岷江。潜水，一说西汉水，一说潜溪河。绵水，流经的绵远河。洛水，即什邡石亭江。今之中江、郫江以及涪江中游地区都不属蜀国土地，而是郫国领土”——郫国境内有郫江贯通郫国西南部；五城水（亦名玄武江、中江）贯通西部，至北伍城（今三台）汇入涪江；梓潼水贯通郫国中部、东南部。这些河渡两岸都是大小不同的冲积平原。在渔猎时代，有充足的鱼类、鸟兽，足以养活郫国人民。在农牧时代，有充足的粮食和畜产品养活郫国人民。

郫国境内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首先是盐。《华阳国志》说：“郫县有山原田，富国盐井”。富国，当是郫国的产盐丰富区，赵宋时，置“监”就是以《华阳国志》所说的富国命名。监在今三台城南90里，即今安居镇。据《元和郡县志》记载，郫县有盐井26所；通泉有盐井13所，以赤车盐井为最著名。盐亭县也因近盐井而得名。蓬溪县有盐井13所。其次是铜，战国以前以铜器为主，铁器自春秋时，才开始使用。据记载郫王国产铜的地方很多，《元和郡县志》说：“飞鸟县，本汉郫县地，哥郎等八山，并出铜矿”。“铜山县，本汉郫县地，有铜山，汉文帝赐邓通蜀铜山铸钱，此盖其余峰也。历代采铸。调露元年，因废监置铜山县”。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时铜山县都还有“一铜冶”。再次是铁，铁在郫王时可能才开始采用，其境内蕴藏有铁。通泉县，有“三铁冶”。东关县（后并入盐亭），有“一铁冶”。在商周时期，郫人的祖先濮人曾参加周武王伐纣的战争。

现在再来看郫江古镇，位于四川三台县城南47公里处，南临郫江，东滨锦江，建于两江汇合处，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个有7000多年历史的老镇，在远古巴蜀盆塞海干涸后，随之游牧的郫国和双山族的西陵国上层之间，即使曾经有过小摩擦也被淡忘。这时还有《资治通鉴》卷八十五载：很早以前，郫人先祖还有从云南迁徙来到巴国和蜀国之间的回民濮人，在郫江河边建立了郫王国。这时古郫国在巴国和蜀国之间的蜀国东南边。《三台县志》载：商周时期，郫国人的祖先濮人曾参加周武王伐纣的战争——周武王伐商的公元前1066年，武王姬发载着文王木主去伐纣，二月底攻入朝歌城灭商。

濮人参加武王伐纣战争后得到封赏，势力和支系都有很大发展，大部分人留在今天的三台、中江县一带。在春秋战国时，这里也仍还是郫国的都城。但在公元前316年秦国大夫张仪、都尉司马错，奉秦惠王之旨从石牛道南下伐蜀，途中“顺便”灭了郫

国。秦以蜀国土地建立蜀郡，以成都为郡治，郫为蜀郡所辖之地，不再是一个独立王国。

再到西汉高帝的公元前 201 年，又置郫县，以郫国首都为县城，以郫国的郫为县名。后西汉又析郫县，建立广汉县。到东汉，析广汉县地置德阳县（即今遂宁）。晋又析德阳县，置小溪、巴兴二县。到两魏，以小溪为方义；改巴兴为长江县（今蓬溪）。到三国时，蜀汉建兴的公元 224 年，又分广汉郡，建立东广汉郡；东广汉郡城治所，初设在郫县。后蜀汉时，又析郫县置北五城县、盐亭县，建立五城县（隋改玄武即今中江）；改原广汉为通泉。到西魏，析郫县地置射洪县（治今金华镇）。到晋朝开始的公元 265 年灭魏后，仍置郫县，县城也在今郫江镇。南北朝时，南朝刘宋时仍设郫县。到隋朝开皇的公元 593 年，改郫县为飞鸟县，治所在郫江镇。后移县治于今中江县南飞鸟镇。到元代时，古郫江镇还作过四川的省府。清雍正的公元 1734 年，郫江镇遂由中江县划归三台县。

4、古郫国回族新说解三星堆考古之谜

把今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的古青铜器等遗物，不看成全是当时当地用的祭祀器物或当地上层使用的东西，而定位于是在远古郫国境内回族先民收购转移，先后集中在三星堆境内。直到公元前 316 年秦国大夫张仪、都尉司马错伐蜀灭郫国建立蜀郡，以成都为郡治等各种社会、自然原因，才停止销毁、转移而被埋藏留在今广汉地区的。

如果懂得回族在远古巴蜀盆塞海干涸后，自然灾害仍频繁，加之远古联合国的权利中心转移到中原，那些没迁出盆塞海山寨城邦留在郫国和西陵盐亭等境内数百座古山寨顶上，类似小议事厅、观象台、祭祀神庙内的青铜等祭祀器物，以及山寨半山腰大围坪作坊店铺和居民住宅内的青铜、玉器等用具，留下已失去原有意义和价值；这时曾是铁杆的古郫国和远古联合国上层内亲的回族先民，不走，收拾残局就成了意料份中之事——收购转移、埋藏销毁曾掌握从事贵重交易品的制造、发放和远洋贸易的古青铜器等遗物，是内行也是寄托哀思。

1) 纽约州立大学常炳功教授解释他的“时空阶梯理论”时曾说：“中国的青藏高原以及地貌的特征，地球大气场导致嫫祖—黄帝及其以前时代的文明所在地就是四川。三星堆文明的挖掘，可能让我们重新认识人类文明的起源和格局，进一步有力佐证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的源头——包括埃及金字塔群、大西洋亚特兰蒂斯遗址、玛雅文明遗址、三星堆遗址、诺亚方舟遗址等”。但“时空阶梯理论”其实更多体现在“科学”、“科斗”上——科技世界是统一的；科技突破出现阶梯，分成“软件”

和“硬件”也是统一的。

例如，华为通信技术的家底之复杂是难以想象的——5G 智能手机高级芯片“鸿蒙”是科技圈里十足的热点软件，这其中既有华为自行设计在重压下的自救，也有大众对国产操作系统的希冀。“鸿蒙”尝试构建自主操作系统，并向谷歌的安卓系统发起挑战。这是展望尖端科技跃进的一个阶梯，但光有软件设计先进还不行——没有代工生产，或缺少一些虽不起眼、但生产难度高的各类小硬件的支撑，或此专利储备不足，在美国的打压封锁下，开始一段时间，华为国内自行生产“鸿蒙”高级芯片，还是有很大压力的。即“软件”的提升需要，“硬件”的提升也需要。其次，时空阶梯理论表现在东部和中西部的差异，如职业技术学院，即使两地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相同，但因东部和中西部所处区位不同，也会导致职校与企业多少关联度不同。

由此人们对职校的期待也不同——东部发达地区具有产业集群的优势，且产业链完整的企业多，当地职校与企业之间可实现深度合作。同时中西部地区，也不如东部发达地区的职校毕业生，愿意去企业工作——一是当地企业众多，可选择空间较大。二是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结构较强，员工进入企业后具有比较明确的升迁预期，可以从一线普通工人逐渐成长为高级技术工人，吸引力强。

2) 时空阶梯分层在考古学上，科学硬度体现在尖端，差别惊人为啥？以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斯万特·帕博教授为例：他因掌握在实验室开发研究古 DNA 的技术，能为解决 DNA 污染的问题，能在细菌中克隆从木乃伊身上提出来的 DNA，搭建起世界上第一个古 DNA 研究的超净室并设计出超净室的工作规则，由此他的超净室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古 DNA 研究实验室的标准配置。

如《参考消息》网 2021 年 3 月 17 日报道：帕博教授从尼安德特人骨头中提取到 DNA 样本进行分析，发表相关论文说：遗传自 4 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的 DNA 人类祖先基因的一部分现代人，能够减轻新冠病毒感染症状或可抑制新冠病毒——“西方优秀”了不得。

如今帕博教授，到达为所欲为的地步——他能坦陈自己是诺奖得主的私生子，公开宣布自己是双性恋者。为啥？帕博教授被主流媒体如《知识分子》等宣传为：他致力于探索现代人类与古代人类的关系、古代不同人群的关系，解开了人类演化史中的一个又一个谜团——30 多年来，帕博以分子生物学分析基因序列，推演人类起源、进化、迁移，1997 年以来他对尼安德特人的研究，更是做出了举世无双

的贡献----他发现智人的祖先曾经与尼安德特人杂交,并将一部分 DNA 留在了现代人体内,这能推动人类对自己的了解----他从找到的智人骨头中提取了目前为止最古老人类的 DNA,有利于研究现代人是如何在地球分布开的,同时还有助于破解早期人类的迁徙之谜。

又如他从西伯利亚西部发现的距今约 4.5 万年的人类股骨化石上,提取到迄今为止最古老的现代人全基因组序列。所有参加今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的专业人员和大学的考古实验室,有一个超过帕博教授的技术吗?从古到今“武斗”和“文斗”,在古代是派斗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扩大领地的主要手段。如元朝蒙古国攻占了半个欧洲和非洲,波斯国攻占了半个欧洲和非洲,到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攻占了很多人领土,但他们的“武斗”和“文斗”都没有守住。

由此比较现代“科斗”的加入,类似如今德国的帕博教授,他的一个“科斗”却能征服东西方世界,为啥?因为“科斗”虽也存在派斗,但对立的实验可以相互检查印证。早在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发表的广义相对论,说光线经过附近的星球,路线会发生弯曲。英国和德国当时是敌对国,但英国派出去考察的科学家,证实爱因斯坦是对的,就向世界宣布了,反而让德国很被动。

所以“武斗”、“文斗”与“科斗”终将是统一的。如中科院《地球化学》主编孙卫东教授说:有“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电子时代”的人类社会划分,这正对应常炳功教授说的“时空阶梯”----这种阶梯的“科斗”,会冲击“武斗”和“文斗”,图类似帕博教授那套顶尖的解决古 DNA 污染的实验室全基因组测序的技术。

但三星堆考古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如采用微量元素示踪古代青铜器放射性元素检测,来确定生产时间;以及与多处铜矿出产的铜对照的办法,也能搞清楚三星堆出土的价值连城的青铜器、玉器等在中国的来源----虽然这也高科技,但在国内懂这方面的专家以及实验室更多。问题是,远古巴蜀盆塞海的消失,中华上古史只说五千年,古代为巩固中原的长期派斗教育,很多四川人去寻根,也只认远祖是外省人;很多外省人寻不到根,无意中爱国成了外国亲。如孙卫东教授说:“从青铜器、甲骨文、战场到复合弓、小麦、圈养牲畜等,商朝文明先是在河南郑州附近出现,然后逐渐拓展。就像数百年前的欧洲人移居美洲一样,我们的祖先从埃及带着青铜等一批先进的技术,漂洋过海,来到我们现今中国这片土地,在新的土地上创造出了殷商及后世的灿烂文明。商朝先民可能在马来半岛等地居住

过一段时间。所以带来热带海洋独有的如贝币和用于做甲骨文的马来龟”。

他还说:“三星堆距离金沙要近很多,这似乎说明殷商青铜器是可以战争或者商业交换来解释的。两者铅同位素组成不在一条演化线上。退一步讲,即使殷商的青铜器来自三星堆,三星堆青铜器是如何起源的?有一些人认为三星堆来自古埃及:金沙就是沿用了古埃及的‘吉萨’的名字。如果三星堆真的来自古埃及,我们与古埃及人之间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说明我们中华文明是向古埃及学的,比古埃及人落后?”----所以在三星堆出土的考古铜器,出自哪里的国内?川外川内的学者有争论是好事----搞清楚了,是一举两得。

【6、放射性元素考古猜想海药难度】

铜元素有多少种同位素

李珣写《海药本草》一书,对“海药”的认识有没有难度----类似三星堆对青铜器的考古,铜同位素分析法是一种新兴的考古示踪法。尽管自然界铜同位素的变化较为复杂,且铜同位素地球化学还处于形成发展阶段,但铜同位素分析法在含铜器物的产地研究中,随着铜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的深入及分析技术的进一步提高,铜同位素分析法在考古研究中,已显示出了较好的应用前景。

这说来容易,实际是门绝活。类似高层混凝土住房年久,楼层地板或墙壁内埋藏的冷、热水管漏水,让居民很头疼。能破坏少地很快找到冷、热水管漏水处是绝活----也类似顶尖技术----说来不难,文化要求不高,由于掌握此技术的人少,并不每家经常都需要,就显得“顶尖”;其次也更需要测漏水的红外或听声仪器工具----这也把科技的尖端凸迟来。例如,各种铜同位素及其化合物的放射性测定在考古学中的应用,铜有多少种同位素?有说“铜有两种天然同位素 ^{63}Cu 与 ^{65}Cu 且两种的比列为 3:1”;其丰度值分别为 69.17%和 30.83%,还有一个放射性同位素“ ^{64}Cu ,其半衰期为 12.9 小时。相对原子质量为 63.546”。由于高分辨多接收器等离子质谱的问世,应用 ^{64}Zn 来进行同位素分馏校正可以精确测定“ ^{64}Cu ”比值。

铜作为过费金属参与成矿作用和生物作用过程,铜同位素示踪根据测定的数据,表明自然界“ ^{64}Cu ”存在 210000 的变化。而且铜实际有 29 个同位素。只是 ^{63}Cu 和 ^{65}Cu 很稳定,它们的自旋量子数都为 3/2。其他同位素都有放射性,其中最稳定的是 ^{67}Cu ,半衰期 61.83 小时。已确定 7 个亚稳态核素的特性,其中 $^{68\text{m}}\text{Cu}$ 半衰期最长,为 3.8 分钟。质量数 64 以上的核素发生 β 衰变,质量数 64 以下的核素发生正电子发射。 ^{64}Cu 两种衰变都会发生,半衰期 12.7

小时。 ^{62}Cu 和 ^{64}Cu 有重要应用。 ^{62}Cu 在 ^{62}Cu -PTSM 中用作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的放射性示踪剂。由此来看李珣家乡古郟国回民，认识铜的过程。

1、比较铜同位素示踪法与三星堆及郟国

考古学家发现以色列在 7000 年前有采铜矿坑----在铜石混合时代或者红铜时代，红铜是比较纯的铜，质地软，熔点高(1084.62 °C)，不适合做切削工具，但做面具面罩适合----《山海经》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形，这有一部分是远古联合国各地节庆、舞蹈风俗等带面具表演化了的人物、动物和植物，以后被传说演化成真人真事。

这不实际；今天在北川县羌族群众跳“锅庄舞”，就还保持带怪状面具的习惯，可见一斑。青铜是红铜与锡及铅、锌的合金。相对于红铜，青铜的熔点大幅度降低、易于熔融铸造。与红铜不同，青铜不仅需要冶炼铜，还需要冶炼锡、铅、锌等金属。目前公认青铜时代始于 6000 年前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其实是古郟国先民传到那里及以色列的。也许目前放射性微量元素示踪法，在青铜器矿料来源研究中还有应用不尽人意的地方。如模拟熔铸青铜器，对它们的放射性微量元素作多元统计分析，若舍弃冶炼后富集于炉渣中的亲石亲铁元素，而仅选取富集于铜料中的亲铜元素及一些凡具有亲铜性，又具有亲铁性元素的成分数据，就能较好地地区别不同产地的铜矿料吗？

2021 年 3 月 28 日《江南都市报》记者李巧报道：三星堆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的数十件造型奇特精美的青铜器宝物，与江西樟树吴城遗址一样----这些造型奇特的金杖、青铜神树、金面罩等，只占据了三星堆出土文物的一小部分；和青铜神树同时出土的青铜尊，都极具中国特色，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几乎一样。吴城文化研究学者彭印教授说：“不论是‘三星人’还是‘吴城人’，实际上都是先秦古人在当地留下的活动遗迹。他们与当时的中原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当时长江流域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

2012 年中国科技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主任金正耀教授，在《中国铅同位素考古》撰文称：四川三星堆和江西吴城两处遗址所出的铜器都属于特殊铅器物，都使用了同一来源的金属原料。三星堆、吴城冶炼青铜器时采用的矿产原料，是一个地方产出的。而位于江西瑞昌铜岭的商周铜矿冶遗址作为考古所见商代唯一一处采铜遗址，既可能曾向四川三星堆输送炼铜矿石，也很可能是远在中原商王朝王室的“御用”铜矿。通过同位素测试研究，发现出土于河南安阳，即商朝晚期都城遗址殷墟中的青

铜器，有一部分可能是用位于江西瑞昌铜岭的铜矿石铸成的。对三星堆与金沙遗址、汉中城洋、吴城遗址出土铜器的合金成分作比较分析，也发现在上述所有商代遗址中只有三星堆和吴城出土的青铜器测试数据显示，它们都含有同一种“高放射成因铅”的特殊铅，又叫异常铅。“即相隔千里的三星堆、吴城两地，其先秦古人在炼铸青铜器时集中使用了一种金属原料”。是吗？

虽然有研究者也指出：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青铜纵目面具、吴城遗址发现的双人神人青铜面具，既与商代大兴巫术的风气有关，也包含了浓郁的本土特色。但在三星堆遗址中，因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中数量就超过了一吨，如果按照当时冶炼技术进行统计的话，即便是在附近有矿石的地方，也需要几千吨。虽然现在的四川铜矿石的储藏量比较丰富，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发现与三星堆同一时期的开采痕迹，锡矿更有着不明的来源，也没有发现当地有过冶铸作坊。即便是后来在西周时期以及春秋时期，也没有找到有关于古代铜矿以及锡矿资料的记载。那么存在于这些遗址上的青铜原料到底来自于哪儿呢？青铜器是苏美尔、古埃及文明起始的标志之一，也是其迅速发展，成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的主要推动力。与殷墟几乎同时的是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器；此前，虽然有青铜器零星出现，但是时代和产地存在疑问。

更为关键的是，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的最古老的青铜器，其铅同位素与我国发现的其它青铜器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高放射铅同位素只出现在殷商青铜器中。商晚期和周以后的青铜器同位素才在国内都能找到类似组成的矿床。从事铅同位素研究的著名地球化学家，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炳泉教授认为：“国内没有具有这种铅同位素特征的铅矿”。中国科技大学金正耀教授也认为：“在我国境内除了云南边陲的金沙外，没有见到这种铅同位素组成的矿石”。

但对于殷商青铜器高放射成因的铅同位素，金正耀教授还认为：“是武丁王时期，他的妃子之一，著名的女将军妇好能征善战。是她通过征战获得的战利品，或者是从云南金沙附近购买的”。

当然孙卫东教授也有疑问：“真的是我们的祖先从云南南部边陲买来青铜器的原料，或者是通过战争缴获制作了商朝早期的青铜器？云南和河南的殷墟之间相隔万水千山，古人是如何跨越秦岭、长江等天险，到云南南部大量开采、运输青铜原料的？中原地区与四川盆地之间的联系是秦人打通秦岭后才真正建立起来的；到唐朝时，李白还写了著名的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从四川到云

南南部也还有千山万水”。朱炳泉教授和广州大学常向阳教授，因发现殷商早期青铜器的高辐射成因铅，与云南金沙的铅高放射成因铅，分布在不同的演化线上，也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如果商的势力范围内没有制作青铜的原料，我们的祖先是怎样发明青铜技术的？如果不是外来的，就无法解释这些铅同位素数据”。

在国内对三星堆青铜器研究采用放射同位素成因方法，发言有底气的学者，基本上都在发达国家培训过。如博士生导师孙卫东教授，1966生，江苏人。1986-1999年在中国科技大学读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999-2003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地球化学专业博士。2003-2004年作德国马普化学所博士后、洪堡学者。2004年回国到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工作，现任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深海极端环境与生命过程中心主任。特别是提出过俯冲洋壳部分熔融产富硫酸生富铜金岩浆、磁铁矿结晶还原硫酸根成矿的斑岩铜金成矿理论。他认为，铜可能是人类最早冶炼的金属，是古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判别指标。现在公认的世界四大古文明都拥有灿烂的青铜文化。人类最先使用的金属应该是在自然界中能直接找到的，自然铜虽然储量比自然金和自然银大很多，但是分布范围很局限，是富铜流体遇到大量还原物质时出现的，主要分布在美洲。我国峨眉山，也有少量自然铜产出。

但以《山海经》载“有赤国郟氏，有双山”为据，参考《盘古王表年表》，那么从公元前6390-6210年“法天法地时期”的盘古王开始，到公元前316年秦国大夫张仪、都尉司马错伐蜀灭郟国建立蜀郡的约6000年中，这里以炼制“红铜”开始闻名的“赤国郟氏”这支回民先祖，对“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中数量就超过了一吨，如果按照当时冶炼技术进行统计的话，即便是在附近有矿石的地方，也需要几千吨”的这种能力，应该说还是足足有有余的。

一是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不是一齐在三星堆同一地点同一时间生产的，而是古郟国的回回先民在古西陵国和郟国等境内众多衰落山寨城邦收集到三星堆的。如果不是同一地点，也不是同一时间生产的，就不需要大的铜矿场，也不需要大的青铜器生产作坊。据《嫫祖研究》书中介绍，嫫祖养蚕和炼铜技术联在一起，首先是炼铜燃料“杠炭”的发现——在川北地区天生柞蚕的青杠树，木头很硬。把青杠树棒埋土作封闭的窑中经过燃烧炭化，就称为“杠炭”。笔者1956年到罐子沟完小上学，路过玉龙中峰寺一处青杠林山坡，就看见这种大规模燃烧炭化的方法，很惊讶。问其起源，这里有人把笔者带到青杠林半坡一处裸露的石崖下，这里有一个被

开挖像小屋大的石腔，崖层是片状叠加的。在叠缝之间不时露出一小片小片的煤炭板块。笔者后来明白，古西陵国的先民是受此得天独厚启发的发明，还使上古冶铜技术也发生了一场革命——“杠炭”比木炭是一种燃烧时间长并能产生较多热量的燃料，且不说添加那一小片小片的煤炭块一起燃。

其次，这里很早就采用桐籽树把心挖空做成大口径的封箱，大大改善用嘴吹风的肺活量限制。而在盐亭不远的中江、北川、彭县等地都有铜矿。虽然现在看来开采价值不大，但古西陵国和郟国制造铜器时却正适合。在盐亭发掘收藏已有上古铜镜。更有1995年3月18日，盐亭县金鸡镇农民岳大登、杨华茂、岳树伦等人，在金鸡镇烟台山顺天寨挖出一尊十分古朴的高约60厘米的青铜跪俑，初定为“金二伯铜像”。后被四川省博物馆雕塑院名誉院长叶毓山教授鉴定，是比三星堆更远古的青铜像。所以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众多青铜器，应该一件一件分门别类单独作放射性微量元素示踪法，列出其矿料来源和成品制造时间。以及应对在盐亭、三台、中江、北川等县境内已知道的铜矿场，以及发掘收藏有的上古青铜器，也应该分门别类单独作放射性微量元素示踪法，搞清楚矿料和青铜器成分，和成品制造时间，以便和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作对比才算科学。

而且发表这种考古论文后，要允许有这种能力的实验室作检验。我们说三星堆造型奇特的人像青铜器，不是沿自中原或埃及、中东，而是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自产的。中原或埃及、中东有这类相似的青铜器，反而是远古巴蜀盆塞湮坝或者干涸发生，远古联合国的这类文明向它们扩散造成的。例如，1995年北京出版社出版著名汉文字学专家何九盈教授等主编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一书，首次披露绵阳市盐亭县曾发现一个完整的上古界碑，上面刻有五十多行类似文字的符号，与六千年左右的半坡彩陶刻划符号相类似。

2、王红旗推证三星堆青铜纵目人像传奇

更有启发的是，北京专家王红旗教授在2002年第1期《文史杂志》发表的文章说：三星堆遗址的两个“祭祀坑”里，出土有54件青铜纵目人像及面具，它们或两眼角向上翘，如同竖眼一般，或眼球向外突出极度夸张——对那直径13.5cm，凸出眼眶16.5cm。前端略呈菱形，中部还有一圈镯似的箍，宽2.8cm，眼球中空的纵目青铜人像，他分析认为：有人解释为某种眼疾的病态再现，有人猜测是某种未知习俗的夸张等不对，而是远古蜀人关于望远镜的使用和崇拜。

为啥？王红旗教授的道理是：这种用在眼睛上

的测量仪器，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古代真的望远镜，已经被发掘出来却没有被认出来。《庄子·秋水篇》就记有“有管窥天”的说法。《淮南子·泰族训》称：“欲知远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则射快”。冯立升教授在《中国古代测量学史》中指出，“金目”在汉代又称“深目”，并推测“金目”可能也是窥管一类的测量工具。它是一种有刻度的两节窥管，能够自由伸缩的用于测量距离远近和山峰高低的仪器，它的前身应当就是三星堆青铜面具上的纵目。事实上中国远古时代的测量仪器，可以追溯到伏羲、女娲手中持着的规和矩，如伏羲画卦可能也与方位的判断有关；所谓女娲用绳“造人”的绳，实际上也是一种长度测量尺。

四川阆中有伏羲母亲的传说和有关伏羲、女娲的汉砖画像发掘。川西雅安碧峰峡有女娲的传说。伏羲、女娲故乡有传说在甘肃天水。从甘肃天水到四川阆中、雅安的可行性，是在“立足山海时期”的公元前 5070-4170 年，属于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他们都类似远古联合国秘书长的伏羲和女娲，也是盆塞海商船队伍的头人、大老板。航海商贸需要“望远镜”，有需要又有得天独厚的材料——川北平武等地有水晶矿石，浙江学者钟毓龙先生的《上古神话演义》一书认为，上古黄河曾因地震地裂从剑门关流入四川。可以设想在形成盆塞海之前，随河流冲刷水晶矿石有大小鹅卵石类似水晶镜片，被伏羲和女娲的航海商队人员收购获得，有水晶镜片和竹管，做望远镜不难。

王红旗改写放射性微量元素示踪法的不尽人意，他即使没有海外培训的经历，如果有三星堆、盆塞海联系“珠峰映射原理泛世界第三极第二个拥抱期”等知识，取得的成就不会大打折扣。如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科技大学教授金正耀和彭子成等利用铅同位素进行考古，先后发表了大量青铜器铅同位素数据，其最大贡献是发现了商代青铜器具有高放射成因铅。这里的不尽人意，是他们最初使用的是我国在 1965 年自行设计制造的 ZHT 1301 电子管质谱，这种质谱测定的同位素精度差，一般在 0.1%，而且无法获得准确的 ^{204}Pb 数据。因此他们早期发表的数据主要是以 $^{207}\text{Pb}/^{206}\text{Pb}$ 的数据。金正耀教授在日本留学过，彭子成教授做访问学者时，他的合作导师美国地调局 R.E. Zartman 等人教过的电解法富集铅法——将青铜器渣用强酸溶解后，用铂电极电解，然后在用加双氧水的硝酸将电极上的铅溶解下来。

我国搞夏商周断代工程时，他们的团队协助测定从商代到秦汉的两百多件青铜器和一件锡铈的铅同位素。由于青铜器中铅含量很高，可达到 30%，

彭子成和金正耀等教授掌握的这类方法，拿到冶金部天津地质研究所实验室，张英臣教授用当时最先进的质谱仪，如英国 VG 公司的 VG-354 测定铅同位素；测定结果也证实了他们关于商早期的青铜器具有高放射成因铅同位素结果，但也仅此而已。

因为 1995 年英国学者 Budd，曾提出古代冶金过程中由于铅的挥发，会使同位素发生很大的分馏。因为做过铅同位素分析，在热电离质谱测定时，铅被加热气化然后电离，这个过程铅同位素可以发生分馏——中国科技大学的陈江峰教授就曾想过这种可能性——如果熔炼过程中，铅被气化了，可以出现铅同位素分馏。最后总结，北京大学教授崔剑锋等考古学家认为：我国古代最早的青铜器，如郑州商城(应该是指二里岗)、偃师商城(应该是指二里头)、三星堆和殷商早期等，都是具有高放射性铅同位素特征的。特别是早期的青铜器，很可能被反复熔炼。因为崔剑锋教授等专门做过青铜器冶炼过程中铅同位素分馏的实验，结论是在冶炼过程中铅同位素，确实可以发生分馏。挥发过程中铅同位素的分馏遵循瑞利分馏原理，其变化趋势与自然界中由铀钍放射而产生的铅同位素变化趋势不同。也就是说，青铜器铅同位素可以用来示踪其源区，也是仅此而已。

【7、中东埃及希腊罗马印度文明时空阶梯】

当代北京著名学者何新教授，1949 年生于温州苍南。现任职于全国政协从事研究工作；历任第 7 届、第 8 届、第 9 届、第 11 届、第 12 届全国政协委员（均为专职）。已出版各种专著近百本。

2021 年 1 月 6 日何新教授在“新浪”网的个人博客专栏，发表的《古埃及的伪造》一文中说：现在的埃及人不是所谓的古埃及人。近代现代埃及统治阶级是马木留克王朝的后裔，马木留克不是埃及本土人，是穆斯林阿拉伯王朝雇佣的突厥人，雇佣军。后来突厥马木留克人灭了埃及的阿拉伯人王朝，取而代之。至于阿拉伯王朝建立以前的埃及历史究竟是什么情况？实际上没有任何可信的文献记载。如果几千年前埃及确实有过本土人和古老文明，那么他们在历史中已经早就被灭光了。那些金字塔和雕像，有西方现代建筑家研究发现许多都是砾石（人工石，简易混凝土）造的，来历不明，时间可疑。但假设它们确实都是远古埃及本土人的遗产，那么这些本生埃及人和现在的埃及人也完全不是一种人。所以现在的埃及人不认识那些什么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什么纸草文书，什么僧侣版世俗版的伪品。

解读所谓埃及文字的，不是埃及学者，而是源自一个天才法国少年商博良，凭一己之力猜出来的。在此基础上凿空，西方人构造了堂而皇之洋洋大观的上下五千年的古埃及文明史。至于那些什么古代

文明的第一王朝、第几王朝，第恩王朝的各种事，以及什么美丽的埃及女妖后云云，可以说都是近代西方人捏造杜撰出来的传奇神话故事。

造假文字的洋人们有一个漏洞。如果古埃及文字是象形文字，那么象形文字的特点是一字一意思，是无法用字母去做对应进行破解的。所以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以及大篆和小篆，都无法使用任何字母表来对应破解。目前甲骨文能被学界解读的，不到已发现文字的五分之一。另一方面，如果古埃及文字是拼音文字，那么除非埃及字母表、单词表与拉丁文或者其他拼音文字，有明确的语音及词语对应性，否则也是无法破解的。一切纸草文史解读，以及古埃及王朝故事的构筑，都可能根本就是鬼话与捏造。

2021年2月7日何新教授在“新浪”网的个人博客专栏，发表的《阿拉伯翻译运动与欧洲文艺启蒙》一文中说：黑格尔《哲学史》第二卷中谈到中世纪欧洲人（包括哥特人、日尔曼人、高卢人、撒克逊人等）本来不知道什么希腊罗马（包括什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阿拉伯人教给他们才知道的。在公元8世纪到11世纪之间，阿拉伯帝国掀起了一场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翻译运动。这个翻译运动主要是翻译波斯、叙利亚、中国和印度河地区的古代典籍，包括哲学、医学、数学天文地理和技术。大翻译运动9世纪以后由阿拉伯帝国本土，传导到白衣大食统治的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地区。于是古代古老的东方文明，从这里传播到法兰克、日尔曼尼亚和意大利半岛周边地区。这就引发了欧洲人所说的三次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因为古代的欧洲地区以及日耳曼和哥特人等白人，此前并没有什么古文明可言，那么何谈所谓复兴呢？

阿拉伯输入欧洲的大翻译运动，引起了欧洲人的文化学习或者启蒙运动。这个学习或者启蒙运动据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法兰克（法国）加洛林王朝（公元9世纪）的文艺启蒙。第二是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文艺启蒙，也叫12世纪文艺复兴，第三次文艺启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14、15世纪发生在意大利城市邦国的所谓“文艺复兴”。西方学术对欧洲古代历史的系统性伪造，以及对东方地区希腊和罗马（均在亚洲）的无端攀附，以至于冒认埃及、希腊、罗马为欧洲文化始祖，从而进行文化嫁接也就是从这三个时期开始的。

2021年4月7日何新教授在“新浪”网的个人博客专栏，发表的《关于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一文中说：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周边地区，中世纪早期当时欧洲草原森林遍布，大量地区都是没开化的蛮族流动性占据。没有文字，至少有定居的城镇，

更没有历史记载。古代欧洲的政权、疆土、边界、组织结构，既不同于近代国家，也不能把这种王国、王朝想象成类似中国那种高度组织化的中央集权模式。希腊罗马的故事，全部都是杜撰的伪史。需要从伪荷马史诗和《圣经》版本年代开始，彻底做鉴别史料和勘证考古。过去流传的那些什么希腊城邦民主，什么亚历山大徒步远征欧亚非三洲两洋四海建立帝国，什么罗马世界帝国云云，都是出于臆造虚构。

公元4-5世纪以后亚洲游牧民族从亚洲草原大量迁徙到欧洲，给欧洲蛮族带去了东方的文明元素。也导致本土欧洲白种游牧蛮族大量西迁，于是引起了影响深远的蛮族世界性大迁徙运动。此后欧洲蛮族方逐渐走入文明，建立起若干定居城镇，进入所谓“封建化”进程。关于西方中古历史，西方史学至少有五派不同的说法。第一是意大利拉丁学派，主要记述中世纪意大利城邦史，天主教罗马史。第二是德国历史学派，主要记述关于神圣罗马帝国以后形成的德意志民族史，上溯仅为传疑性的日耳曼尼亚史。第三是英国学派，记述来自北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侵入英伦三岛后的历史。第四是高卢法国学派，以法兰克人的故事为欧洲的王朝正统。在阿拉伯人输入中国的造纸术以前，欧洲人缺乏写作的载体，因此不可能有长篇大论的宏伟著作发生。西方声称的那些伟大史学著作，其实都是16世纪以后出现的。欧洲政治主权国家出现很晚，15世纪意大利出现金融商业城邦共和国，16世纪以后较早出现的国家是葡萄牙、西班牙、法国。

2021年5月8日何新教授在“新浪”网的个人博客专栏，发表的《何新：谈谈印度文明的真相》一文中说：中国人真被英国编造的印度史弄晕了——殊不知那些古印度文明遗址，多数都是在巴基斯坦地区——梵文是古代佛经的文字，而佛教并非起源于印度——佛释迦牟尼是喜马拉雅山南麓现在尼泊尔地区的人。有佛经说释迦牟尼是黑头黄皮肤的人，很可能与古华夏族人有关

何新教授的言论真实如何？2021年6月15日上海“观察者”网，发表的《罗德里克·比顿：古希腊与拜占庭，这两个祖先如何影响今天的希腊人？》一文中说：希腊对其祖先的二元继承所显示的，它不仅属于西方，也属年谱于东方。4世纪的时候，那些说希腊语、写希腊语、居住在东部地中海沿岸内陆的人，已经在古罗马的统治下生活了好几百年。在和希腊诸城邦对抗的时候，古代的雅典一直执着于建立自己的优势地位。长期以来，雅典城中心卫城上的那些被毁坏的古代神庙被当作希腊的标志，这很容易让人认为，雅典从古至今就是希腊的都城，

但实际上,雅典在 1834 年 12 月 13 日才第一次成为希腊的首都。今天知道的全部古希腊文学和大部分科学之所以能保存下来,而且在 14 世纪以后沿着适当的路径传播到西欧,要归功于拜占庭帝国的图书管理人员、书籍抄写者和有识之人(其中有些是女性)。

拜占庭人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获取了无上的权力,此前或之后说希腊语的人很少拥有这样的荣耀。罗马帝国最终在 1453 年灭亡,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拜占庭帝国之所以依然对希腊人的创造力有着强大的影响,以上所述都是充分的理由。还有一个理由是东正教体制的延续,因为在后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的几百年里,东正教一直在传教布道,从来没有中断过。如果说所有的现代人都是由 5 万多年前走出非洲的部落繁衍而来的,那么希腊人一定也不例外。

遗传学的进展可能会揭示,现在讲希腊语的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古代“经典”文化的创造者们有着相同的基因?不过,对于我们了解希腊的现代史,这真的不重要。人类的现代史只有几千年,从这样的尺度上看,影响历史的因素是环境、行为、事件、思想等,而不是进化生物学。尽管“祖先”这个词最常见的意思是生物学祖先。对于古希腊文明是否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为“国家”?人们还是存有疑问的。我们讨论的是亲近关系的感受,是一种感知,不是一系列可以得到客观证明的现实。承认这些事实,并不是要减弱这些祖先在过去两个多世纪努力强化希腊集体认同方面的重大意义。

只有全面认识千百万希腊人在那些岁月里做出的选择,才能充分看到希腊所取得的成就的规模和范围。希腊这个国家出名的祖先,不止一个,共有两个。希腊的第二个祖先拜占庭帝国肇始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将城市拜占庭更名为君士坦丁堡的时候。330 年君士坦丁堡接纳了基督教,从那以后的 1000 多年里君士坦丁堡的继任者在他创建的东方都城统治了一个基督教帝国,其官方语言很快变成了希腊语,拜占庭帝国一直是罗马帝国位于东方的那一半。自基督教在 1054 年分裂为东正教和天主教以来,君士坦丁堡就一直是(现在也是)东正教的核心。现在坚持正教传统的国家主要有俄罗斯、大部分巴尔干半岛国家以及摩尔多瓦、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并圈进有亚洲不说。

【8、回民药物学家李珣成就梳理】

绵阳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的刘文传主任刚出版的新书《李珣研究》,是我国唐末五代十国时回民药物学家李珣,他的家乡人在新时代第一个对他作的较系统梳理,给笔者带来了惊喜。为啥?

1、三台“嗨药”半夏、麦冬传奇

《李珣年谱》李珣是公元 960 年去世,死后 1061 年居然本土刘文传主任想起了他,要让他的成就“嗨药”贡献再发光发挥今天的作用。说实话,之前笔者没有去深究绵阳市三台县古代这位叫李珣的回民药物学家,只是 1964 年读高二,参加全省空军预备“滑翔”学校人员招收,从盐亭坐长途公共汽车路过三台县到绵阳体检,看见三台很多田坝地里,栽长着像麦苗又像野草“香附子”的庄稼,一问才知此庄稼叫“麦冬”,是一种中药材;麦冬(沿阶草)的干燥块根,主治养阴生津,润肺止咳,用于肺胃阴虚之津少口渴、干咳咯血;心阴不足之心悸易惊及热病后期热伤津液等证,与一个叫李珣的推动有关。

加深三台麦冬的印象,更是 1992 年笔者调到绵阳市工作,有一个堂侄儿李和庆是成都中医药大学毕业分配在绵阳药企业,那些年他说每年都要和公司里一些同事到三台县去收购麦冬。笔者就想:盐亭县与三台县邻近,地貌相同。三台农民种麦冬能致富,为啥盐亭的农民不种麦冬?但最近一次回盐亭,看盐亭梓江河坝一些田地里也在栽种麦冬药材。还有一件事,是一个朋友叫赵光荣,他是 1965 年考上北京石油学院的,毕业分配在新疆油田工作。他爱人叫张秀华,是盐亭三星乡人,与赵光荣结婚后也到了新疆油田工作。

他们夫妇退休后,从新疆回绵阳安家。四五年前有一次笔者和一些朋友到他们家作客,张秀华告诉大家,不久前她得的咳嗽毛病才治好。一问,她说吃的是“半夏止咳糖浆”。原来一年前,她得了咳嗽的毛病,找遍绵阳和成都的医院,花了两万多元钱,都没有治好。有朋友告诉她,吃“半夏止咳糖浆”试试。果然她之花费了 20 多元钱,不到半个月时间,咳嗽毛病就治住了。大家都感到惊奇。笔者听了决定也试试---因为极少的时候会咳半声嗽。

到绵阳老百姓药房,三台的太极集团出厂的“半夏止咳糖浆”才 9 元钱一瓶,就买了两瓶。有时想咳嗽时,就喝它两口(瓶上标注的约一小格),半年时间确实感到有效果。当然笔者也曾推荐给姐姐,当时她咳嗽的毛病很厉害,但她吃效果不如张秀华,后来还吃西药治住的。一年多后,再到绵阳药房去买,三台的“半夏止咳糖浆”已买到 18 元多一瓶,品牌不仅有太极集团三台的,也有太极集团南充出厂的。事情过后笔者一直在想,中医药治病是科学的,它辨证论治,论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等,有着一套完整的理法方药。并且针对患者的细致,有的要结合当地的气候、物候,以及临床时辰,“寒热、阴阳、表里、虚实”,医生通过四诊拟定不同证型的治疗药物,和治疗反

馈不断调整用药,使药物适应于不同个体,以期达到最好疗效。这实际类似一种“大数据、云计算”的信息技术(IT)。它需要医生个人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

由此中医生治病,各个人差异也很大;甚至同一个出色的中医生,对同一种类型病的患者,药方试在前者有效,在后者却不佳。笔者在2019年写《中医药多体自然叩问》一书时,就想到:中医的大数据、云计算,涉及阴阳对立互根、消长转化,以及干支甲子系统和五行五运六气规律等的统一归纳和演绎,其排列组合信息量之大,变换之多,没有强有力的类似中医科学天眼天网仪的探索与应用,是难以溯根求源,精准掌握病貌、诊断、中药等的组装的。例如中医药的大数据、云计算类似《黄帝内经》里的“气”概念,其组装包含有集成、耦合、整合、叠加、网络、纠缠、沟通、通连、关联、联系等意思。

用以阐释人体的生理、病理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有很多叫法和大的组装分类:如一是依部位定名,有自然界之天气、地气;疠气疫气;脏腑之气;经络之气。二是以性质作用表现定名,有组装人体之“气”的阴气、阳气、正气、邪气,以及精气、神气、真气、宗气、营气、卫气等。类似的“中医药天眼天网仪”是分为两部分的:一是供溯源防御用的中医天眼天网仪,或“弦网凝聚中医药智能手机”,小巧方便,病人或常人都可以携带。二是供医院医生的中医天眼天网仪,或“量子色动中医药机器人”,是将寻诊人携带的中医天眼天网仪中收集储存的大数据,取下来换作治疗的小数据处方建议。总之中医药治病最后处方,还是要大数据、云计算换作“小数据”。

2020年以来我国与世界遭遇了百年未有的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我国在短时间内中医诊疗提出的诊疗方案,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对新冠肺炎轻症患者,中医药像生脉饮、参脉注射液、独参汤,一两天后血氧饱和度波动了,再过两三天基本达标,完全可以把它拿下来的这类例子很多。那么我国还能不能像201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屠呦呦教授,发现治疗疟疾的新药青蒿素类似走向世界的“海药”,造福全人类,再次拿出治疗的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海药”---这里“海”,是出口到全世界类似的大海,不是仅“海外”。

这个“海”字,还有类似招呼人的谐音字“嗨”---这个“惊喜”,是笔者在读刘文传主任的《李珣研究》一开头《海药本草》的注疏,突然回忆起小时候跟一群孩子在石埡子河坝挖“麻芋子(半夏)”和“香附子”的事情---那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读小学,虽然

语文课本也才一角多钱,但家里仍然有困难,放学后或假期,挖中药材麻芋子和香附子,晒干后卖给中药房成为一件常事。麻芋子和香附子是野生的,特别是石埡子河坝,在收割后的麦地和红苕地里很多,但也分散。有小孩发现较集中地点后就会喊:“嗨!这里多,快来”。在地里干活的大人看见了也会喊:“嗨!快来,孩子们”。久而久之,小伙伴把挖的药材麻芋子和香附子,开玩笑说成是挖“嗨药”;如今是“海药”。这只弹指一挥间---60多年过去,本土人刘文传主任居然来告诉回民药物学家李珣,他的家乡梓州已经是叫出名的“三台县”。

也有回民告诉李珣出生地,是古时郾国郾王城,现叫作郾江镇---它被边缘化得和现三台县城潼川镇的繁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李珣去世1061年来的学者研究,绝大多数口口声声不离说李珣是“波斯商人后裔”、“祖籍波斯”、李波斯;更有说他是“外族人”。2019年2月15日北京市科协蝌蚪五线谱官网发表的《<海药本草>:一部简易版的“医疗手册”》一文,说李珣写的《海药本草》:“此书专记海外药材,比较冷门,所以它问世后来并未引起朝廷和世人的重视”。是北宋巴蜀医药学家唐慎微,才将其主要内容辑入自己的《证类本草》书中。南宋末年《海药本草》在战乱中散佚。多年后到明朝李时珍写《本草纲目》一书时,都是只好引用《证类本草》书中关于《海药本草》的大部分内容。2013年高如宏教授和之前的尚志钧教授,分别出版的《<海药本草>梳理》和《<海药本草>(今辑本)》等书,也只好用《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两书对其内容记的《海药本草》整理。即《海药本草》原书稿在国内已没有,也许今后是否会从日、韩、越等外国查到,都是未知数。

但我们说,李珣把《海药本草》论文,是写在故乡三台县的大地上的---这千真万确,也是笔者对比盐亭与三台的惊喜与感悟。

2、《海药本草》类似挖出“三星堆”

我们一字一句读刘文传主任书中第二节《李珣<海药本草>(原文及注疏)》中,所列的5大类131种药名及注疏,对照《<海药本草>:一部简易版的“医疗手册”》一文说的:“《海药本草》共六卷,收录了唐朝及五代初期的外来药物128种(据《证类本草》统计),其中大部分附有产地,便于后人查找。书中内容分为玉石、草、兽等六部,其中包括后世知名的玉屑、金属、石硫黄(玉石类,共11种),人参、海藻(草类,共39种),丁香、沉香、胡椒(木类,共49种),牡蛎、鲤鱼、甲鱼(虫鱼类,共15种),荔枝、橄榄(果类,共10种)。据学者统计,书中所引约66种药材可在岭南地区找到,

比如海红豆、郎君子、海蚕沙等。书中介绍药材时，引用了包括《尔雅》、《山海经》、《淮南子》、《胡本草》等 60 多种古籍，充分说明了李珣的知识广博”——后者说的《海药本草》收录的药物是 128 种，但具体列出的药物数字 11、39、49、15、10 加起来只有 124 种。

这类差错，在现代著名医学学家范行准（1906-1998）教授辑录的《海药本草》一书也存在——说辑录药物是 124 种，但具体列出的药物数字 9、38、48、16、10 加起来只有 121 种。这不奇怪——李珣的原本《海药本草》一书，说是到南宋末年已散佚，后来人都是靠北宋巴蜀医药学家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书中，对《海药本草》的辑录来发挥，《证类本草》一书是否已散佚过，也不清楚。因为又是靠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一书对《海药本草》的辑录再发挥。

这里可挖掘的地方很多——唐慎微也如李珣，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医生。在宋代以前，中国的医药书籍，几乎全部靠手抄笔录或者口传心授保存下来。因此一本新的著作问世以后，若干年后，要么流失殆尽，要么经过反复传抄，错误百出。直到北宋时期，印刷术盛行，许多医药书籍才得以刻版流传。但北宋两次官修本草，动用的是政府的力量，官修本草的编写班子由饱学的儒臣领衔，有朝廷的医官参加，人员众多。唐慎微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宏愿？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规矩是凡士人来找唐慎微看病，分文不取，但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希望他们帮助收集秘方秘录。就这样，经过长时期的积累，唐慎微终于收集到了大量的医药资料。依靠这些资料，唐慎微编成了本草史上划时代的巨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

因唐慎微是四川人，故对四川道地药材记载尤为详实，如戎州（今宜宾市）产巴豆；梓州（今三台县）、龙州（今平武、江油县）产附子、川楝子、猪苓；茂州（今茂县）、眉州（今眉山县）产独活、升麻、决明子、使君子等。今存的《证类本草》有两个主要的版本系统：一是源于 1108 年初刊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简称《大观本草》）。另一是源于 1116 年医官曹孝忠，奉诏校正的《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但这两系统的版本有 40 余种，文字、药序、药图仍不少差异。《证类本草》原为民间医生个人编纂，国家官书正本还不出版流传，为啥？只因唐慎微的书具有巴蜀远古盆塞海特色，被部分官方人士赏识，才组织人员修订成为地方官刊本的。

官方在中原是大本营，5000 多年来官宣定位是“农耕文明”，不想承认时空阶梯在“农耕文明”之前

官宣还有“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李珣的《海药本草》一书划时代揭开中华文明史存在时空阶梯的“农耕文明”和“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之争的序幕。虽然唐慎微已经按官宣“农耕文明”对《海药本草》作了辑录，但书名《海药本草》及大部分内容去不掉。所以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继又编订成《政和本草》、《绍兴本草》，以朝廷名义刊行。之后又派生出《重修政和本草》、《新编证类图注本草》。流传至日本、朝鲜，而且影响及于元、明两代，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问世之前近五百年间，一直为研究本草学之范本，占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所以在本草发展史上实属罕见，是《海药本草》类似挖出“三星堆”。

再说挖“三星堆”的方法，要做具体一个一个青铜器的研究，才会有突破，是北京《山海经》专家王红旗启发笔者的——2002 年他在《文史杂志》第 1 期发表《三星堆人有望远镜吗》，说三星堆青铜纵目人像的凸出眼睛类似望远镜的表达，使人百思不得其解。2015 年借参加北京炎黄研究会自然国学讨论会，笔者采访过他。王红旗，1946 年生，河北桑干河畔人。1965 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专业。改革开放后他不但与画家妻子孙慧芳，出版多部《山海经全集精绘》等书画外，他个人还出版了 81 部（其中专著 66 部，2000 篇学术论文共分为 15 部）其他学科的专著。2015 年他对笔者问题的回答是：他从小听到家乡有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炎黄阪泉之战的传说。

涿鹿和阪泉就在桑干河地区，他关注海洋变迁，认为东海曾上涨到过西边的太行山。但 1993 年《嫫祖研究》出版，盐亭嫫祖故里传说黄河曾流入四川，有过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嫫祖年谱初编》定公元前 3133 年轩辕与蚩尤战于涿鹿；公元前 3127 年炎帝与黄帝战于阪泉，他觉得靠谱，就联系盐亭籍川大蒙文通教授 1962 年发表的《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结论出《山海经》的《大荒经》、《海内经》诸篇均以四川西部为“天下之中”。

而《山海经》里的烛龙，为司日月的纵目神，与三星堆青铜纵目人像是联系的，那么作为观测天象使用的窥管或类似工具在三星堆时期已经出现是有可能的。他又举《庄子·秋水》篇中的“井底之蛙”、“以管窥天”及《淮南子·泰族训》“金目射准”为证。但中华文明作为全世界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明，有过“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和跟其稳定的农耕文明，长期是有争论的——落下闳创制的《太初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优良历法；落下闳生活在公元前 156 年--公元前 87 年，在同乡人谯隆

及太史令司马迁的推荐下，被汉武帝召为待诏太史，主持《太初历》的制订工作。

盐亭的远古传说讲，落下闳是约公元前 3151 年前远古联合国的嫫祖时代，衣落山一位“观天司”逃亡者金落下的后代。该家族虽已改姓埋名 130 多代，但仍受祖先金二伯谋图射杀黄帝所累。因此他自己只有埋名乡里继承祖传，只做不说，将天文学、数学知识传给后代的份。成语“坐井观天、井底之蛙”——“蛙”也是凸出眼睛的，是否有看得远的愿意——如果远古巴蜀人挖水井，发现类似扁圆鹅卵石样子的水晶石，加之打井吸水用有长管竹筒，久而久之发明“以管窥天”类似今日的望远镜，是完全有可能的事。

3、通草与灯芯草、水蜡烛传奇

王红旗教授的惊世之论，使笔者读刘文传主任的《李珣〈海药本草〉（原文及注疏）》首先选出第 24 条的“[草部卷第二] 24.通草”作考察。为啥？该条目只说了：“通草。谨按徐表《南州记》云：生广州山谷。味温，平。主诸疮，喉咙痛，及喉痹，并宜煎服之，磨亦得，急即含之”。但在盐亭农村解放初很多大人往往把“通草”和本地俗名叫“灯芯草”和“水蜡烛”的植物混淆起来。因为那时农村夜晚用的桐油灯，是用“灯芯草”放在桐油灯里引火点亮的。

我们小孩对“灯芯草”，好奇大人把它说成是“通草”或“水蜡烛”。灯芯草和水蜡烛在盐亭的举溪河边或深山野林的个别水池边可寻觅到，因此联系“通草”给人印象，也是巴蜀盆地可以野生的植物。当然现在我们知道，生活中有些人总认为通草与灯芯草是同一种药材，但实际上，通草和灯芯草不是同一种药。通草是一种五叶木通的木质茎髓，一般是使用干燥通草作为药草。通草最大的功效是能够利尿，能够促进钾离子从体内排出。一般可以作用于肺、胃、肾、膀胱，具有清热解毒、排水利尿的功效，同时能通乳，促进乳汁的分泌。

灯芯草是一种水生草本植物，实心圆筒形，其茎部底下是棕色，茎较短，茎上呈假侧生状，基部苞片延伸呈茎状。灯芯草通常采用其茎髓或者全草作为药材，能够清热利湿，利尿通淋。作用于心、肺、小肠和膀胱，能够减轻尿少涩痛的症状。通草与灯芯草均是可用于利尿排水的药草，两者性质均微寒，不可用于气血阴虚之人。

而水蜡烛，是香蒲科香蒲属植物，常生长在积水洼地、积水湿地、溪边、湖边浅水中及沼泽地，野生，不需要由人工引种栽培。茎秆直立丛生，叶狭长，叶片扁平，株高 1 至 2 米，穗状花序紧密呈柱状，形似蜡烛，成熟后变黄红色。水蜡烛还有“毛蜡烛”、“蒲草”、“蒲棒”等药名，对身体被划伤后有

非常好的止血，化淤等功效。

从以上介绍分析，李珣从小认识他的“海药”的道路，首先也许是从通草与本地俗名的灯芯草、水蜡烛开始的——五代十国时代，没有中医药大学、没有中医药专科学校，也没有植物学。灯芯草和水蜡烛各自的种类很多，李珣在他家乡鄞江边和深山野林水池边，看到的俗名叫灯芯草和水蜡烛，在没有开花结实时外表长得差不多，农村大人把“灯芯草”说成是“通草”或“水蜡烛”也没有大错。只是到李珣成人研究中药材，发现通草的疗效，比灯芯草和水蜡烛治某种同一病状效果更好时，发出惊叹“嗨！通草好嗨”，才认真对待。

4、白附子与香附子、麦冬传奇

读刘文传主任的《李珣〈海药本草〉（原文及注疏）》第 46 条的“[草部卷第二] 46.白附子”作考察，李珣书中并没有把三台俗名叫“香附子”、“麦冬”的药材列入。这不奇怪，北宋唐慎微写《证类本草》辑录，不是全抄。再者，唐慎微已知道“江油附子”——刘文传主任说：《彰明附子记》是北宋彰明县县令杨天惠写的附子考察报告，记述了全国主产地彰明的附子所产乡镇、种植规模、栽培技术、采收加工、商品规格、优劣鉴别、市场销售及经济效益等生产经营全过程，并批评了之前《本草》书中附子的一些错误说法，具有深厚的中药历史文化价值和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李珣〈海药本草〉（原文及注疏）》白附子条目只说了：“白附子，按《南州记》云：生东海，又新罗国。苗与附子相似，大温，有小毒。主治疥癣风疮，头面痕，阴囊下湿，腿无力，诸风冷气，入面脂皆好也”。可见辑录得很简短，如果李珣六卷本的《海药本草》仅 131 个条目是这样写书，恐怕成不了书。这里补充介绍的三台香附子，是野生的恶性杂草，有着惊人的繁殖能力，在鄞江、涪江、梓江、举溪等地区分布。此杂草 2 到 3 天就可以出苗，种子和根茎都能发芽和生成新的植株和块茎；新块茎，一株接着一株，连着不断地生长。

中药香附子为莎草科植物莎草的干燥根茎，分别由地下块茎、根茎、鳞茎和地上茎叶组成。采挖，燎去毛须，置沸水中略煮或蒸透后晒干，或燎后直接晒干。本品多呈纺锤形，有的略弯曲，长 2~3.5cm，直径 0.5~1cm。香附子是一种味苦性散的中药，能够入肝经，具有理气止痛的作用，对于因肝气不舒和肝气郁滞导致的腹部疼痛，胸肋胀痛有特别好的治疗作用。还能够治疗人类经常出现的咳嗽，治疗的时候可以与川芎搭配在一起煲汤喝。在服用时把它与砂仁和甘草搭配在一起服用效果更好。因为香附子中含有大量的香附醇，是一种天然药物成分，

在平时出现感冒发烧时,可以使体温尽快恢复正常,同时还具有麻醉的作用,对于胃脘肝区疼痛等病症也有治疗功效。

香附子还有降血压以及促进身体内钠盐代谢的功效,而且能提高肾上腺功能。但气虚无滞、阴虚血热者不要服用香附子,孕妇也不宜服用,不然会有流产的危险,因为香附子有活血的作用。

三台麦冬与野生香附子的苗叶,有相似之处:麦冬叶丛生,窄线形,先端钝或锐尖,基部狭窄,叶柄鞘状,两侧有薄膜。生于山坡阴湿处、林下或溪旁。地下具细长匍匐枝,须根常有部分膨大成肉质的块根,容易使人发生联想---李珣是否把野生杂草香附子的惊人恶性繁殖能力,用多年生草本的百合科植物麦冬(沿阶草),来组织栽培大面积改变家乡田地的生态---麦冬和香附子一样是好的中药材。

麦冬栽培后第3年立夏时采挖,麦冬挖起后,剪下块根,洗净泥土,晒3~4天,堆通风处,使其反潮,蒸发水气,约3日,摊开再晒,如此反复2~3次。晒干后,除净须根杂质即可。药材麦冬纺锤形或长圆形,两端略尖,中部充实或略收缩,长1.5~3厘米,直径3~6厘米。表面黄白色或淡黄色,有不规则的纵皱纹。未干透时,质较柔软,干后质硬脆,易折断;折断面黄白色,角质样,中央有细小中柱。气微香,味微甜。用于治肺燥干咳、吐血、肺痈、虚劳烦热、消渴、热病津伤、咽干口渴、便秘等。药理研究有保护心血管系统的作用;增强耐缺氧,延长常压缺氧的存活时间;增强免疫功能;降血糖;延缓衰老;抑制胃肠推进作用;抗菌。

麦冬为良好的养阴润肺药,临床应用强心作用稳定而效果佳。麦冬中的水溶性多糖有抗缺氧和免疫促进作用。化学成分含多种甾体皂苷。麦冬皂苷A含量最高,麦冬皂苷B次之;此外含多种高异黄酮类化合物。功能主治:①治肺燥咳嗽:麦冬15克,桑白皮15克。水煎服。②治肺热咳嗽:麦冬12克,北沙参12克,黄芩9克,桔梗9克,杏仁9克,甘草6克。水煎服。③治胃酸缺少:麦冬、石斛、牡荆各6克,糯稻根9克。水煎服。④治中耳炎:鲜麦冬块根捣烂取汁,滴耳。⑤治小便闭淋:鲜麦冬90克(干品30克)。水煎成半杯,饮前服,2~3次。

5、三台半夏与治新冠肺炎病毒畅想

刘文传主任的《李珣研究》书“附录5:《李珣趣谈》”一文中说:一个外国人能够在前蜀小朝廷里谋得官职并受到宠爱,实属不易。李珣第一次感受到战争多么残酷,争权夺利如此血腥。后蜀灭亡了,新建立起来的后唐希望他能为后唐效力,李珣当时就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我虽是波斯人后裔,但我以中国为家”。李珣的潜台词是,战争死了那么多人,

活下来的最好都长命百岁吧。李珣拒绝依附后唐,“他到处收集整理药材,以实现自己帮助中国人长命百岁的理想”。此后,李珣在广州、海南等地生活了多年,他将收集到的药材及药性记录成书,并取名为《海药本草》。此书旁征博引,详细记述了各种药物的形状及药性等,为后世研究中药材提供了参考。随着时光的流逝,昔日富裕豪华的李家最终成为人们口中的传说。李珣的痴心依然不改---就算不能帮助人们长生不老,延长寿命总可以吧!他对中国的热爱以大量的词作和《海药本草》跃然纸上。

以上《李珣趣谈》也许把已融入现实社会,“以中国为家”的回民李珣奔事业的分析:“他到处收集整理药材,以实现自己帮助中国人长命百岁的理想”写得简单了些---“帮助中国人长命百岁”,李珣完全可以去学医,当个中医看病,既能“帮助中国人长命”,也能挣些现钱养家糊口;写《海药本草》,到处收集整理药材,既要自己花钱,书并不能出版发行卖钱---李珣的理想到底是啥?理想何来?

也许对照今日世界新冠肺炎病毒及其变异体“德尔塔”病毒扩散,封城锁国、戴口罩是一种解决办法;打疫苗办法好,但要全覆盖,时间长;送氧气、呼吸机,只是一时的救急---当医生治新冠肺炎病毒最终还是要有好药。所以李珣选择在“药”上---即使当时科技不行,也是今后寻找的方向。2021年6月24日《晚霞报》发表的文章《古代中国制造为何徘徊不前》中说:隋唐科举制的兴起,社会上的人都想去读书,应考,当官。参加科考,脱离工匠阶层而做官,偶然出现的大工匠只是凤毛麟角。其次,制造业的利润,必须通过商业才能实现;而非自由竞争的商业环境,加大了工匠在贸易中的弱势地位。

李珣的一生走的正是这种实践的认知:他从小读书,应考而做官。但战争残酷、争权夺利血腥、瘟疫流行群众死亡。李珣的清醒,后蜀灭亡他拒绝依附后唐。写《海药本草》是为培育工匠,而药材是商品,通过自由竞争的商业环境,家乡才能脱贫致富---李珣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如今在他家乡三台找《海药本草》这本无字之书,能看到最真切的是“麦冬”在绵阳大地开花,“半夏止咳糖浆”的传奇。

三台半夏,本地俗名“麻芋子”,为天南星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块茎近球形。生于山坡草地、荒地、包谷地、田边、河边及疏林下。夏、秋季均可采挖,洗净泥土,除去外皮和须根,晒干或烘干。具有镇吐、催吐、镇咳、祛痰、抗癌、抗生育、抗早孕、抗心律失常、抗实验性溃疡、抗硅肺、促使外周淋巴细胞分裂等作用。还有对治疗食道癌、胃癌、舌癌、皮肤癌和恶性淋巴瘤取得较好疗效的报道。半

夏提取物对 HeLa 细胞、小白鼠实验肿瘤 180、HCA 实体瘤（肝癌）、U14（鳞状上皮型子宫颈癌移植于小白鼠者）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半夏总生物碱对慢性髓性白血病细胞（K562）有抑制作用，能损伤悬浮生长的 K562 细胞形态，抑制其增殖。

半夏生用有毒，用前须炮制。炮制品有：生半夏、清半夏、姜半夏、法半夏等。半夏奇异，是像放大的“新冠肺炎病毒”模型——“麻芋子”呈类球形，直径 1~1.5cm。表面周围密布麻点状根痕；下面钝圆。质坚实，断面洁白，富粉性。气微，味辛辣、麻舌而刺喉。喜生于潮湿肥沃的沙质土上，多见于房前屋后、山野溪边及林下。化学成分：内含 3-乙酰氨基-5-甲基异唑等 60 多种成分，及 16 种氨基酸和多种无机元素。其中，所含的草酸钙针晶为半夏的刺激性成分之一，经炮制后，晶形发生变化，含量急剧下降，刺激性明显减弱。另含琥珀酸、丁基乙基醚、苯甲醛、半夏蛋白、姜辣醇、胰蛋白酶抑制剂等。半夏中提取的多糖具有较强的网状内皮系统激活活性，能增强网状内皮系统吞噬功能和分泌作用，抑制肿瘤的发生和增殖。甲醇提取的半夏多糖组分具有多形核白细胞诱导能力，由此推测，半夏可能是通过活化多形核白细胞，导致肿瘤破坏的细胞反应。

重大科技成果，是需要国家的力量才能完成的。例如，拟设三台的“麻芋子”，能制造出治“新冠肺炎病毒”的有效药品，那么“麻芋子”内有效成分的全基因组序列测试；细胞内新冠肺炎病毒 mRNA 携带编码蛋白的基因组序列测试，在绵阳和成都的大学、科研院所，缺乏人才和工具，是不能单独完成的。其次，“麻芋子”对消灭新冠肺炎病毒的有效成分即使有，完成这种大量的科学测试和动物实验，需要大量的经费的投入，没有国家的全国组织、调配和动员大商家的资金捐献，光三台绵阳要建成类似“硅谷”式高科技的生产治“新冠肺炎病毒”有效药品基地，是不可能的——这只能是帮李珣的畅想。

【9、“李珣年谱”梳理李珣活动与初心】

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院士 6 月 24 日在四川大学 2021 届毕业典礼上，寄语毕业生讲话说：“有人说，人生除了生死就是在不断选择。选择对了，你可能就抓住了机遇；选择错了，千回百转才能走得出来。有这种能力时就可以走小道独辟蹊径、干点前无古人的事业，暂时还没有就多走大道，大道致远也不错”。李言荣校长说的很不错。

当代高科技的分子生物学及其技术，在绵阳和成都的大学读生物专业，能熟练掌握也不容易。例如，德国斯万特·帕博教授，掌握了在实验室解决 DNA 污染的问题，搭建的超净室已成为世界上大多

数古 DNA 研究实验室的标准配置。30 多年来帕博以分子生物学分析基因序列，推演人类起源、进化、迁移，1997 年以来他对古尼安德特人，和 2010 年帕博团队对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发现的一段小指骨进行的 DNA 测序等，发现智人的祖先曾与古尼人和古丹人杂交，并将一部分 DNA 留下——这种进击古基因组研究，举世无双；加之西方控制着全世界发表高科技论文杂志的大权，了不得。

所以李珣即使出在现在，他读过内地大学的生物系或考古系，是否可超帕博教授？李珣如何选择？他听李言荣校长，选择“走大道”——五千年中原都是“其稳定的农耕文明”的中心，“跟其稳定的农耕文明”论的大多数专家走，认同其回民祖先智人曾被古尼人和古丹人杂交过，并将一部分 DNA 留下。当然他不会学三国的巴蜀前辈张松献地图，引进战争与英雄史歌。梳理“李珣年谱”的选择——他是“走小道独辟蹊径、干点前无古人的事业”——他认可中华文明有过“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阶梯。

为啥？2021 年 5 月《奥秘》杂志发表的《罐头大小的猴类曾飘过大西洋》报道：猴类也许曾“撑着竹筏”漂过了整个大西洋——2020 年南加州大学的埃里克·塞弗特教授等宣布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只有罐头大小的猴类——因在秘鲁的亚马逊雨林中找到了四枚牙齿化石，这种猴类品种属于非洲现已灭绝的灵长动物科“副猿”。“副猿成为目前第三种已被发现从非洲成功跨越大西洋途径 1440 公里到南美的哺乳动物——可能是搭乘海岸边在风暴中折断的植物漂洋过海的。这似乎不可思议，但只要有足够的食物，猴子即使没有淡水也可以存活”。

1、中国祖先不需都经过古尼人和丹人杂交

以上“副猿”的考古说明，中国古人也有不被西方古尼人和古丹人杂交的祖先，但有不少专业科学家和媒体却热衷这种作“洋娃娃”的宣传——其实李珣作为被汉人称惯“波斯商人的后裔”的中国回民，也许很敏感听大人传说祖先在海外，回远古家乡鄞江，不走西北边的陆路，走西南边的海路的情形——即使今天打开地图，如果走海路看早在遥远的古代，虽然印度洋上的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是阻碍东西方来往的一片难以逾越的水域，但在这上面的亚非大陆，索马里、阿拉伯、波斯和印度西部沙漠，一直伸展到海边，早有古人，就开始考虑从海上开辟一条更直接便利的道路。

先说在 3000 多年以前，阿拉伯人回民顺着红海航行到了东非，还曾在波斯湾上航行过。追溯到更遥远的古代，在第一个髯抱期世代在海边和海上生活的智人，其结果是使他们逐渐发现了印度洋

的秘密。因为在第二个孵抱期，从《山海经》描述诞生的远古联合国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时开始，我国便流传有许多远方的异国。

例如东方海外的黑齿国，那里的人们牙齿是黑色的，喜欢吃蛇，也能玩蛇；南方海外的灌头国的人嘴部突出，以捕鱼为生；西方海外的奇肱国人会捕捉各种飞鸟；北方海外的聂耳国的人，耳朵较长，住在海岛上，是猎虎的能手。这些有趣的传说，李珣看起来仿佛都是充满的荒诞神话，但仔细分析，传说往往以现实为基础，其中有一些很可能是波斯古回民在海上的见闻实录，或在航途中从其他民族古人那里听来的。总之，如果是 20 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人类祖先，离开非洲，有一部分迁移来到阿拉伯海的也门和阿曼海岸边生活。

波斯古回民也许曾注意到太平洋上的土阿莫图群岛的民族起源，以及细察看过埃及有大金字塔内壁画上的芦苇船图形。他们认为大洋可能不足以成为古人类往来的障碍，有古回民很可能就是乘坐芦苇小船漂航往返的。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迷航的独木舟，在漂洋越海的途中被大海所吞噬，真正实现往返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有趣的是，在与大海完全隔绝的远古郢都江津镇有很多崖墓，以及巴蜀各地区都发现有一种像船的棺材悬在悬崖上，而非发现于中国东南的海边。

很可能 5000 多年前巴蜀还是内陆盆塞海，那些侥幸逃生的人类的非洲祖先，经阿拉伯海的洋流乘独木舟之类的工具到印度，从印度到缅甸，缅甸到云南，云南到广西，北至内蒙古，特别是进入中国后，就迁居到水草丰美、适宜于渔猎生活的巴蜀内陆盆塞海，挖崖墓，或按照曾在阿拉伯海湾生活的方式制造了这些像船的悬棺的独木舟。

因此 20 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人类祖先迁徙到中国，如果走的是海路，就不需要 10 到 15 万年---仅用被古尼人和古丹人杂交，挑战“非洲起源”说难于成立。由此不难想象今天全球其他的各远古大文明，都是从巴蜀盆塞海文明走出分离，而且也都打有它的显著山海文明的区域烙印---人类政权现象和政权人物现象的人类文明起源，有两个孵抱期：一是非洲到中东的地区，一是远古巴蜀盆塞海及周边东南西北中的地区。从 200 万年前开始，人类的大迁徙，就曾在这两个方向有过多次的来回。巴蜀远古盆塞海其后干涸了的四川盆地，大围坪盆塞海遗迹海啸地貌，也类似档案记录---如果说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 8 000 多年前的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在西方海洋文明产生之前，就已经在四川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过多时。

远古联合国就起源于第二个孵抱期的游团、部落、酋邦组织形态都有的集成体，类似今天的联合国的民族组成，比今日联合国组成小得多。传说的类似联合国的第一任秘书长“盘古王”卸位后，就带领部分人马行舟渡海到南边云南，进入缅甸，沿印度的恒河水，横穿印度出海，乘阿拉伯海的季风，进入波斯湾，再沿海峡到达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是第一代苏美尔蜀人的来源。

以后又从埃及和两河流域渡过地中海，先后在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等复制“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山寨立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因此中国南方多盘古王的传说。分析远古大地震串形成巴蜀盆地内的堰塞湖到盆塞海，又由大地震引起的不同阶段的巴蜀盆塞海长江三峡的几次大的溃坝---溃坝会冲走大量的人和财物，活着留下失去亲人和东西的人群中，会有人组织一部分人商量一起到下游去寻找，最终会有人留在下游“积水区”生活，他们带去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并有所发展---称这种“积水文化”，会形成长江中下游东西相像的两个古丝绸文明文化区，构成了长江与黄河流域古地貌和历史形成的不同，这为解读这些地区的考古文化面貌和结构关系，有更清楚的认识。但这种“大历史”的认识并没有完---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可能存在共同的交叉点。

这就逼迫“全球化”要研究“大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历史上，人类起源/文明存在的三大孵抱期：(a) 第一孵抱期在非洲；(b) 第二孵抱期在亚洲；(c) 第三孵抱期在欧洲。历史要讲“大历史”才行---人类统一的全球人种之间有“杂交”，主要在第一孵抱期，智人统一后迁徙生存分为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不具有这种先进性的古尼人和古丹人等，都最后消亡了。第二孵抱期最早打造全球的国家与文明形态，也是互动及双向的。李珣生活的年代，仍在第二孵抱期。第三孵抱期打造的政党和科技形态，也是双向互动的，时间是从 1630 年张献忠农民起义活动期间，以及欧洲近代自然科学创始人伽利略逝世的 1642 年和牛顿出生的 1643 年之间开始，到 21 世纪的现在及未来一段时期。孵抱期地点在沿西欧大陆边界从大西洋北海岸到南面地中海的海峡两岸地区，主体是“维京人”打造。

第二孵抱期和第三孵抱期的统一，仍然是在第二孵抱期人类命运共同体团结抗灾，以及民族文明冲突中，打造出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初心。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啥有顽强的生命力，也在有这种万变不离其宗的“初心”---这不仅是有毛主席说的：“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的革命，也有毛主席说的：“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

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的多边与单边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统一。原因是第三艘抱期的特征“政党和科技”，有时存在相互“截胡”。2021年6月24日“观察者”网发表的《白钢：回顾中西历史》的文章中说：“‘政党国家’是一种近代以来的政治现象，它意味着政党成为了国家政治的主要组织力量，从而至少在形式上取代了传统意义上贵族或门阀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源出于西方，在西方语境中，表达政党的词汇（如英语 party，法语 parti，德语 partie）皆可回溯到拉丁语 pars‘部分’”。

“因而政党也很自然地理解被理解为源于社会中特定的‘部分’成员、代表其利益并为其服务的意味”---这里的“部分”，也会“截胡”到科技。例如，被“截胡”说中国古人有古尼人和古丹人杂交过的，这对不对？还是你的“科技”真的做到家没有---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秀杰教授，1968年生于吉林省四平市。2004--2009年去美国，作过美国辛辛那提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访问学者。她从事古人类学人类起源及演化的研究，2017年3月24日《中国科学报》第1版要闻介绍，其中提到吴秀杰等专家说：“许昌人”是中国境内古老人类和欧洲尼安德特人的后代，这是他们从“许昌人”头骨化石外形分析与尼安德特人的相似，说的基因证据。

我们读到后给吴秀杰教授写信，质疑她的研究不真。2017年3月26日吴秀杰教授已给我们回信说：“确实我们做的工作目前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都在探索未知的过去，许多问题并不清楚，希望通过大家的工作，日益接近真理，或者历史的真实。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不同的认识，甚至争论都是很正常的。谢谢提醒，下一步我会关注资阳人头骨化石的研究”---从1951年修成渝铁路发现巴蜀盆地“资阳人”，1952年修宝成铁路发现绵阳“边堆山人”遗址等以来，部分有帕博教授那种进击古基因分子测序真本事的专家，并不关注60多年前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领导的“资阳人”与人类上古史大统一等的探索。而部分像湖北学者胡远鹏教授，就直说：“苏美尔人就是蜀人，这从《山海经》以及《旧约》可以得到印证”。

2、从五代十国梳理李珣活动初心

李珣为啥写《海药本草》？有人说他是“奔事业”的人，把自己定位为是“奔生活”的人。“奔事业”---像如今说的“考大学”、“考公务员”；“奔生活”像有些农村人说的早结婚、早生孩子，早下地干活，或外出打工。但“奔事业”的退休后具体做某件事情谈意

义，无论是“奔事业”的，还是“奔生活”的，有时评判却一致：是否“长命百岁”。所以《李珣趣谈》中有说他：“收集整理药材”，是实现帮人“长命百岁”的美誉。但李珣是生活在像如今这种和平安宁有序的日子里吗？其实，就是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无论是“奔事业”，还是“奔生活”；无论家庭是贫穷，还是富贵，一个成年人都会压力。

李珣选择“收集整理药材”写《海药本草》，初心到底是啥？一个回民在大量是汉族人的外面打拼，生活习惯与汉人还有不同。如果奔波在鄞江河畔山清水秀，保存浓郁回民习俗，还有大部分回族群众居住的鄞江镇松柏村多好---这里离鄞江县城仅一公里，处于梓州到成都的必经之路上，商旅往来频繁。“奔事业”，“奔生活”，也比后来发生的“湖广填四川”时处境好。但李珣的初心，是从哪里来的？

从“湖广填四川”往上看五代十国（907年--97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乱世---是五代（907年--960年）与十国（902年--979年）的合称。五代是指907年唐朝灭亡后，依次定都于中原地区的五个国家，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与此相对应的是，前蜀、后蜀、南吴（杨吴）、南唐、吴越、闽国、南楚（马楚）、南汉、南平（荆南）、北汉等南面十个割据势力，被后世史学家统称十国。

李珣的家乡不在政权正统的中原，896年在三台鄞江边出生，唐朝灭亡后，他经历了整个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直到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五代十国的当年960年建宋朝时去世，不到65岁。

即李珣也经历了除五国外的前蜀、后蜀、南吴、南唐、吴越、闽国、南楚、南汉、南平、北汉等部分十国时期。李珣对官场生活体验，主要是在南面的前蜀和后蜀地域。但前蜀和后蜀不存在直接的关系---在历史上西汉和东汉，西晋和东晋，北宋和南宋等，皇帝都是一脉相传的。而对前蜀和后蜀来说，前者的开国皇帝是王建，后者则是孟知祥一手创建的。当然前蜀和后蜀这两个割据势力，都定都成都，并且疆域都包含今四川、陕西、甘肃等地。更为有趣的是，后蜀的开国皇帝孟知祥，直接参与了后唐消灭前蜀的战役。

前蜀（公元907年~925年），由王建所建，鼎盛时期的疆域约为今四川大部、甘肃东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历经两位皇帝，共存在18年。王建为今河南舞阳人。唐朝末年王建被唐朝任命为西川节度使；孟知祥被后唐任命为西川节度副使。对此，自然为王建、孟知祥割据蜀地奠定了基础。王建于903年受封为蜀王，906年他在成都建立行台，次年唐朝被后梁太祖禅代，后梁建立之初，曾遣使

宣谕早已割据四川的王建，为王建所拒。王建于同年称帝于成都，国号蜀，封授百官，蜀王府则改称皇宫，王府内外各种建筑的名称也全部更换。由此对前蜀来说，为于 907 年正式建立。前蜀建立后，大规模战争没有，但前蜀的赋税很重。在建王去世，王衍继位后，营建宫殿，巡游诸郡，耗费大量财力，让百姓苦不堪言。

到 925 年后唐大军开始进攻前蜀，进入大散关，蜀凤州(治今陕西凤县东北凤州镇)、故镇(即固镇，今甘肃徽县)守将相继投降，兴州(治今陕西略阳)、成州(治今甘肃成县)两刺史弃城遁去，三泉(治今陕西宁强县西北阳平关)为唐军攻下。不久后唐大军包围成都，王衍自知大势已去，遂与众臣一起出城投降。后唐庄宗李存勖假意下旨，称会善待王衍及其家族，但等把王衍及降族押解出西蜀后，就将他们在路上斩杀了。因此前蜀仅存在 10 多年。后蜀(934 年~966 年)又称孟蜀，是孟知祥所建立的势力，也是定都成都。

后蜀鼎盛时期，疆域约为今四川大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其疆域比前蜀要小，如东线由襄阳退至重庆一带，北也由甘陕退到广元。不过后蜀的存在时间则相对较久，达到了 30 多年，即李珣已去世。这其中是 925 年后唐灭前蜀，但前蜀灭亡之后，后唐接着又发生兵变，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兵变中被杀，平定前蜀的主将郭崇韬亦因此事变身亡。在此背景下西川节度副使孟知祥，遂窃取蜀中兵权，平定叛将李绍琛，整顿吏治，成都始安，随即断绝与后唐的隶属关系。即后唐并没有真正平定蜀地，因为后唐虽然消灭了前蜀，却对取而代之的后蜀无能为力。

对于建立后蜀的孟知祥来说，效仿前蜀割据一隅。中原大乱结束之后，新即位的后唐明宗李嗣源，授他为西川节度使；后唐 933 年又封孟知祥为蜀王。934 年孟知祥在成都建国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虽然孟知祥登基才七个月就去世，但是孟知祥之子孟昶，却比前蜀王继位的王衍能励精图治，境内很少发生战争，是五代十国时期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维持了 30 多年的安宁和平。此外成都简称“蓉”也与孟昶有关，当年他命人在成都外圈土墙上遍种芙蓉树，多年后长成气候，深秋芙蓉怒放如同红锦。芙蓉城的名字就此传下。

这是李珣希望看到的；也是他分析中华农耕文明在后，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在先---初心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在先，即使农耕文明在后出现类似五代十国的乱世，“和平与发展”也时有冒现---东汉西汉、三国、西晋东晋、南北朝、隋朝之后，到唐朝统一，国家也出现过一段科举变革、开放、

商旅往来的和平繁荣时期。

但是，孟昶在取得一番成就之后，也不免奢侈淫靡起来。即孟昶在位初期确实是比较有作为的，但在位后期，孟昶并没有能抓住问鼎中原的机遇，从而只能接受灭亡的结局。到 947 年的后晋末年，契丹攻入汴梁，中原陷入战火。后蜀本有足够实力，孟昶却贪图安逸，丝毫没有逐鹿中原的雄心。后晋和后汉时期，都有驻守关中的将领请求归降后蜀，孟昶却畏首畏尾，无意进取，以致丧失战机。

等到强大的北宋一统中原后，后蜀偏安两川之地成了梦想，灭亡已经是不可避免。李珣虽然不是生在人类文明第三孵抱期打造的政党和科技双向互动的时代，但回族“穆斯林”麦加人穆罕默德(约 570--632)创传的伊斯兰教，组织领导群众却类似“政党”。复旦大学白钢教授的《白钢：回顾中西历史》文章中说：“中国传统语境中以‘党’指代通过私利或私谊而结成的集团(前者如‘结党’、‘党羽’，后者如‘父党’、‘乡党’、‘党同伐异’)，有相通之处，故常具贬义。而与之相反的‘不党’，则成为被推崇的状态”。李珣也许从“穆斯林”伊斯兰教类似“党政统一”的角度看，在第二孵抱期进入中原国家的时代，争夺“王权”的先侈有余，争夺类似“穆斯林”世界的扩大和一统不足。这是他在帮助王衍继位的实践中，证明不能解决的。

第二孵抱期的第二特征“文明”，与第三孵抱期的第二特征“科技”，有对应之势。但在“党同伐异”之间，“文明”比“科技”难以实验鉴别，所以这种类似远古盆塞海“和平与发展主题”初心第二孵抱期的传承，无论“奔事业”的，还是“奔生活”，他只能类似偏向“科技”的“海药本草”打造，作最后力所能及的努力---李珣亲身体会五代十国割据蜀地的势力，看到确实容易滋生懈怠的情绪---毕竟坐拥天府之国后，很多将士和官员难免失去奋斗的目标。当然这之前的三国时期，诸葛亮、姜维虽北伐中原却没能成功，也是教训之一。

五代十国时期的前蜀和后蜀，与中原地区都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争夺“王权”的先侈有余。南方成为各路诸侯争夺的战场，各方军阀占领一块地方就开始开国称王称帝。当然李唐王朝灭亡后的五代更迭主要是在中原；李珣“科斗”为看大海和商贸，在 937 年后晋初期开始长途跋涉的漫游。他从蜀中乘船沿长江东下，经巴东、巫峡，入湖湘，在湖南湖北一带过了一段时期的隐居生活，然后溯湘水而上，至九嶷山，越南岭等五岭，在 943 年的后晋后期到达广州。定居七年后，950 年的后汉末年他回到三台老家郪江镇松柏村开始《海药本草》著述，组织村民栽培麦冬等中药材推广和做商贸。

在这之前 15 年中，李珣认识到远离争夺“王权”有余的中原地区，真可比较出北方陆路商贸与南方海路商贸之间的差异。正如《岭南科学技术史》书中说：“《海药本草》的价值——在中国古代医药学的宝库中，这部由曾居广州，世业香药的五代前蜀人李珣著就的巨著，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是那一时期广州繁盛、宏大的药材贸易的直接反映，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技术交流的一个注脚”。

2018 年 4 月 25 日《广州日报》，发表的《看看这部《海药本草》就知道当年广州的药材贸易之盛》一文中说：“李珣曾到过当时海外药物传入的主要港口和集散地——广州。唐代，经由长达 1.4 万公里，由广州直抵红海、阿拉伯海巴士拉港的‘广州通海夷道’，带来了海外贸易的前所未有的扩展。中外药物、药学，乃至医学的一些领域，实现了大交流。学识渊博，兼通医学的李珣，亲眼看到了经由广州港输入的各种各样的外来药物”。为啥同体制南北边差异还有？

3、李珣传世词作见谋求“盆塞海”情怀

李珣的出名，在文人中，不是他著有《海药本草》六卷，对药学颇有研究。他曾游历岭南，饱览南国风光，认识了许多从海外传入的药物。但惜原书至南宋已佚，其内容散见于《政类本草》和《本草纲目》等著作中。历来文人对他欣赏的是：李珣词现存 54 首（见《唐五代词》）多感慨之音——《花间集》录 37 首，《尊前集》录 18 首，其中 1 首《西溪子》重复。李珣还著有《琼瑶集》，已佚。

其词调可分为《渔父》、《南乡子》、《西溪子》、《女冠子》、《中兴乐》、《酒泉子》、《浣溪沙》、《巫山一段云》、《菩萨蛮》、《渔歌子》、《望远行》、《河传》、《虞美人》、《临江仙》、《定风波》等，计 15 种。

南宋王灼的《碧鸡漫志》，还记载了李珣以 5 种词调创作的另外 5 首词作。而在文人中，欣赏《花间词》的是欣赏叙写美女爱情为主——只看到既有诗客词人绮红偎翠的生活描写，又有春怨秋悲、离别相思的情感抒发——这是体现李珣的唯一心态，所吟诗句才动人吗？

为啥花间词派一直因其颓弱文风和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大受后人诟病？而花间派中的李珣，被炒作为五代前蜀的波斯裔词人，在唐五代甚至整个词史中，都是另辟新境和独树一帜作品的超越者呢？从李珣懂“盆塞海”的知识，明白是“声东击西”表白他增添的“盆塞海”情怀，与大多数仅持的“农耕文明”暗斗上，也许可揭秘一些。

例如，以刘文传主任的《李珣研究》书中，第七节《李珣的传世词作》收入的 60 条分析：“1、巫山一段云（其一）”如“往事思悠悠”；“2、巫山一段

云（其二）”如“有客经巫峡，西风回首不胜悲”；“3、渔歌子（其一）”如“楚山青，湘水绿”；“6、渔歌子（其四）”如“九疑山，三湘水”；“27、定风波（其四）”如“纵有回文重迭意，谁寄？”；“33、菩萨蛮（其三）”如“楚天云外路，旧欢何处寻”；“59、句”如“参差草树连巴国，依约云烟绕楚台”等，都怀念家乡，盼望国家何时能把远古的“盆塞海”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结合起来。

查《李珣年谱》，他的传世词作都是 42 岁离川后，在外 14 年中写的。那么李珣的写词才能，从何而来？他生活费用，从何而来？他的家庭经济状况如何？从小环境对李珣有啥影响？

4、李珣情结鄯国建筑字库塔界碑等影响

即使有人猜测，李珣为唐穆宗 821 年来华贩卖药材的波斯商人李苏沙的后人，或者李珣先人是随唐僖宗 880 年间入蜀的波斯商人，都不能否认公元 896 年出生在四川三台县大部分回族群众居住的古鄯国鄯江镇松柏村的李珣，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回民。

虽然李珣的生平资料，正史和野史笔记涉及较少，或差错大，但民间传说可信的也有。如一些史记说，李珣的妹妹李舜弦的丈夫王衍（889--926），在位 8 年（918--925），他继位时（918）是 19 岁。这里的算法是算错的：918--889=29，即王衍继位时（918）是 29 岁，不是 19 岁。还有史记说他的汉人朋友尹鹗等，讽刺他有“胡气”，如不吃猪肉，相貌残留穆斯林人的络腮胡子等。李珣有时也会反唇相讥，说文人只知帝制年号，不懂公元记年计数，连帝王的岁数也算错。

这种现象，似乎从五代后蜀人何光远写《鉴诫录》起也有。当然何光远的《鉴诫录》卷四等书，也留下李珣“祖先为波斯人，后家梓州。其妹舜弦为前蜀主王衍昭仪，他亦以秀才被荐举为朝官”。“李珣祖先为波斯人，唐末为避难而随僖宗入蜀，定居梓州（今四川三台），李珣即为出生于蜀地的波斯人。李珣本人精通医学，其弟李弦又‘以鬻香药为业’”等宝贵记录，为民间回民传说作了证。

那么李珣爱科技如数学、医药、考证等情结从哪里来？当然李珣有受“阿拉伯大翻译运动”等波斯人历史传说的影响——传闻 628 年后，唐太宗李世民引进的西方国主海力帅派的阮杂斯等前往大唐辅佐的三五百阿拉伯人，没有被李世民安排上战场，也没有放走客人，而是到长安后叫做礼拜和讲经。他们虽然在长安成了家，但他们的后人又大部分搬迁到传说“回回人”称之祖先“娘家”的巴蜀古鄯国鄯江镇松柏村一带。不管李珣先人是不是波斯商人李苏沙，或随唐僖宗 880 入蜀的波斯商人，传说李珣的

父亲都像松柏村回民传统的“阿訇”：不但为婴儿初生时命名，主持婚丧嫁娶礼仪，排解纠纷等凝聚和团结回民的活动，还做辗转奔波买田、经商等聚财的活动。由此他曾能自费有经济实力和体力组织朝觐团，到过多国穆斯林去圣地麦加朝觐等阿拉伯地方。但李珣的父亲，不是仅把“朝觐”看成义务，主要是想把祖先的“大翻译运动”精神搬回“娘家”巴蜀古郡国郫江地方来。

由此李珣受父亲影响，从其他阿訇口中，也了解到公元8世纪后的阿拉伯帝国的翻译运动是怎么回事——这主要是第二孵抱期远古盆塞海文明传播扩散到古印度、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中东、埃及和古地中海克里特岛、西西里岛等地，产生了逻辑性更强的数学、物理，如欧几里德几何、阿基米德浮力等科技知识。这些知识没有在后来的战火中失传，是9世纪后由阿拉伯本土的“翻译运动”，传导到白衣大食统治的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地区，于是古代古老的东方文明，从这里传播到法兰克、日尔曼尼亚和意大利半岛周边地区。

即阿拉伯输入欧洲的大翻译运动，才引起欧洲人的文化学习或者启蒙运动的。西方欧洲学术对在亚洲东方地区的攀附，冒认埃及、希腊、罗马为欧洲文化始祖，也就是从这个时空阶梯开始的。当然这些传说是否实在，李珣的父亲等阿訇拿不出更多的证据——对于太远的，仅是捕风捉影的，他的父亲等阿訇只能点到为止。但李珣总想找到补充一些传说的现场实物及文字，他真还看到了些——因为如今三台、盐亭、射洪、中江等县市，曾是远古嫫祖西陵和郫国文明的中心地区。

1998年4月28日《绵阳日报》“天下大观”版发表的《盐亭嫫祖考古大发现》的文章报道：“从盐亭梓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有数百座密集寨子山的古生态景观与寨子山下半坡的大围坪台地。如从盐亭境内盘古圣地的天垣盘垭村袖头山、五面山以及嫫祖故里的云毓山、炎鼎山、嫫村山出发，还有如：目角寨、新寨山、大牛山、寨子山、仁和寨、保和寨、大碑寨、母猪寨、子母寨、四面山、罐子寨、猫儿寨、麒麟寨、凤凰寨、锣锅寨、毛达寨、金铧寨、点灯山、古龙山、炎台山、大佛寨、长生寨、摩天岭、烽龙寨、四方山、佛贡寨、金垭寨、蚕丝山、水丝山、马鞍山、太皇山、石马山、阳鹤山、白象山、丝源山、王岗咀、打鼓山、铜钟山、笼子寨、玉龙山、高粱观、仁广寨、江家寨、大寨山、伏龙山、刘家寨、白虎寨、青龙寨、登高寨、南瓜寨、水秦寨、二龙寨、太阳寨、七庙寨、空相寨、天生寨、狮子寨、金凤寨、金龙寨、观台山等60多处古山寨”。

2019年12月8日《绵阳日报》头版发表的《花林寺大殿：从元代走来的古建筑瑰宝》一文报道，位于盐亭县富驿镇的元代建筑花林寺大殿，“根据大殿房梁的墨书记载，花林寺大殿建于元朝至大四年（1311年），如今已经708年……2012年，大殿进行维修施工期间，文物专家再次前去调查，并通过考古学方法，分辨出花林寺大殿建筑始建时期和后期改动的构件，还对部分木构件取样，进行碳14检测，测定始建期木材距今约700年，后期改动木材则分散在多个时间段，同时还发现了多个时代的墨书题记。古建筑在建造时，古人都会在建筑物的房梁等处，写上建造缘由和出资人等。在花林寺的大殿建筑构件上，共发现23条约1500字的墨书题记。其中，在大殿挑窝位置上面找到了‘大元保宁府’的字样。‘保宁府’正是元代设立的行政机构，当地正在辖区内。2015年文物专家用红外摄影技术重新拍摄题记，使原先因木材变色而难以辨认的墨迹清晰显现，确认了花林寺大殿创建的具体年代为元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类似花林寺建筑有房梁墨书题记出现很早——远古建筑建造时，古人也会在建筑物的房梁等处，写上建造缘由和出资人等墨书记载，或石刻界碑记载。

笔者青少年时代在盐亭生活、读书、出行等期间，也亲身在古建筑的学社、戏楼、寺庙、寨堡、祠堂等地方，看到类似的情况——上世纪50年代初，土改革命如暴风骤雨，99%的这类古山寨的学社、戏楼、寺庙、寨堡，祠堂等古建筑，被发动起来的人们拆毁；到“文革”时又最后一击，至今已荡然无存——当然，这不怪“革命”，而是个别干部理解“打倒封资修”掌握政策出的偏差。如绵阳梓潼县的大庙山、江油市的窦团山、平武县的报恩寺等古建筑，就得到保护下来。

21世纪初笔者曾回老家探望老母，一次顺便到盐亭县天垣场赵家沟和胥家沟，考察目角寨、新寨山等处大风洞和小风洞的古山寨遗存——1950年刚解放，我们还是儿时，随跳秧歌舞的大人庆祝解放的锣鼓，到胥家沟村办事看热闹，第一次被大围坪地貌震惊——天垣场赵家沟和胥家沟两条相邻的长山沟，类似一个小写字母“m”形，在“m”山形的三横内部两沟四面的半山腰，都是山坪，农村人家房屋就修在这四条地带的半山腰山坪上，水田一般在山下。而我们老家的房子虽然隔着举溪河，但似乎也在这个半山腰大围坪水平地貌的天垣场山坪地上。那次探望老母在胥家沟小风洞山崖考察，就看见封山护林的石碑上刻写的文字中，写有1958年大跃进和1960年代的改田改土中，在小风洞山崖洞多次挖掘发现过古老陶瓷人与动物等文物。其实我们在儿

时就看见和听大人说过，改田改土在天坛场附近“窑湾头”大围坪“太阳坟”挖掘出陶瓷的“摇钱树”；在天坛场附近盘垭山崖边挖掘出刻有“蝌蚪、鸟爪”形的上古文字界碑石残片，等等。

2020年10月19日《华西都市报》发表的《盐亭：中国字库塔之乡》的文章报道：字库塔，也称字库、惜字塔、焚字炉、敬字亭等，是古时焚烧字纸的塔式建筑。古人认为文字神圣而崇高，字纸（写有文字的纸张）不应随意丢弃，哪怕废纸也应洗净焚化。敬惜字纸的信仰，是伴随发明造纸有文字书写而产生的。四川是全国字库塔存留最多的省份；盐亭县堪称“中国字库塔之乡”，至今保留着32座字库塔。盐亭县是中华人文始祖、黄帝元妃嫫祖故里，历史悠久，惜字崇文的优秀文化在这块土地上绵延不绝。江山留胜迹，李珣复登临。

西汉刘安《淮南子》载：昔者仓颉创造文字之后道破天机、惊天地泣鬼神。盐亭人还保留修建字库塔优良传统，足以证明盐亭人历代崇尚中华传统文化、倡行文明风尚。盐亭全县32座字库塔，分布于17个乡镇，有的建造在场镇街口、书院寺庙侧、道路桥梁旁边。在外形上，字库塔虽然和普通风水塔、文昌塔、景观塔相似，但又有不同。字库塔内部中空，塔身均有焚字口，或方、或圆或倒U形，也是字库塔最为明显的标识。侧重于实用、又便于焚烧字纸的字库塔就建在场口或路口，如玉龙镇的玉龙字库塔、龙潭字库塔等。培植风水的字库塔，往往建于河边或山边。如榨溪乡华严村的榨溪笔塔、富驿镇努力村字库塔和梨园村字库塔、县城盐亭笔塔等。

2016年第7期《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报道：盐亭县现存字库塔可谓中国字库存量第一的县，堪称一绝。到盐亭，你能触摸到华夏5000年前文明。盐亭仅是远古嫫祖西陵和郟国中心的一个县，应该在唐末五代十国的时空阶梯时，李珣对以上类似字库塔、古山寨、戏楼、寺庙、寨堡、祠堂古建筑房梁等处，见到写有建造缘由和出资人等墨书记载，或石刻界碑记载曾经留下的文字信息，继而查证类似远古巴蜀盆塞海文明及类似易经、卦爻太极文字起源等传说，会在当地部分人们的口中一代一代记忆流传，比我们小时70年前多得多。

【10、李珣谋求东西大同的科技翻译情怀】

李珣自身早年，从类似字库塔、古山寨、戏楼、寺庙、寨堡、祠堂古建筑房梁等处，了解掌握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时期的科技文字历史，与他从回民父亲等古郟国郟江、嫫祖西陵弥江等地穆斯林老人口中，对比了解掌握他们到阿拉伯圣地麦加朝觐等地方，所见所闻类似“大翻译运动”的科技文字

历史，之后他的配合，作了些啥？

1、古郟国朝觐阿拉伯圣地说中阿互动史

说时空阶梯，李珣的回民祖先老家有一段时期迁徙，跑到波斯帝国，他和他的父亲等也承认。波斯主要用来指明南伊朗的一片地区，公元前1000年左右，移居这个地区的印欧游牧民族，又最后他们被亚述人和迦勒底人所取代。在公元前844年亚述国王沙拉漫尼撒3世时，回民在波斯是众多古代文明中发展程度较高的民族。最早的波斯人在公元前6世纪亚述国灭亡以后，也生活在现在伊朗南部设拉子市以南的地区。但回民在波斯，事实上还包括了在公元3世纪波斯帝国开始的前身。

在此之后的几个世纪，这片土地曾经被许多发源于地中海区域的势力所统治，但最终还是成为了一个独立王国，并发展成为一个横跨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的帝国。现在的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都曾经属于当年古波斯帝国的版图。波斯和伊朗，波斯是伊朗在欧洲的旧称译音。历史上在这一西南亚地区曾建立过多个的帝国。全盛时期领土东至巴基斯坦，西北至土耳其、欧洲的马其顿、色雷斯，西南至埃及。自从公元前600年开始，希腊人把这一地区叫做“波斯”。这个名称来自于波斯的一个地区帕斯。

而波斯人则从萨珊王朝开始称呼自己的国家为“伊朗”，意为“雅利安人的家园”。波斯帝国是一个依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奴隶制国家，希波战争中波斯的败北，使波斯帝国遭受重创。与此同时，帝国内部诸行省起兵反抗，要求摆脱统治。内外交困加剧了帝国的危机。公元前330年，波斯为亚历山大率领的马其顿军所灭。古波斯消失了，但古老的文明没有因此而彻底湮灭。

因为无数的“贝希斯敦铭文”以及其他书写有楔形文字的泥板文书留传下来了——这里的时空阶梯就是，公元前550年--前330年是波斯“第一帝国”的阿契美尼德帝国，即公元前559年居鲁士二世统一波斯，建立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居鲁士二世击败了当时统治波斯的米底人，使波斯成为一个强盛的帝国。前539年居鲁士占领巴比伦，到了大流士一世，帝国疆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向东，大流士进军印度河流域；在西线对希腊的进攻，则由于公元前490年馬拉松战役的失败而功败垂成；公元前480年其子薛西斯一世，再度对希腊用兵又遭受失败。

公元前330--前170年是波斯的希腊时期——公元前334年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大军，击败大流士三世，波斯成为马其顿帝国的一部分。但亚历山大的帝国很快就分崩离析，亚历山大手下大将塞琉西一世自立塞琉西王朝，以叙利亚为中心统

治波斯地区。这一时期波斯成为东西方的交流的一个枢纽，丝绸之路由此与中国互通。塞琉西王朝的后期，在前 238 年东部的安息（帕提亚）和大夏（巴克特里亚）独立之后，东部被贵霜王朝所扰，西面又面临罗马帝国的扩张，最终被罗马帝国和安息帝国瓜分。公元前 170--226 年波斯的安息帝国，发源于今天的伊朗的东北部，鼎盛时包括今天伊朗全境和一些周边地区，与罗马帝国隔幼发拉底河为界，首都泰西封位于今天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

两个帝国之间有连年战争的同时，安息帝国与东邻贵霜王朝也是战事频传，帝国国力衰竭，各地军阀割据。看现在的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都曾经属于在公元 226--650 年，都曾经属于波斯的萨珊王朝。与公元 220--589 年中国的魏晋南北朝对应，是波斯和中国间的友好往来较频繁时期---波斯使臣来中国交聘达数十次之多。这段历史演变大致是，公元 224 年安息帝国的一个地方总督的儿子阿尔达希尔一世，由于扩张地方势力而和帝国开始战争。经过两年的战争，推翻安息帝国，于 226 年建立萨珊王朝。

萨珊王朝因阿达希尔的祖父而命名。波斯自阿契美尼德帝国之后第一次统一，被认为是第二个波斯帝国。萨珊帝国多次与罗马帝国开战，曾俘虏过一个罗马的皇帝。萨珊帝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由于对东罗马帝国的连年征战，萨珊帝国对臣民横征暴敛，同时加强对宗教的控制，造成暴乱迭起。在公元 629 年和 642 年，两任皇帝遇刺，又受到崛起中的阿拉伯帝国的攻击，帝国终于崩溃。萨珊王朝末代皇帝的儿子俾路斯曾逃到中国，向唐王朝请求救兵抗击阿拉伯入侵，唐朝护送其返回今阿富汗一带建立波斯督护府，但不久终为阿拉伯所灭。公元前 522 年波斯皇帝冈比西斯二世率大军远征埃及，皇帝冈比西斯在从埃及返回波斯的途中突然病死，一时间波斯贵族群龙无首。大流士当上皇帝，不愧为一位足智多谋的人物，历时一年最终平定了叛乱。

类似学中国秦始皇，大流士还从法律上稳固自己的统治，编纂法典，修订各地原有法律，以适应帝国统治---他将各行省的贡赋固定下来，并统一了度量衡。他下令铸造和使用金币“大流克”。在解决国内民族众多、语言文字互异问题上，他没有实行“民族沙文主义”，而是把当时西亚流行的阿拉美亚语确定为全国通用的官方语言，用以发布诏令、公文，允许各地继续使用本地语言处理本地事务。如《贝希斯敦铭文》和《纳克希·鲁斯坦铭文》等，都是用具有节奏性的诗歌语言写成的文书，为古波斯文学和后世文学树立了典范。贝希斯敦的摩崖石刻，记

载的正是大流士的丰功伟绩。铭文用的是第一人称---原来江山稳固之后，大流士自感功成名就，于公元前 520 年巡行各地。

在巡行到米底首府爱克巴坦那（今伊朗哈马丹）附近一个叫贝希斯敦的小村庄时，回想这些年来的坎坎坷坷，于是命人在村旁的悬崖峭壁上刻下自己的丰功伟绩，尤其是镇压叛军的经过，以扬名后世；石刻浮雕上的主角自然是洋洋自得的大流士。

贝希斯敦摩崖石刻铭文（即楔形文字），为人们打开了尘封的古波斯帝国的记忆---波斯帝国的开创者是居鲁士二世。公元前 558 年称王，是为波斯帝国之发端。公元前 550 年，居鲁士二世消灭米底王国，定第二首都埃克巴塔。公元前 549 年居鲁士二世征服埃兰，定第三首都苏撒。公元前 530 年，居鲁士在作战时兵败身亡，其子冈比西斯继位。公元前 522 年，大流士继承王位，号称大流士一世。但有人认为，贝希斯敦铭文中有的记载，完全是精心编造的谎言，目的是为大流士一世弑君篡位辩护。

而真相是冈比西斯二世，即位后力图加强王权，引起了贵族们的嫉恨，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一场阴谋政变中，冈比西斯二世身亡。其弟巴尔迪亚夺取王位，继承先兄未竟之业，继续走上加强王权之路，但结局同样悲惨。以大流士一世为首的阴谋集团，终于发动政变，弑君篡位。但波斯帝国在大流士一世执政，是趋向辉煌的---一是他大肆进行军事征服，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版图东起印度河流域，西抵小亚细亚，北至欧洲的色雷斯，南及尼罗河第一瀑布。二是他厉行改革，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上皇帝后的大流士，大力加强中央集权，树立权威。他不仅自称众王之王，宣扬君权神授，还追求形式上的威仪。上朝时头戴闪闪发光的金皇冠，身穿绛红色的长袍，腰系金丝腰带，手握黄金“权杖”，端坐在金阶之上；身后则站着大群高擎羽扇和大伞的随从和侍卫，大臣要跪在地上朝见。为了保卫身家性命，他建立了一支由一万波斯人组成的卫队，人称“不死队”。为了防止出现叛乱，他把全国分成 5 大军区，军区长官只对他一人负责，任何人无权调动军队。行政上以波斯贵族取代当地贵族担任行省总督，实行军政分治，直属国王。

他还下令修筑了大量驿道，最长的一条全长 2400 公里，称为“皇道”。沿途设有 100 多个驿站，驿站的信差用接力的方法运送物资，十分快捷。大流士还开通了埃及法老尼科未曾完工的尼罗河与红海之间的运河，这条运河就是现代苏伊士运河的前身。驿道、运河虽为军事目的而建且不止一条，但促进了各地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然而接连不断的战

争削弱了波斯帝国的实力---为了夺取叙利亚、土耳其、巴勒斯坦、以色列、埃及和整个阿拉伯半岛的控制权，与强大的罗马帝国交战了数年。直到公元364年罗马人和波斯人签订了一份和平条约。后来当罗马帝国分裂之后，波斯人将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又投入到一系列新的战争中。

这时的新敌人是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波斯人开始从拜占庭的边境地区---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土耳其，发动了持续不断的猛攻，终于在公元619年，波斯帝国完全征服了整个埃及地区和高加索山脉。公元626年波斯人联合阿瓦尔人，包围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波斯人用大型战舰进攻金角湾，但是被拜占庭的火攻击败。同时从陆地上进攻的阿瓦尔人，也被守军击退。

而亲政的伊拉克皇帝，略在东线战场取得了胜利。波斯沙皇库萨和二世无法抵御，只好撤离，围城以失败告终。阿瓦尔人从此一蹶不振，而拜占庭人则趁机发挥自己的优势，他们和可萨突厥可汗哲别尔和亲，联合入侵波斯帝国的领土。多年来的无休争战，为这两个原本实力强大的文明敲响了丧钟。公元628年波斯方面发生了政变，太子卡巴德杀死沙皇库萨和二世登上皇位，向拜占庭求和。统治者终于同意签订了迟来已久的和平条约。

在这之后，被战争极大削弱的波斯帝国被来自东方的穆斯林军团攻占了。公元651年穆斯林势力，在短短十年内征服了波斯帝国，并完全占有了波斯帝国的领土。这个新的伊斯兰王国被称作伊朗，然而在此后的数百年中，不断有新的侵略者出现。首先是塞林柱人---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祖先，征服了伊朗全境。接踵而来的，是中国的蒙古军团，再后来则是土库曼人。公元786--809年哈伦·拉希德统治时期，阿拔斯王朝诸行省混乱的萨珊帝国，迅速被新兴的伊斯兰教指引下的阿拉伯帝国击溃。波斯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阿拉伯语成了通行的语言，伊斯兰教迅速取代了琐罗亚斯德教，各地大量兴建清真寺。750年阿拔斯王朝统治阿拉伯帝国，而波斯人则在政府中取得了支配地位。

在这期间波斯的文化得到巨大的发展，这也是李珣特别关注的传说---对应公元420--589年的南北朝时期，回族的先人就已开始中国的海洋贸易。但当时的南朝被隔绝于古巴蜀丝绸北方之路以外，因此必须另辟南洋的商路---他们在碧波万顷的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上，中国和阿拉伯的船队已穿梭往来，连接起当时世界上最繁荣也是最先进的两个地区，双方频繁的物质和文化交流有力地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这段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交往史，最早可上溯到两汉时期---李珣得知早在唐代

时，已有来自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在三台古郡国郫江、盐亭古嫫祖西陵弥江等地定居。而唐代以来，汉族习惯把来华的外国使者和商人称作“回客”、“胡商”等，因为在蕃客、蕃商中阿拉伯穆斯林所占比例最大。这些来华的使者，有些是阿拉伯帝国哈里发派遣的，有些是地方割据首领派遣的，也有是由阿拉伯船主、巨商派遣的。

在这一时期，中国和阿拉伯地区的交往，也对中阿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终阿拉伯的天文和历法等科学技术，如与汉朝巴蜀的落下闳等祖传天文和科学技术的结合，带来了深刻影响。互动中，巴蜀科技吸收阿拉伯传闻的一些成果，如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通过阿拉伯人的介绍传入；又如公元一世纪罗马建筑学鼻祖维特鲁威，在他的第九版建筑学教材的导论里讲的故事---阿基米德的浮力原理---浸入静止流体(气体或液体)中的物体，受到一个浮力，其大小等于该物体所排开的流体重量，方向竖直向上，即对部分浸入液体的比重计，它所受到的浮力： $F=W-\gamma V$ 。式中W为比重计的重量，V为浸入液体的体积； γ 为液体的比重。若已知W和V，可确定比重 γ ，等等，李珣受益匪浅。

这类阿拉伯传闻的数学、物理对李珣有影响，以及阿拉伯的医学、建筑艺术对李珣也产生了影响。与此同时，类似李珣兄弟等参与的炼丹---中国的古代制硝技术，古代炼铜、造铜镜、铜壶技术，古代制膏药及牛髓粉技术等，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许多创造和发明，互动也影响了阿拉伯商人。在约公元8到9世纪阿拉伯商人传入伊朗，并通过阿拉伯人传向欧洲。如波斯、阿拉伯人都使用中国罗盘的四十八分向法；指南针也是由阿拉伯人传到地中海---意大利人最先接受并用于航海，然后再向欧洲传播。

中国唐代发明的雕版印刷技术，最初是经由中亚地区传到波斯和阿拉伯的，后来又传到埃及。中国的船队常常远航到幼发拉底河、亚丁湾和索马里，中国出口到阿拉伯地区的物品有瓷器、丝绸、金、银、铜、铁、刀剑和各类植物纺织品，以纺织品和瓷器为大宗。中国的丝绸在世界各地有着极高的声誉，在公元83年的帕尔米拉墓中，就发现有产于中国的生丝。唐代传到印度的药材有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等。公元671年唐代僧人义净，出访东南亚和印度等30余国，在印度居住20年，常用中药为印度人治病。他还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为61人立传---这些人大部分是取海道往印度的。

2、古太极卦爻文字与东西方文字听李珣溯源

李珣从父亲等老家朝觐圣地回民者口中，知道自己的祖先从古郡国迁移出远古巴蜀盆塞海，成为

阿拉伯人后，他们是自古以来就有长途跋涉，跨地域贸易的习俗，使其认识到世界的广阔，文明的多样和博采众长的必要。李珣知道波斯历史和阿拉伯公元 8 世纪后的翻译运动有数学、物理、医学等科技，这不是仅仅停留在了解信息上，李珣还想在回族祖先回归古郡国家乡的中国土地上，是否也可以尝试东西交流的“翻译运动”。这谈何容易？但受鼓舞时选择却不能一把抓。

再说古波斯文明的失落，对当时的李珣来说才不久。如果波斯的楔形文字，也跟中国的易经太极语卦爻文字一样，是早已成为的“死文字”，这对东西方各自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相当陌生的。那么李珣又该如何透迷雾，溯源东西方文字与太极语卦爻文字统一的呢？

传说首先李珣想到要掌握自己祖国的文献经典——从李珣写的《海药本草》知道，他引用了包括《尔雅》、《山海经》、《淮南子》、《胡本草》等 60 多种古籍。例如刘文传主任的《李珣〈海药本草〉（原文及注疏）》，所列的 5 大类 131 种药名及注疏中，第 1 条就是《淮南子》：“[玉石部卷第一] 1. 玉屑，按《异物志》云：出昆仑。又《淮南子》云：出钟山”。第 36 条和第 56 条就有《山海经》：“[草部卷第二] 3 6. 零陵香，谨按《山海经》，生广南山谷”；“[木部卷第三] 5 6. 丁香，按《山海经》云：生东海及昆仑国”。

前面说过：《山海经》卷第十六书中有：“有赤国鄴氏，有双山”经文。古“鄴”国，在今绵阳市三台县鄴江流域一带。这正是李珣的家乡所在地，面积涵盖今大英县、射洪县、三台县、中江县等广大地区；鄴江古镇，地处四川中部东北，居于成都、德阳、绵阳、遂宁之间。在先秦时四川境内都还有蜀国、巴国、苴国和鄴国四个诸侯国，从盘古开天地以来，在此创造了十分繁荣的古鄴文明。

再说古籍《淮南子》，在《淮南子·说林篇》中有：“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这里桑林代指市场交易使用帛币。用现代的话讲：就是货币助长了经济的无形之手；这些功能的发挥，所以女娲王对万事都能理顺。传到约公元前 4170--3150 年嫫祖的城邦之美时期，更是达到了鼎盛。用“货币”贸易来作上古文明起源第二的特征概括是联系“摇钱树”，对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的发现——《淮南子·说林篇》表明，在约公元前 5070--4170 年立足山海的女媧氏时期，就已懂得“桑林生臂手”的变化，是货币类似无形之手，对社会有拉动作用的影响。为啥女娲氏的“桑林”意指“货币”，是因当时的养蚕抽丝织出的绸布，类似今天金融界的“黄金”作用。李珣从回民祖先自古就有长途跋涉跨地域贸易的习俗，

自然明白“桑林生臂手”。

但李珣要尝试东西科技交流的“翻译运动”，首先要面对的是：远古的语言和文字。那时已经有造纸和印刷术，文献记载不完全依靠竹片、木片、皮革纸。李珣在公元 949 年到达广州，一住就是 7 年，为的也是要直接了解掌握古波斯时代的语言文字的第一手资料。因为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阿拉伯语缓慢但是坚定的取代了帝国境内原有文明的语言。虽然统一语言的最初目的是便于统治和伊斯兰教的传播，但同时也便利了文化的传播。翻译运动所指向的语言大多数都是统一的阿拉伯语。统一的语言有利于知识的双向交流，这在欧洲古籍的再翻译过程中体现得更为深刻——李珣及他的“翻译”团队，也正如阿拉伯的沙漠之舟驼队一样，背负着传承东西方科技的重任，在东西方朋友热情与智慧的合作下，奏响起古老东西方科技“海药本草”的铃声，穿过沉寂的中世纪，昭示如今会蕴育着的希望与复兴。

如时至后来，在波斯高原西部、伊朗与伊拉克边界旁的伊朗境内名叫克尔曼沙的商业城市，城东 2~3 公里处有一个名叫贝希斯敦的小乡村角落里，“贝希斯敦”这个名字就不仅走出了克尔曼沙这座城市，而且冲出亚洲走向了世界——这归功于它附近的一处悬崖上面，有一种让人找回失落文明的古文字——1835 年英军少校罗林森奉命前往伊朗，出任库尔德斯坦省总督的军事顾问。

这位业余考古爱好者到任不久，就风闻附近有石刻。他跑去一看，在贝希斯敦村附近发现了一尊大型摩崖石刻。只见该峭壁铭刻离地面约有 100 公尺，石刻本身高约 8 公尺，宽约 5 公尺。上半部是一个浮雕，下半部是用古波斯语、埃兰语和阿卡德语三种楔形文字写成的铭文。楔形文字是西亚的古老文字，距今已有 5000 多年的历史。这种文字是用木棒或者芦苇当作笔，在粘土制作的泥板上书写而成的。书写了文字的泥板被置于太阳底下晒干或者用火烘干，当作“书”一样保存起来。如果是信件，则在泥板文书外涂上一层粉，再装进也是用泥制成的“信封”内传送。由于这种文字笔画呈楔形，考古学家称其为“楔形文字”。

为啥要用三种文字书写？因为古波斯楔形文字并非历史形成的文字，而纯粹是人工造文字，而且使用范围有限，认识者极少。因此在使用它发布诏令时，有必要以当时通用的埃兰文和阿拉美亚文译出。然而古波斯的楔形文字，随着公元前 330 年波斯国的灭亡，逐渐变成了一种无人通晓的死文字，而另两种楔形文字也早已失传。罗林森为解开此谜，他冒险爬上悬崖峭壁，拓下一片片铭文，开始艰苦卓绝的释译工作。经过 12 年的钻研，罗林森终于在 1845

年成功地译解了其中的古波斯文，而剩余两种文字所述内容估计与波斯文是一致的。从此人们了解到其背后的故事。

此前欧洲人，特别是日尔曼人，被看作野蛮人，即白种蛮族。这些野蛮人没有过属于他们自己的古代文明。如果古埃及文字是象形文字，那么象形文字的特点是一字一意思，是无法用字母去做对应进行破解的。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以及大篆和小篆，也无法使用任何字母表来对应破解。目前甲骨文能被学界解读的，也不到已发现文字的五分之一。如果古埃及文字是拼音文字，那么除非埃及字母表、单词表与拉丁文或者其他拼音文字有明确的语音及词语对应性。有人说，除非同时通晓两种语言，否则是根本无法仅仅依靠字母对应关系，而互相破解和解读的；现在的埃及人不是所谓的古埃及人——近代现代埃及统治阶级，是马木留克王朝的后裔，马木留克不是埃及本土人，是穆斯林阿拉伯王朝雇佣的突厥人雇佣军。后来突厥马木留克人灭了埃及的阿拉伯人王朝。但中世纪的穆斯林阿拉伯人，建立的埃及王朝也是外来户。至于阿拉伯王朝建立以前的埃及，实际上没有任何可信的文献记载，只有一些可疑的来历不明的传说物以及木乃伊。

但有传说，李珣从《山海经》、《淮南子》注意到《易经》介绍的远古卦爻文字——卦爻是《易经》最早的基本符号文字，由横线的阳爻“—”和横线中空白的阴爻“--”两种爻象组成。但把阳爻“—”减去阴爻“--”等于一个“点”（— -- = •），类似可显示在电脑上一样，如果保留“•”点子显示的卦爻，按每卦三爻重叠排列，可构成 26 种卦爻基本符号，恰好对应 26 个汉语拼音文字类似的 26 个英语字母，而具有集注音、释义、编码、缩写等于一体的功能，可承担起传递上古语言和信息的任务。这就是所谓远古联合国广泛使用的太极语卦爻文字，由此回答了西方拼音文字和东方象形文字溯源的统一。

但现在所见的《易经》，是不要“•”点子显示的卦爻，按每卦三爻重叠排列构成八卦，即乾（三阳爻）、坤（三阴爻）、震（下一阳爻上二阴爻）、巽（下一阴爻上二阳爻）、坎（上下皆阴爻中一阳爻）、离（中一阴爻上下皆阳爻）、兑（上一阴爻下二阳爻）、艮（上一阳爻下二阴爻）。八卦再重叠，构成六十四卦。但古《易经》、《黄帝内经》等集大成的远古卦爻文字，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古老、最伟大的经典杰作创作，始于约公元前 6390-公元前 3151 年的远古联合国的“以富扶贫、以下推尖”政治的良性循环时期，是远古联合国的见证。

只是后历经神农、黄帝、尧舜禹、商汤伊尹、

周文王、周公，孔子等薪火相继 4500 年，上下传承 6500 年余韵不灭。约从 2500 年前到秦汉，易经才结集完成部分卦爻文字。这奇怪吗？不奇怪。在第四纪大冰期前后两端，形成有过人类共同基因、语言和文化起源的两个孵抱期。特别在第二个孵抱期这个“多难兴邦”的特殊时期，大自然灾害逼迫原始社会的人们，团结救灾、团结抗灾，才成就形成了巴蜀盆塞海及四周内陆山寨城邦中的远古联合国。团结救灾、抗灾需要发展生产力做后盾，而科技创新就成为当时对生产力的第一源泉的认识，也为远古联合国的政权人物用科技比赛，来当选的办法打下了基础。

这种办法对当时科技水平的促进有多高呢？众所周知，人文始祖嫫祖是以发明丝绸当选远古联合国的政权人物——远古发明的丝绸，就类似今天的生物工程高科技。人文始祖伏羲，在教人结网捕鱼，遇到湖塘水面上的旋涡；教人制土陶生火做饭，看到锅中沸水的翻滚，已领悟和觉察到了圈态的线旋。为了表达和传授这一数学概念，他动了不少脑筋。例如，他把摆卦爻用的草节茎棍，带来的菁茅草叶，圈起来扭转比划——正是这种发现，类似如今墨比乌斯圈的太极图、八卦图等有趣智慧时，并推进发现的卦爻 26 个供拼音的集注音、释义、编码、缩写等功能于一体的太极语卦爻文字的。

这类比美国摩尔斯发明电报机的点、横线电码文字——1832 年 41 岁的摩尔斯，放弃绘画事业投身“用电传信”的研究中。在这之前的科学家，往往是为表达 26 个字母而设计了极为复杂的设备，而复杂的设备制作起来不容易。摩尔斯意识到，必须把 26 个字母的信息传递方法加以简化，这样电报机的结构才会简单一些。用什么符号代替 26 个英文字母呢？摩尔斯也许听说易经卦爻文字，也画了许多符号：点、横线、曲线、正方形、三角形。最后决定用点、横线和空白承担起发报机的信息传递任务，为每一个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设计出代表符号，这是皆由不同的点、横线和空白组成的为每一个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设计出代表符号的电信史上最早的编码——“电码”。

有了电码，摩尔斯马上着手研制电报机，终于在 1837 年他制造出了一台电报机。这台电报机的发报装置很简单，由电键和一组电池组成。按下电键，便有电流通过。按的时间短促表示点信号，按的时间长些表示横线信号。收报机装置由一只电磁铁及有关附件组成，当有电流通过时，电磁铁便产生磁性，这样由电磁铁控制的笔也就在纸上记录下点或横线。此后摩尔斯的电报机经过许多改进，被迅速推广应用。然而神奇的是，之前李珣早想到在 5000

年前巴蜀盆塞海干涸，以及远古联合国时期也打造过这类由点“•”及横线阳爻“—”和横线中空白阴爻“--”等三种爻象组合的太极语卦爻文字。

但随着盆塞海的干涸，和四分五裂大迁徙的人类社会进入实质性的游团部落酋邦时期，它就失落了。《易经》和象形文字及注音文字，只保留了远古联合国卦爻文字部分功能。文字的统一使用与说话不同，而与政权的更替，执政者的选择、规范、强制、推行分不开。

如秦始皇推行的“书同文”；新中国解放后推行普通话的汉字拼音注音标准方案。有学者说：“据现在四川的青川木牍文字（这枚木牍现在保留在四川博物馆中）看，可以证明，在公元前 500 年的时间区间中，当时的蜀地已经出现了方块汉字的雏形，而且有了很经受得起时间磨砺的记载的‘木牍’载体。到了秦朝和汉初时代，文字已经完全隶书规范化，其与今天的中文基本上一样了，记载载体也多样化，有了帛书等。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的史学的发达，还是在东汉时代以后了，也就是公元 105 年蔡伦制造出了纸张和公元 1000 年左右中国发明了活字排印以后，同时也与东汉通过《熹平石经》统一了五经文本有关系”。那么人类五大文明古国最早使用的文字，是否就与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无关呢？不是的。

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称为远古“太极”期，理性、逻辑思维被分为“藏象论”和“藏数论”。象形文字属于藏象论，字母文字属于藏数论。这里说的远古联合国的字母文字卦爻，这是《易经》最早的基本符号文字。那么四大文明古国最早的象形文字---汉字的甲骨文；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包括祭祀体、世俗体、科普特体；以及古印度的印章文字等，有统一的起源吗？有。它们又都与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时期，各游团、部落、酋邦组织，以及众多密集山寨城邦，划分势力范围最早兴设立的“界碑”有关---这也许是从动物世界流传保留下来的划界习惯。界碑分木头和石头两类质料，和有字迹、刻画和无字迹、刻画两类标识。为保留长久，界碑一般是界石和有字迹、刻画类型。界石是一种边界标记物，是用于辨别一个地区与另外地区之间的边界位置和走向，保留至今。例如，国家、省、州、市，甚至是农场和社区的边界。在两地区之间的边界走向，发生方向性改变时，界碑尤为有用，可以作为指示边界走向的标志。界碑在直的边界上也可作为仅表示边界所在位置的标记物，作地界标志的石碑。

盐亭发现 4000 多年前的古界碑，1995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何九盈教授等人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一书，披露王襄搜集的盐亭县距今约 5000 年前的一块完整的界碑，上面刻有 50 多行类似文字的符号，与半坡彩陶刻划符号相类似，并公布了其中的 25 个字符。随着界碑文字的出现，因界碑的神圣和庄严，使文字及其载体的意义，也变得神圣和庄严，这就是字库文化的产生和兴起。

笔者在童年时代印象最深的是，不准写有字的纸或印有字的纸当手纸，废书、废报、废纸也不行；小孩子用了要挨打。这种保护文字的风俗，也许与《中国汉字文化大观》说的约 5000 年前以来的界碑文化有关。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弥漫在巴蜀大地上的书香气息，感受到巴蜀民众自古以来对文字的敬惜，对科学的敬仰，对知识的崇拜。

3、传说李珣家族经营挂钩“翻译运动”

李珣从小听父亲等回民老人讲解，得知由于兴盛的商业往来，麦加的古莱氏商人通过与邻近地区居民的接触，将较发达的东方古国的文化逐渐带回半岛内部，成为最早的文化交流的使者，为古代阿拉伯的“翻译运动”注入了新鲜血液，异常兴奋。他和父亲想到一起，要把这种“翻译”精神，搬回李珣认识的那一些人祖先称之为“娘家”。

“百年翻译运动”的历史，被确定为约公元 830 年至 930 年这期间，这正是李珣开始从事写作《海药本草》的时候。由此我们再三研读刘文传主任的《李珣〈海药本草〉（原文及注疏）》，并不懈收集、回忆、整理巴蜀古鄯国鄯江等地区李珣家族经营挂钩“翻译运动”的传说，深感李珣的工作不是他一个人，在五代十国后期完成的《海药本草》一书的，他只是反映致力于东西方科技文化交流“翻译运动”的一个缩影；是超前欧洲文艺复兴反映中国先人心声的一朵浪花。

欧洲文艺复兴是指发生在 14 世纪到 16 世纪，欧洲因为文本的失传，不得不把一些翻译成阿拉伯文的古典文本，从阿拉伯文又重新译成拉丁文，是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海药本草》反映的是，中世纪前期中国当时已开始农工商求变的呼声。

再说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这场历时二百多年，地跨亚、非、欧广袤区域，交融波斯、印度、希腊、罗马、阿拉伯等古代东西方文化的译介活动，虽然在世界文明史上并不多见。其实，在阿拉伯古史上，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时代之前，甚至伊斯兰时代之初，科学文化水平低下。阿拉伯人由孤芳自赏，到阿拉伯帝国的形成期间，阿拉伯人的铁骑所到之处，进入人类古文明的腹地，才令阿拉伯人眼界大开---从

游牧的蛮荒进入城居的文明，阿拉伯人由操纵牧鞭，挥舞宝剑，攻城夺关，到掌管帝国庞杂的社会事务，使阿拉伯人面对异族异域的先进文化，为了防止政权旁落，从8世纪中叶起，伊斯兰教在早期是比较宽容的，对异教和异文化都采取较策略的办法对待：鼓励学术活动，吸收容纳帝国境内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者的先进文化遗产。

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实施博采诸家、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开展翻译介绍古希腊和东方科学文化典籍的大规模、有组织的学术活动。用重金从各地所搜集的一百多种各学科古籍进行了整理、校勘、译述，通过将拜占庭、波斯、巴比伦、古埃及、希腊、罗马和中国、印度等大量医学、天文学、数学、哲学、历史、政治、文学、音乐各领域的书籍，译为阿拉伯语和叙利亚语，以便更有效地进行统治。虽然当时翻译活动的特点，以零散的个人译述为主，但仍重译了托勒密的《天文大集》，翻译了毕达哥斯的《金色格言》、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范畴篇》。

即在公元830年至930年，以巴格达为中心的学术研究，形成了巴格达学派。它取代了早期的亚历山大学派，并引发了西班牙的科尔多瓦文化中心和埃及的开罗文化中心——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版图内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波斯等地，由于曾经是希腊马其顿王国的一部分，而深受希腊文化陶染，希腊的哲学、数学、天文学、历史、美学等思想哺育了阿拔斯帝国文化。希腊文化的导入，不只是在医学、星象学、天文学、哲学、数学、物理学等学科领域使阿拔斯帝国的人民大大丰富和增长了见识、学问，更为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演绎法、类推法、证明理论和三段论的形式理论等被大量而广泛地应用于辩论、研究、表达及论证方法，结果是产生了不同于前阿拔斯时期的以《古兰经》为代表的叙事、论理风格，取而代之的是包含着如“本质”、“现象”、“数量”、“状态”、“原理”、“法则”等希腊哲学术语，使用着“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类推的方式，充分条件量”等辩论原则的阿拔斯人的希腊风格。

李珣耳闻这些作品被翻译、介绍和注释，或由波斯文、古叙利亚文、或由希腊文，译成阿拉伯文，形成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留下浩如烟海、繁若星斗的学术文化作品，出现了盖世不朽的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家、艺术家，对形成欧洲文化及其发展正产生作用，中国如何办？家乡如何办？回民家族如何办？自己如何办？逐渐打开了思路。

2019年2月15日北京市科协蝌蚪五线谱官网发表的《〈海药本草〉：一部简易版的“医疗手册”》

一文中说：“唐朝灭亡进入纷乱的五代十国后，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出现了一位颇有才气的文人名叫李珣。他正是那位波斯商人的后人。李珣字德润，在弟妹五人中排行老大。其三弟李珣字廷议，以贩卖香药为业，且精于炼丹；五妹李舜弦被前蜀国（五代十国之一）的后主纳为昭仪。身为后戚，李珣没有恃宠而骄，而是闭门谢客，精心填词。名气渐增，地方政府具名推荐他到朝廷，当了一名宾贡。所谓宾贡，就是朝廷在考核他是否有资格当官期间，受到上宾一样的接待”。

2019年7月20日“中国历史网”发表的《波斯商人竟为中国人寿命着想》一文中还说：“李珣家里有钱，他俊美无瑕的脸再配上挺拔的身姿，就是标准的高富帅，靠啃老也可以，靠颜值也可以，他却偏偏选择以才华取胜。王衍是五代十国期间前蜀蜀王王建之子，前蜀第二代国君。王衍从小生长在‘福窝窝’里，公元918年初夏接替父亲皇位后，不理正事，想长生不老，于是继续督促李珣炼制丹药。然而丹药还没有炼成，又一场战火烧过来，后唐攻打前蜀，李珣的命是保下来了，王衍却死了。在唐朝就因藩镇割据而变得狼烟四起，许多波斯籍商人纷纷打道回府。李珣的家人有的也准备回国，李珣兄妹却不肯：他们不仅要在中国生根发芽，还要进军官场。因为诗名远播，加上秀才的身份，李珣被举荐到蜀王门下做了一名宾贡，还和蜀王的儿子王衍成为好朋友。地位如此悬殊的两人为什么会成为好朋友呢？”

“原来历代皇亲国戚钱权不缺，就想长生不老。李珣家族虽然并不是以炼丹药为主，但王衍认为他是卖香药的，两个人的共同话题就是如何炼制丹药。但是炼丹药是烧钱的行当，家里人并不同意：此前因为战乱导致药店早已关闭，再炼丹药花费巨大。李珣却一意孤行，他认为炼丹药能让人长寿是做善事。还有原因是，与王衍混在一起，朋友圈把李珣捧得很高。可惜，随着炼制丹药耗尽家财，生活渐渐陷入困境。但对于波斯人李珣来说，王衍对他有知遇之恩，一个外国人能够在前蜀小朝廷里谋得官职并受到宠爱，实属不易。李珣拒绝依附后唐，开始寻访炼丹秘方。而本来就窘迫的家境，李珣最后竟连三餐都难以维持了。昔日富裕豪华的李家最终成为人们口中的传说。李珣即便境遇如此也不肯放弃炼制丹药，依然在中国大地上继续流浪着。李珣的炼丹工程最终没有成功，但他对中国的热爱以大量的词作和《海药本草》跃然纸上”。

1) 解决官二代富二代的问题不是李珣的任务

以上“中国历史网”等把李珣描述得很“灰暗”的介绍，似乎不是传说，而是“有书为证”，其实是上下五千年文明中，传统的“独尊儒学”、“重文轻科”

一派“内卷”化观点津津乐道的反映，说明的是“古代中国制造为何徘徊不前”的自我暴露。

为啥从唐代以来经商或有军功的回民，愿意到巴蜀古郡国和嫫祖故里的三台、盐亭等回民居住地落户？无可讳言，即使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当农民成地主，奔工商成资本家，人数少而集中居住的回民，与人数多而集中居住的汉人，如果深入去调查和听传说，其务实性和经营策略，“内卷”化都是大有差别的——上世纪下半叶，是和平的年代，在盐亭流传一句概括大众生活生产的民谣：“重工业打石头，轻工业打饼子”——“打饼子”内卷化，指的就是盐亭城边的回民，卖的“回子烧馍”——如今“回子烧馍”仍出名，几千年卖得经久不衰。据传说李珣的母亲只生了他们三兄妹：公元 896 年李珣出生。899 年李珣的弟弟李珣出生。901 年李珣的妹妹李舜弦出生。

至于李珣的父亲，是否还另结过婚、生有孩子传说没提。但李珣的父母和弟妹，是支持李珣把阿拉伯圣地“翻译”精神，搬回祖先的“娘家”的——从《山海经》说的“赤国”治红铜，到“妻子、郟国”海内外经商往往返返类似回娘家——古郡国回民忘不了中华上下一万年文明，而不像只讲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的人那么“内卷”。

对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的传言，李珣的父母和弟妹虽然不关心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范畴篇》等中说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学问，如逻辑的演绎法、类推法、证明理论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本质”、“现象”、“数量”、“状态”、“原理”、“法则”等学术语，但他们懂得无论是军阀割据混战锁国，还是瘟疫大流行封城，在远离热点的边界，还是能够想办法让非军事的部分物资和少量人员通行的，这为做药材生意留下缺口——“嗨、海”，谋求“翻译”大同天下情怀的李珣的父母和弟妹，明白聪明好学的李珣把“天下”解释为包括“海内外”。由此赞同谋求“翻译”大同天下情怀的李珣，他的父母和弟妹看到李珣说要写的《海药本草》，懂得这种情怀在显露曙光。按回民的风俗，回民的姑娘是不嫁给汉人的，李珣的的妹妹李舜弦，在李珣的解释下，嫁给了是汉人的王衍。

王衍虽然是官二代、富二代，但王衍是 889 年出生，大李舜弦 12 岁，而且名声不好：918 年接替父亲皇位后，“不理正事，想长生不老”等等。但解决官二代富二代的问题，不是李珣的任务——类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理解只要面对今天的成就就不会忘记曾经的苦难和屈辱——数以百计不平等条约等巨网，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束缚着中国；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尝试了几乎所

有的政治模式，都没有成功，直到 192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终于看到伟大复兴的曙光。而李珣是生活在中世纪的旧社会，古老回民历经的沧桑不说吗？

李珣清楚：写《海药本草》，推动海内外回汉等用得上、用得起、可信赖的药材这类健康公共产品，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在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推动东西方科技交流互鉴、促进海内外回汉等共同发展、守望相助。这当中个人委曲求全，和上层打交道，是无法避开的。

2) 从炼丹药到香熏牛骨髓

王衍作为官二代、富二代，在他父亲前蜀蜀王王建管辖的地盘郫江镇古郡王城来游玩，是自然和经常的事。李珣熟读经史，指导妹妹李舜弦写诗词，引导弟弟李珣学医治药，也是自然和经常的事。李珣和王衍在制药做善事让人长寿上谈得来，才使他们结下关系的。

而当地的回民群众很多都是一代代做贩运、宰杀牛羊生意，休戚与共。卖完牛肉，或吃了牛肉，剩下的牛骨头会很多。李珣的父亲还是个会给人看病行医、制膏药的阿訇，李珣年少就学得制药一手。他家还是卖香药的，觉得你能拿出自家生产的知名品牌药材，生意才会更好。他真的从香熏牛骨髓制作出药剂，很多人吃过，说效果好。

笔者 2021 年 4 月在绵阳一家卖“保健品”商店，一次偶然看见商店屏幕视频里，有生物时代沈阳康洁公司董事长陈浩成教授，宣讲他研究出“牛髓粉”，其成就可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说牛髓粉中含两种相辅相成的成分：骨蛋白和髓脂酸——骨蛋白是强骨造骨；髓脂酸是消化骨增生的。但央视等媒体报道有涉嫌虚假宣传保健品医疗效果的。过后，笔者从百度搜索介绍：牛髓粉，为牛科动物黄牛或水牛的骨髓。牛髓粉中含有骨蛋白，髓磷脂，尼克酸，核黄素等，能填髓强骨，常用于症见肢体痿弱、肌肉瘦削。但并不万能。

李珣不是陈浩成教授，没有进过医学院，也没有在医学院教过书。但他类似懂得，干农活不是一个人勤劳就能当“地主”，干工商不是一个人奔波就能当“资本家”。他在广州七年考察，从外商、医生和药工中专门搜集、整理，经由海外传入中国的外来药物资料，不是有单位给他发工资叫他干的事，是自己养活自己，所以他是组织有一个以药业为生的团队的。据传他的母亲就是一个做生意汉人家的女孩；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农户汉人家的女孩。他在外边多年做生意，赚的钱还一边拿回家买土地，他妻子即在家是管理种植、收购本草药材的。

3) 科学不是科幻

古往今来，战争、瘟疫的恐怖，各国类似藩镇

割据狼烟四起,其“武斗”、“文斗”都少不了是“派斗”,各说各的理,各说各的对,最后多以“强者为王败者为寇”收场。科学“科斗”,也有“派斗”。但科学与科幻还有一点不同——如果都把科学和科幻看成是一种猜想,“科幻”不一定需要去证实,但科学如果不是属于“派斗”的哲理,而是具体到非意识的物质自然形态,那么这一定是需要实验证明,或数学逻辑的推导的。例如,阿基米德的浮力原理——浸入静止流体(气体或液体)中的物体,受到一个浮力,其大小等于该物体所排开的流体重量,方向竖直向上,即对部分浸入液体的比重计,它所受到的浮力: $F=W=\gamma V$ 。式中W为比重计的重量,V为浸入液体的体积; γ 为液体的比重。若已知W和V,可确定比重 γ ——不同派别的科学家,都可以大致去实验。正是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在总结阶级斗争革命原理时,还提出了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原理。

科幻并不需要去实践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原理,那么它要做什么呢?2021年7月2日“观察者”网发表的《〈北京折叠〉作者郝景芳新作入选英国科幻最高奖》一文报道:“第35届阿瑟·克拉克奖公布今年的入围短名单,曾以《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的中国科幻作家郝景芳的《流浪苍穹》入围。郝景芳,1984年生于天津,清华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博士。2006年开始从事写作,2016年其小说《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她也是继刘慈欣之后,第二个斩获这个被称为‘科幻界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北京折叠》郝景芳设立了两个世界、两种制度,小说主人公在两个世界来回穿梭,陷入迷惘,引发人们的思”。

郝景芳曾表示:“整个写作的初衷,就是这样一种感觉:一群少年,儿时生活在一种制度环境,少年时经历了环境的巨大变迁,产生的断裂感和不适感,令他们永久地徘徊在两种模式之间,永远流浪”。

李珣的《海药本草》则不是这样:他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即使六卷《海药本草》书在南宋末年已散佚,书中收录唐朝及五代初期的外来药物,现在看来有的效果不是很明显,但在当时,李珣在对各派外商、医生和药工等人士的访问中,效果意见较统一的;有的还是经过自己和家人、帮工的验证,才选入《海药本草》中,不然多年之后,到明朝李时珍写《本草纲目》一书时,还从北宋出的《证类本草》书中辑录《海药本草》内容,找到可信的标为由海外传入的药物。

【11、结束语】

从2020年到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应该守望相助、同舟共济。这里似乎改变了古代传统儒家

教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即反过来,“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才是正理,才是与时俱进,才有石破天惊的科技创造。

因为没先有“平天下”的先进科技本领、志向、理想、爱好、思想,哪有“治国”、“齐家”、“修身”的平和、和平、持久、休戚与共、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李珣在五代十国时期就写出《海药本草》,可以说李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改变古代传统儒家教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反过来为“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的人。原因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我们回顾如在《中医药多体自然叩问》一书,开篇的“第一章 重识易经与儒学”的“第一节 吹响重识易经的号角”中,曾比较过王蒙先生与杨振宁教授,可联系李珣。

因为我们似乎觉得,杨振宁、陈省身教授与王蒙先生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很不同。王蒙先生是按几千年来来的常规读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杨振宁、陈省身教授是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反过来读的,即“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

由于“平天下”既指有中国,也指有外国;王蒙先生与杨振宁教授相比,是长期生活、工作在国内外,而杨振宁教授是走出国门半个世纪,又走回国内的人,他对“平天下”的理解与实践,自然要比王蒙先生宽一些。例如,杨振宁教授在清华大学用英语给一年级新生上基础物理课,看是没有必要用英语,但“平天下”如果也指有外国,就很有必要:即科学高峰在外国,培养的高层人才不懂英文的基础物理能行吗?又如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也是在国外生活、工作了半个世纪又走回国内,在南开大学创办培养微分几何、微分流形等高层人才的数学研究所,有这个必要吗?如果“平天下”也指有外国,就很有必要——杨振宁、陈省身教授与王蒙先生,我们都非常尊敬、崇拜。

事情关注的起因,是在北京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向《易经》“开火”,称近代科学要摆脱“天人合一”。这是一个吹响重识《易经》与生态文明的号角——儒家经典人生道路,自古就被描绘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任何中国人,只要生于皇天厚土,自出生之前就携带着这类四个基因,所以中华民族才几千年不衰,历经浩劫而依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平天下”,一般中国人以“打天下”、“坐天下”理解它的意思;而统治阶级及统治阶级的文人,也当“打天下”、“坐天下”心安理得地把它理解了。其实“平天下”,还有

“平和天下”与“和平天下”的现代求变含义，如“全球化、多元化”完整、统一、双赢的含义。王蒙先生在中国海洋大学的演讲，谈到他怀念那些精通人文与自然科学的文化巨人时说：“自然科学与人文，只能双赢，不能零和。文学的方法与科学的方法有很大的一致性，如珍惜精神能量，热爱知识，热爱生活，对世界包括人的主观世界的点点滴滴敏锐捕捉，追求创意，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力图对国家民族人类作出新的哪怕是点点滴滴的贡献。但是相当一段历史时期中华文化缺少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缺少一套实证的方法，又缺少严整的逻辑规则”。

“《大学》上关于从正心诚意可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的著名推论，都不符合形式逻辑的起码规则，更谈不上实验的或者统计上的证据，而更多地接近于文学作品。它们富有灵气，充满想像，整体把握，就是不怎么科学，不怎么经得住实验、计量、辩驳。中国古代有著名文人兼通医道与军事的，但少有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甚至，大多数作家基本上是科盲。这与中国的重文主义传统有关。对于修齐治平的推崇，对于辅佐明君的理想，使人们倾向于认为齐家治国之道才是大道。我希望文学界的同行们能以极大的热情学习科学，领会科学已经怎样使人变成了巨人，科学将为人类创造怎样崭新的未来，取代那些想当然的咄咄逼人与大言欺世，珍视公认的价值体认。让科学家与文学家携起手来，取长补短，创造一个更加文明的中国”。

王蒙先生的这个讲话，应该说是非常不错的。但为啥王蒙先生演讲的精神与追求，还与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80岁的杨振宁教授在北京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称近代科学要摆脱“天人合一”不相合呢？

因为从王蒙先生对古代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批评，可以看出王蒙先生并不全理解今天的“天”和如何“平天下”。杨振宁教授在这时站出来，以评说《易经》及其“天人合一”，巧妙地引导全中华民族的思考。杨振宁教授在演讲中说的是：《易经》影响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所以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华文化里，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比如天人一物、理一分殊。《易经》中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也就是说，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所以受早年易经思维方式的影响，把自然跟人归纳成同一理。而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两者是两回事。如黄帝并等于天命。

还有杨振宁教授认为，中华文化的归纳法来源

于《易经》的观物取像。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易经的分类、精简、抽象化，是归纳法的精神。中华文化有归纳法，可没有发展出推演法。如果归纳一下今天近代科学的思维方法，发现其中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归纳法，一条路是推演法。近代科学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而发展的。比如麦克斯韦方程，就是运用了两者结合的方法。今天的发电机、电话、无线电、电视、网络通信、激光等等，都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而所有的这许多，都基于麦克斯韦方程式。又如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人类史上一大贡献，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第一次把推演法变成规律化。推演法对于近代科学产生的影响无法估量。推演法的一个精髓就是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就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不一样。中国传统是摆事实，次序没关系，重要的是最后的结论。

杨振宁教授还说，从天人合一产生的观念是天人和谐。天人和谐对于中国传统思维与社会的影响，比因为植根于天人合一而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影响还要重要。但他并非是想攻击中国的传统哲学，因为天人合一的内涵不止是内外一理，而是远超过内外一理。当然杨振宁教授并非不知道，天人和谐联系着当今世界的热门话题“生态文明”，所以他才说，天人和谐对于中国传统思维与社会的影响，比因为植根于天人合一而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影响还要重要；也所以他才说，天人合一的内涵不止是内外一理，而是远超过内外一理。

参考文献

- [1]刘文传，李珣研究，三台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印，2021年3月；
- [2]王德奎，百年海啸话嫫祖---嫫祖发掘者的故事，Academ Arena, Volume 12, Number 10, October 25, 2020;
- [3]路小栋，中国道路地震预报水机制争鸣 ---非线性暗物质原子量子研究与应用，Academ Arena, Monthly Volume 9 - Number 7 (Cumulated No. 97), July 25, 2017;
- [4]平角，科学前沿类似青藏高原和珠峰的第三极，Academ Arena, Volume 12, Number 11, November 25, 2020;
- [5]平角，学自然学科学与振兴双循环，Academ Arena, Volume 13, Number 1, January 25, 2021;
- [6]王德奎、林艺彬、孙双喜，中医药多体自然叩问，独家出版社，2020年1月；
- [7]王德奎、赵均中，嫫祖研究，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
- [8]王德奎，“绵阳第一碑”与盘古王表石，文史杂志，

- 2000 (2);
- [9]王德奎, 嫫祖文化研究与经济建设综述, 凉山大学学报, 2003 年第 3 期;
- [10]岳定海、王德奎等, 嫫祖故里大揭秘, 伊犁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3 月;
- [11]王德奎, 盐亭嫫祖与黄河文化史反思, *Academia Arena*, Volume 12 , Number 11 , November 25, 2020;
- [12]习强, 盆塞海与洪水朝天初探, *Academia Arena*, Volume 13 , Number 1 , January 25, 2021;
- [13]刘文传, 绵阳西山公园内的“蜀八仙”文化符号, 巴蜀史志, 2019 年第 3 期;
- [14]石云龙、石小玉, 《中华之母---嫫祖》, 大众文化出版社, 2009 年 2 月;
- [15]叶眺新, 中国气功思维学, 延边大学出版社, 1900 年 5 月;
- [16]王德奎, 三旋理论初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年 5 月;
- [17]孔少峰、王德奎, 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 年 9 月;
- [18]王德奎, 解读《时间简史》,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 年 9 月;
- [19]刘月生、王德奎等, “信息范型与观控相对界”研究专集, 河池学院学报 2008 年增刊第一期, 2008 年 5 月。

7/5/2021